



谷景生 与一二九运动

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谷景生与一二九運動

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8
ISBN 7-80199-343-8

I. 谷… II. 中… III. ①谷景生生平事迹②一二九运动(1935)—史料 IV. ①K825.2 ②K264.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0292 号

书 名: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

编 者: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贾京玉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62mm×230mm 1/16

字 数:212千字

印 张:16.75 插页6

版 次:2006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99-343-8

定 价:28.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封面题字：

任继愈署篆 

谷景生纪念网：
www.gujingsheng.com

责任编辑：贾京玉
装帧设计：孙玉霞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1955年谷景生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与谷景生握手

一二九运动时期的谷景生





在北平任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书记时的谷景生



一二九时期的谷景生
(前左一)、彭涛(后立者)、
刘北斗(前左二)



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左起谷景生、周小舟、彭涛



贺龙率祖国慰问团慰问志愿军部队，左一谷景生



谷景生在纪念一二九运动 50 周年大会上讲话



在纪念一二九运动 50 周年大会上，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同志合影留念。前排左五为谷景生、左七为邓力群



谷景生摄于2004年春节



2004年9月28日，李继耐到三〇一医院看望谷景生



谷景生摄于2004年夏

编者的话

一二九丰碑下的怀念

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2005年，全世界都在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作为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的中国大地，也以各种形式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今年，也是掀起抗战序幕的一二九运动爆发70周年。

一二九运动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于它在祖国危机，民族危机的关头，升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而这面大旗，从北平升起，迅速飘扬在全国各地，使抗战的思想深入人心，使抗战的人心凝聚起巨大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它培育了整整一代革命青年，不仅为抗日战争准备了干部，而且使他们成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栋梁之才。

毛泽东说：“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

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在纪念一二九运动 70 周年的时候，后人不应忘记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及真正的组织者之一、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和北平左联书记、学联党团领导人谷景生。

郑州人民和谷景生将军有着一种特殊联系——他是郑州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据史料记载：1947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九纵在豫北的博爱县成立，谷景生任政治部主任。1947年8月21日，二野九纵突破黄河天险后，挺进豫西，解放了伏牛山广大地区。谷景生亲自搭建各县党政领导班子，创建了三个地区、20多个县的党政群团机构和地方武装，开辟了巩固的豫西根据地。1948年4月7日，洛阳解放，他担任了首任洛阳市委书记及警备司令部政委。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他又担任了首任郑州市委书记兼郑洛警备区政委。

谷景生将军为郑州人民的解放、城市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稳定，做出了载入史册的历史贡献。而

我们对他历史功绩的整体认识,却是在近些年来准备出版历任市委书记传记的工作中,逐渐了解到的。

谷景生将军在世时,拒绝一切为他做传的要求。他曾写道:“我是谁?这不重要,我做过什么?也不重要。我的经历,我的职务,我的待遇等等,都不重要,非常不重要。因为人类有了不起的情感和思维,因而我们时时面临选择。首先选择一种生存的方式:砂乎,尘乎,蟑螂乎,营苟之徒乎?非也!荣乎,伟乎?亦非也!人,就是人,伟大的人,光荣的人,神圣的人——即共产党人。这是一个永恒的视点、出发点和立足点。”

2004年11月28日,谷景生不幸逝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谷景生一生的功绩,做出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谷景生同志是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的纪念文章《悼念战友谷景生同志》和《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坚强领导者》一文,充分肯定了谷景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和历史功绩。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根据郑州市委、市政府的决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一二九运动70周年之际出版一本书,纪念这位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先辈、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忠诚的中国

共产党党员、中共郑州市委的首任书记谷景生，就是要学习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意志，学习他独立思考、勇于开创工作新局面的气魄，学习他做大事不做大官，全心全意为人民奉献的崇高境界，学习他既坚持原则又与人为善，推功揽过的高尚风格，学习他荣辱不惊、情深义重的高风亮节。

谷景生将军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份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珍贵教材，值得我们所有人认真比照，向先辈看齐。谷景生这些老一代共产党员，逐渐远离我们而去，但他们打下的红色江山永在。当年他们为国家、为民族发出的一二九青春的呐喊和掀起的抗日救亡的大潮，永载史册。这种英勇奋斗、不怕牺牲、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将为我们后来者继承、发扬、光大。

目 录

- 编者的话 一二九丰碑下的怀念
..... 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1
-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毛泽东 1
- 悼念战友谷景生同志(代序) 薄一波 8
- 痛悼开国将军谷景生老前辈
..... 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 李继耐 16

一、一二九追溯及史料中的谷景生

- 回忆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地下党 谷景生 19
- 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
.....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人物学科》副主编 张如贤 35
- 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坚强领导者
——访中共党史学者胡长水、王朝美
..... 《人民日报》记者 马 利 67

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发动真相

- 《中华儿女》杂志编委 王 凡 74
- 我与一二九 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周小舟 88
- ### 在一二九运动史学研究中认识的
- 谷景生 原中央党校一二九运动研究班
史学家 北师大历史系教授 麻星甫 90
- ### 从一二九的历史经验 看党的领导
- 与学生运动 共青团郑州团市委 92
- ### 一二九运动两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 《领导决策参考》周刊社总编辑 张瑞田 98

二、丰碑下的沉思

- ### 患难与共 范承秀 109
- ### 荣辱不惊谷景生 国防大学副政委 李殿仁 110
- ### 未被传奇的传奇人物
- 谷景生将军 宋协龙 115
- ### 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物 ... 《人民日报》主任记者 曾坤 124
- ### 患难夫妻白头情 ... 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 叶家林 127
- ### 望河怀宛洛 沙场秋点兵
- 谷景生在二野九纵工作片段
- 原总参测绘局政委 刘增钰 131

- 回忆九纵时期的谷景生同志 十五军老团长 李中顺 160
- 红马纪念章 …………… 时任九纵队作战处长 崔 星 166
- 郑州“第一人” …………… 《城市早报》记者 韩景玮 170
- 怀念谷景生 …………… 原国防部五院院长 钱学森 173
- 忆谷景生同志 …………… 原国防部五院副院长 李明实 174
- 回忆谷景生政委在国防部五院初创时期的
几件事 …………… 原航天二院党委书记 程荣之 175
原昆明出版社新闻局局长 李登瀛
- 构筑中国导弹科技事业基础的谷景生
同志 …………… 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王道力 181
- 谷政委远行了 …… 原航天部一院人教部副部长 宓世湘 189
- 回忆谷景生政委二三事 …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李钟玄 191
- 一个父兄般的将军
——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谷景生政委
…………… 原十五军老战士 柳岳继 199
- 十五军血战上甘岭 …………… 原十五军老战士 刘贻刚 204
- 纪念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有感
…………… 原十五军老战士 段绪德 208
- 学习谷景生 保持先进性
…………… 中共运城市委常委 王殿民 213

三、谷景生遗文偶拾

我是谁 这不重要

——谷景生笔记摘录	221
激战前的誓言	223
祭彭涛	228
说言：爱党和反党	231
史说的，说史的	233
浅深人和深浅人	235
韬略三六	236
把资产阶级的“政治”扔到阴沟里	239
握笔要紧	241
世界语的精神起源	242
泥土一撮	244
宁为心碎，不为肢全	245
记梦：同鲁迅在街头摆摊	247
“文革”家书	249
谷景生生平	251
谷景生简历	256
后 记	259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毛泽东

同志们：

今天开“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大会，满堂青年，朝气蓬勃。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活泼的集会！纪念“一二九”的大会，在延安已经开过不止一次了，过去几次我都没有能参加，今天我是非常兴奋地来参加的。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事情更好办了。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反帝反黑暗势力两件事。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反起，到现在已反了一百年了。时间很长，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现在这件事情是好办多了。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大大加强了反共活动，打击进步的文化界，现在有些人就说：中国的事情难办了。他们是为进步而努力的，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他们满腔热情，怀着好心肠，要把国家民族弄好。但是，正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他们在周围却见到顽固势力所布下的投降、分裂、倒退的黑影，他们的努力受到种种限制和压迫，不免觉得事情难办了。这只是看到事情的一方面。我们当然坚决反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但就全局来说，却认为比之过去，现在中国的事情不仅不难办，而且是更好办了。

为什么呢？这就得从我们今天纪念的一二九运动说起。

第一，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也讲过。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它是在什么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呢?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它给中国政治上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明白了这些问题,就会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

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我们看看,一二九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一方面,它是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反

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在过去的所谓“剿共”战争中，共产党和红军处境的艰难是无须多说的。后来红军长征了，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这就是说，红军到了陕北，还是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中。这就是军事“围剿”的情形。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大家都要干，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有一些人偏偏不赞成。不过，他们也是要打的，打的是谁呢？是共产党，是青年学生，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全国老百姓对他们说：你们打的方向弄错了，我们坚决反对。这就是一二九运动所处环境的另一方面。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关系。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

全国团结抗战潮流的发展。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广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要拿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关系相比,那末很明显,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更密切,两者相隔的时间更短,因为一二九运动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互相配合。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第二,反对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压迫知识分子,这件事情现在也是更好办了;而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件事情却是更难办了。一二九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黑暗势力压迫进步思想,压迫到最后,黑暗势力总是失败的。一二九运动前,他们进行了八年多的反共教育,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学校里的一切有政治倾向的课程,首先都是以反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对教员中被认为是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要排斥和迫害。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起,他们用这种教育训练了八年多,不幸得很,却训练出一个“一二九”来。这在国民党内那些反共的先生们看来,当然是一件天大的憾事。有些人说,“一二九”是学生造反。这一点学生们是承认的,的确是造反。但是,造谁的反呢?是造压迫学生者的反,造思想“围剿”者的反,造宣传假三民主义的人们的反。他们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实行真三民主义,也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他们为铲除一切实行真三民主义的障碍而造反。这样的反要不要造呢?要造的,要造的,第三个还是要造的。

世界上的事情，就有这样怪，碰了钉子摸摸头，但是过后又忘了。你们看，从前有些人是不承认五四运动的，但是到了今天都承认了；现在也有些人不承认一二九运动，不过，根据“五四”的经验，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也将不得不承认“一二九”。如果坚持不承认，那就请他们在三十六计中选上计，简单些说，请他们滚蛋！因为世界是向前进的，要向后倒退是不成的；中国人的辫子没有了，他们想拖也拖不住了；旧的落后的东西只好倒下来，让新的进步的东西接替它。在进步的潮流中，他们要是还不承认进步的一二九运动，还想鄙视这个运动，那末，他们将要倒霉还有什么话说？

现在的青年学生，懂得的道理更多了，比我当青年学生的时候聪敏得多了。我起初读几年书，只知道“诗云”、“子曰”那一套，心里总以为做官做皇帝的人个个是好的。后来进了洋学堂，碰到了革命，于是也知道皇帝老爷是坏的了，也懂得了美国的京城是华盛顿，英国的京城是伦敦，什么 $X + Y = Z$ ，什么分子、原子和电子。现在你们不仅懂得这些东西，而且还懂得马克思主义哩！我那时，就不懂得什么马克思。这就是现在比过去进步的一个证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上层的人们是主张参加协约国英、法方面去打德、奥的，他们的言论讲得头头是道，确实欺蒙了一些人。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在北京也开了会，还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公理战胜”四个字，更是煊赫一时，弄昏了当时一些人的头脑。但是，现在不同了。中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懂得了世界大事，懂得了革命道理。这种道理是一步一步懂得的，从前懂得少，现在懂得多了。大家懂得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懂得了投降派、顽固派的阴险狠毒，懂得了民主宪政。他们认识清楚，要进步，要民主，要参政，而这民主宪政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只有全国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一同起来作斗争，才能把这个事情搞成功。现在的人是聪

明了,不容易被欺骗了。大家都光起眼睛看着:什么人不开放民主?什么人要分裂?什么人要投降?什么人要倒退?《封神演义》里有一个申公豹,是姜子牙的不肖师弟,他脸向后长,眼朝后看。现在在抗战阵营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群“申公豹”,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这是现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这叫做压迫的自由。然而,全中国的青年和工农大众也有另外一种自由,这叫做反抗黑暗势力的自由。我们不准黑暗势力把中国拖向后退。我们有没有把握不准他们那样做呢?是有的,重要的根据就是现在的人不容易被欺骗了,全国老百姓是不好再欺骗了。现在大多数人就不准他们这样压迫,要反抗他们的压迫;不准他们投降,要坚持抗战;不准他们分裂,要坚持团结;不准他们倒退,要坚持进步。这一群“申公豹”,看他们怎样收场!

第三,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毫无疑问,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一切共产党员要向

所有非党的同情者说清楚，我们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知识分子的，是团结知识分子的。自然，我们要反对那少数破坏革命的坏知识分子，汉奸知识分子，“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不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罪恶；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利的。

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例如从西安到延安的这一条路上，遍设关防，进步的知识青年要通过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既没有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又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那只有被赶到集中营“训练团”里去。这件事情似乎有些难办。但是，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有了这，这些狗子敢来咬一口吗？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已有了一百年的反帝反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再加上共产党十八年的斗争经验，什么事情还会办不到呢？这样看来，中国的事情比以前是更加好办了。我们一定要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出—一个民主共和国！现在虽然还有帝国主义者和“申公豹”们不断地阻碍我们这样做，但是不要紧的，我们现在是聪明了，是有力量了，我们已不是昨天的我们，而是今天的我们了。帝国主义者、“申公豹”们，是你们滚蛋的时候了！

1939年12月9日

悼念战友谷景生同志(代序)

薄一波

惊闻谷景生同志不幸病逝，十分悲痛。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失去了一位栋梁之材，我失去了一位相交几十年的老战友。

谷景生同志 1929 年即投身中国革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 70 多年，曾经做过一些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是一个对党和人民有功的人。然而，他又历经磨难，对自己的功绩从不言及，以至今天的许多人对他并不熟悉。如今谷景生同志去世了，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尤其是广大青年，应该记住他的功绩，记住他的名字。

谷景生同志是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 年华北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已经侵占华北大片土地，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正确方针应该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用一切方法去组织民众，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但是，当时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却仍然固守打倒国民党的方针，反对组织广大青年学生向国民党政府争取抗日的民主和自由，并且打击坚持正确意见的市委宣传部长彭涛、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左联党团书记谷景生、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负责人周小舟。

“官司”打到河北省委后，省委肯定了后者的正确意见，并决定立

即改组北平市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由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为加强领导，河北省委随后又派来了特派员李常青。是以谷景生同志为书记的新市委，根据时局的发展，精心组织和领导了12月9日抗日救亡请愿和游行示威。12月16日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

谷景生同志参加革命后就从事白区工作，1933年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团政委，并在战斗中负过伤，具有相当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和军事斗争经验。一二九运动前，他在北平从事左翼文化的领导工作，创办泡沫社和《泡沫》月刊，在进步学生中影响很大。这一切，使得他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领导作用。

毛泽东对一二九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把它和伟大的五四运动相提并论。然而，由于当时地下斗争的特点，作为临时市委书记的谷景生处于一种很隐蔽的状况，以至后来在人们的回忆和党史著作中他的作用被湮没了。对此，谷景生同志长时间三缄其口，坦然处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思想境界。

我和谷景生同志相识于抗日战争初期。1936年10月，我奉刘少奇同志之命，率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山西组成以我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负责和阎锡山建立上层统一战线。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对山西的抗战十分重视，把山西作为坚持华北乃至全国抗战的战略支点。尤其是在平津沦陷的情况下，如果不和阎锡山这个地方实力派搞好统战关系，八路军三个师就很难在山西立足，很难以山西为基地实施战略展开。而如何和阎锡山这样一个抗日又降日、联共又反共、联蒋又惧蒋的人物打交道，需要很高的思想和政策水平。我们肩上的担子重啊！

谷景生同志是第二批由北方局派来担任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委员。对于我们实行的“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三句话方针，一些同志不时带着“左”的情绪发出责难。

谷景生同志由于有一二九运动的经验，坚决地维护这一方针。他的主张很明确：现在抗日是大局，必须抛弃过去的不合时宜的一套，包括做出一些必要的让步和妥协，表现了一种复杂局势下思想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成熟。很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成立。这是一支名义上接受阎锡山领导，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掌握领导权的抗日武装。谷景生同志是决死第一纵队的民运部长，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等工作。这是我们能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一环。

民运工作队队员大多是大学生和初高中青年学生，文化程度和政治热情高，从事学生运动出身的谷景生，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谷景生同志很有眼光，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建立抗日政权上，广泛动员群众，赶走那些过去一贯欺压百姓的旧官吏，团结开明士绅，选举抗日的村长、乡长，直至区长、县长，从而在晋东南把阎锡山的旧政权彻底改造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

新政权下的广大民众，踊跃参军参战。两年多时间里，就有青壮年农民 7000 多人参军，为决死一纵队原有人数的一倍多，从而把决死队以青年学生成分为主改造为以工农成分为主的队伍，极大地壮大了部队的力量。

到解放战争时期，谷景生同志已经先后担任第二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十五军政治委员等职务。1947 年 8 月，他和秦基伟等同志一起，率部队挺进豫西，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确定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

其后，这支部队又打过长江，解放西南，直至渡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在这一战斗历程中，谷景生同志开展了十分出色的政治工作，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值得一说。

一是他在率部进军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发挥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重视地方政权建设，巩固新解放区。部队每解放一

个地区,他就派出一些干部战士去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甚至是整排整排地抽调。

解放洛阳,他担任洛阳市委书记兼城防部队政委;解放郑州,他又担任郑州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这项工作,他抓得很认真、很细。这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举措。须知,没有巩固的根据地,野战军就缺乏源源不断的兵员和粮草,解放了的人民就会受到残存的反革命势力的疯狂报复。但是,由于不断地从部队调人调枪,一些同志包括一些很负责的同志并不理解,说我们的政治部主任变成地方政治部主任了,意见甚至反映到二野刘邓首长那里。邓小平同志后来在西南局会议上明确指出:谷景生同志在豫西根据地的工作,事实证明,他的工作方向和所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

二是他在部队的政治工作中,始终坚持以强有力的革命精神贯注、培养部队。1948年8月,九纵在河南禹县召开建军一周年纪念大会,全纵队排以上干部参加。谷景生同志亲自设计一枚圆形白底红马奔腾的纪念章赠送给每个干部,并以纪念章雕刻的“艰苦顽强”四字为主题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勉励大家以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决战到底的气概去夺取全国的胜利。

渡江战役前,他亲自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两面红旗授予突击部队。抗美援朝,他又突出地宣传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亲自到阵地、坑道前沿与战士促膝交谈。在他的带领下,部队的政治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坚强有力。

正因为如此,九纵和十五军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上打得十分英勇,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主力部队,十五军也成为抗美援朝战场上出英模最多的一个军,涌现了黄继光、邱少云这样两位杰出的战斗英雄,他们至今仍名列中国人民解放军着力宣扬的七大英模之中。仅凭这一点,他这个军政委就当得了不起!

以我在山西新军、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工作的体会,一支部

队会不会打仗,与军事指挥员关系最大;而一支部队有没有昂扬的士气,有没有一股革命精神,与政治工作干部关系最大。

谷景生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上甘岭战役中,第一三五团七连排长孙占元表现也非常英勇,在双腿被炸断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夺取敌方两个火力点,最后在敌人反扑时,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可惜后来总结、宣传得不够,虽然也把他评为一级英雄,但不如黄继光、邱少云那样家喻户晓。作为一名政委,部队有没有士气和革命精神,他感到责任重大,而部队出了英雄模范人物,能不能及时地总结、宣传出去,以教育更多的人,他同样感到责无旁贷。这又是一个很高的思想境界!

从朝鲜回国后,谷景生同志担任防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当时防空军是一个军种。1957年3月防空军和空军合并,谷景生同志调任正在组建的国防部五院担任政委,和后来被称为“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同志一起领导中国导弹事业的初创大业。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有效地保卫祖国的安宁,这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重任。聂荣臻元帅以“生是五院的人,死是五院的鬼”这样的话来要求和激励谷景生同志。

他不负重托,和钱学森同志密切配合,对导弹研究的方向、研究机构的设置、各类研究人员的调入、各项规章制度的拟定等一系列基础性的工作,一一认真调查研究,慎重决策。面对院内一大批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谷景生同志平易近人,和知识分子真诚地交朋友。他对身边的领导干部说:我是政委,但我又是教导员,我按教导员的方法工作,你们就要像指导员一样工作。知识分子不是战士,要用关心爱护战士一样的心情去工作,但又不能用对待连队战士一样的方法去对待他们。

当时,反右斗争已经开始,谷景生同志深感政策掌握得好坏,对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一批老专家,对导弹研制任务的完成,必将

影响很大。最后,他顶住各种压力,使五院几十位高级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100多名青年知识分子,只有一名新来的大学生被定为右派。这位同志到北大荒农场之前,谷景生同志还深感不安,派人和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还给接收单位打招呼,请求予以照顾。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

谷景生同志在五院工作时间不长即被调离,然而五院的建设框架是他和钱学森同志一起打下的。钱学森同志后来回忆说,他和谷景生同志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20世纪90年代,党和政府大力表彰中国最早一批从事两弹一星的功臣,许多老科学家还动情地说:讲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人——谷景生,称他是我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人。

和许多老同志一样,谷景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被关押审查长达12年之久。然而,复出以后,他没有过多的抱怨,而是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1978年11月,他刚刚平反,回家住了八天就飞赴广州,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协助许世友司令员和向仲华政委,指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许世友同志后来多次这样说:谷景生有胆有识,能文能武,让我非常省心。

1981年,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抬头,南疆喀什、叶城等地先后出现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煽动群众闹事的事件。如何保持边疆的稳定,是一件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在这紧要关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调谷景生同志到新疆就任区党委第二书记和乌鲁木齐军区政委,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就我所知,谷景生同志这次任职和前任广州军区副政委,都是小平同志最后拍板的,说明小平同志对他的了解和信任。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又一次重托。

谷景生同志到新疆深入了解情况后,明确提出了把稳定新疆局

势、坚持民族平等、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放在第一位的工作方针。在具体工作上,他首先做少数民族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工作,和他们广交朋友,提出“两个平等”,即坚持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这一思想,深得人心。同时,他和区党委的同志一道,果断而又审慎地平定了骚乱事件,迅速稳定了人心,清除了乱源。在生产上,他大胆起用那些熟悉经济工作的干部,包括那些尚未解放的同志,使新疆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市场也逐渐繁荣起来。短短一年多时间,新疆的局势稳定了,干部之间的团结和民族团结实现了,经济也发展了,显示了谷景生同志很高的思想、政策水平和很强的驾驭全局、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受到邓小平同志的称赞。

1983年,他到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工作,率中央联络组赴东北、华北,也是善于化解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同样表现了他很强的政治才干。因此,说他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栋梁或干城,是不为过的。

还有一点应该说及。1957年反右时,谷景生同志的妻子范承秀同志在北京市委党校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说话,被打成右派和“反党集团”,有关方面要他和妻子离婚。当时,全军授予将军军衔的高级干部中被打成右派的,惟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同志一人,将军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惟谷景生同志一人。

谷景生同志当时正在国防部五院,是受到重用之时。妻子怕连累他,也提出要离婚。然而,谷景生同志却断然拒绝。他对妻子说,你这个范仲淹的后代,14岁就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游击队长,进了四年马列学院,可以说是笃信马列,怎么会说几句公道话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呢?妻子哭了,他因此被调离五院降职使用,但他无怨无悔。谷景生同志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崇高品格是令人感慨和敬佩的!

作为谷景生同志的老战友或老领导,我在这里讲了一些他的功

绩和高尚品格,目的是为了缅怀逝者和教育我们的后代。我想,从不宣传自己的谷景生同志九泉之下有知,是会理解的。

2004年12月22日

痛悼开国将军谷景生老前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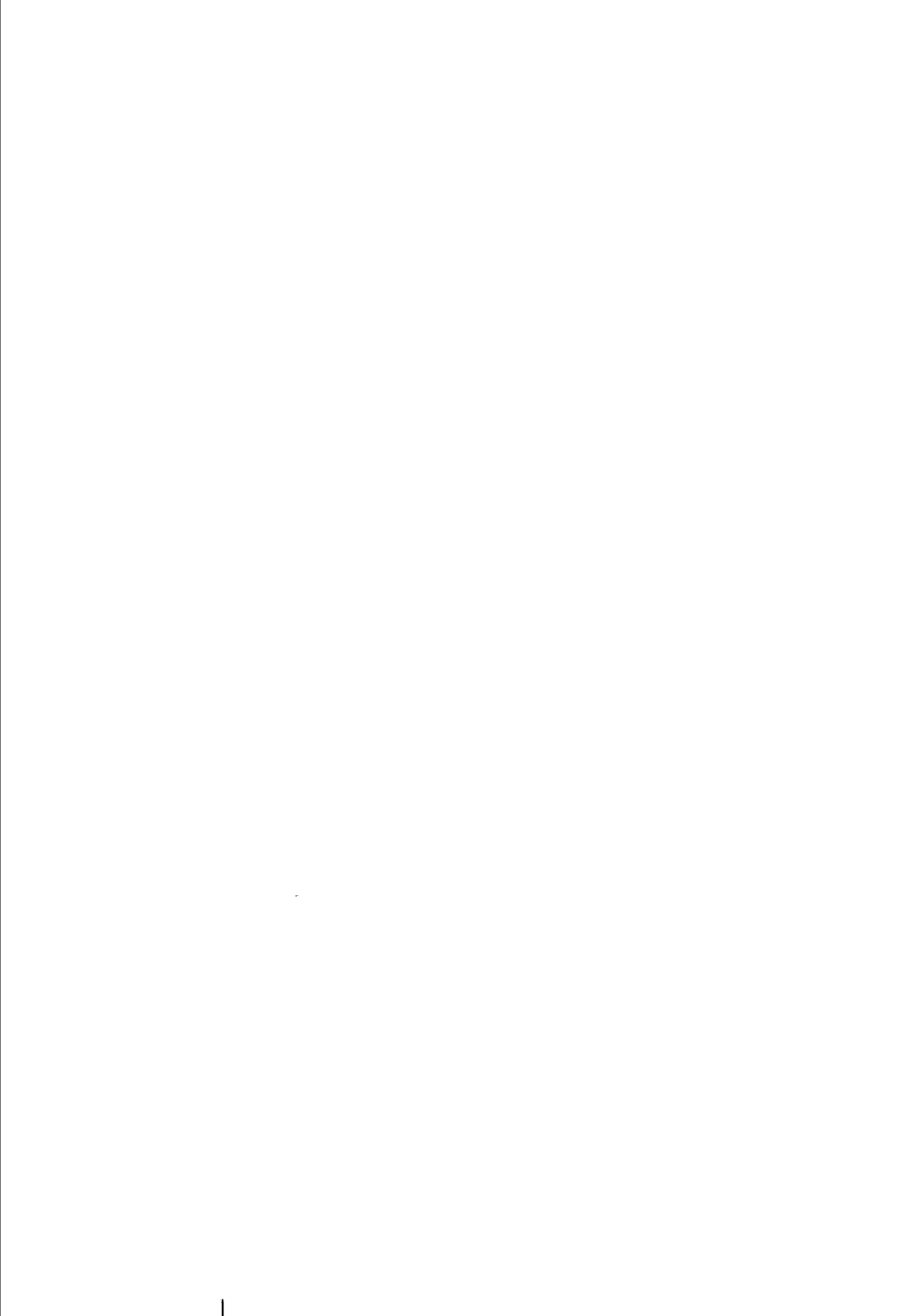
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 李继耐

鲜有豪杰磨难少，光辉一生奇迹多。
播洒真理陷前阵，救亡学运掌主舵。
转战太行抗倭寇，蹈海跨江斩阎罗。
大捷可数上甘岭，威名远扬凉山坡。
博览群书风度雅，英勇善战众评说。
军地皆能称奇才，荣辱不惊堪磊落。
历经风雨气节坚，海纳百川胸襟阔。
前贤可敬今犹在，丰功伟绩千秋歌。

2004年12月9日

一、一二九追溯及史料中的谷景生

毛泽东说：“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回忆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地下党

谷 景 生

1932年，我在北平平大高中参加中国共产党。憧憬于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那时，祖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生死存亡关头。我怀着满腔热血，投身北平白区的革命斗争。

北平地下党组织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由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更加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又疯狂地向华北进行新的侵略扩张。1933年1月攻陷山海关，继而向热河、察哈尔和冀东进犯，威胁平津。5月，国民党政府又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把热河、察东、冀东大片国土拱手送给了侵略者。平津及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

1933年，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察哈尔，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在共产党员、西北军将领吉鸿昌的奔走联络下，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人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

党派我到张家口中共前委机关报《群众日报》做编辑和记者工作，后调我到抗日同盟军即宣侠父师任宣传科长，又调张韬团任团政委。在党的号召下，北平几百名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陆续参加了这

支武装。抗日同盟军抗击日伪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但是，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抵抗日本侵略者，反而用种种手段破坏抗日同盟军抗日。蒋介石调遣了 15 万余兵力“围剿”抗日同盟军。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队夹击下，抗日同盟军失败。

那时，我们的部队在进攻北平附近的昌平小汤山一带时被打散，我在战斗中负重伤，子弹穿过左肩胛骨，伤及神经，半身瘫痪，倒在血泊中。北平的红十字会把我送到青龙桥临时医院，治疗了一个时期。后来，北平地下党组织把我接出来，安置在第四中学一个名叫周颐的同学住的公寓里，在协和医院就医治伤。

我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时的同学楚显，代表党组织和我联络，后来改为一女学生模样的叫小唐的女同学和我联系，并帮助我料理一些生活问题。过了段时间，她说要到南方去执行任务，回来再联系，但以后再也没来。不久，我发现有行动诡秘的人注意我，觉得不对劲，为了安全，就搬至西城太平湖一所公寓住下。

1934 年底或是 1935 年初，还是穿棉衣的季节，我偶然在街上遇见了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同学彭涛，他也是从抗日同盟军回来后失去党的关系的，当时他在辅仁大学。两人相见，分外高兴。我们共同分析了形势，相约寻找党的组织，同时做群众工作，先从同学中着手发展关系。我们在同学中组织过读书会等组织，团结了一批爱国青年，渐渐积聚了一些革命力量。

大约在 1935 年四五月间，彭涛同志告诉我，已找到了党的组织，同意恢复我们党的关系。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已经成立，由王健（王学明）、彭涛、杨子英三人组成，王学明任书记，彭涛任宣传部长。市工委决定由我担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党团书记（即现在的党组书记）。

文总是党在北平文化教育界外围组织的联合体，包括左翼作家、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世界语者、教育劳动者等同盟。

我们从读书中会发现进步分子,吸收到左翼文化组织中来,再从这些成员中发展党团员。左联、社联、语联和教联,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在许多大中学校都建立了组织。当时,左联在各校的支部书记:师大是杨采,中大是鲁方明,燕大是王洪祺,清华有魏东明,还有朝阳大学、平大法商学院及一些中学和陕西会馆、河南会馆、四川会馆、山东会馆等都发展有左联成员,吸收了许多进步的准备考学的青年。我还担任了左翼作家联盟外围刊物泡沫社社长。泡沫社在北平伪市府社会局登记,社址设在新鲜胡同 27 号吕奎龙家里。因其父开始是冀东 22 县烟酒税务局局长,便于掩护,比较安全,后成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机构。在《泡沫》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进步文章,吸引了许多革命青年。不少受到《泡沫》影响的青年,后来成了知名作家。

当时,参加编辑和写稿的有北大的魏伯、清华的陈落、东大的白晓良,女子文理学院的张晋媛和艺文中学的吕奎龙,还有流亡学生刘曼生(现名谷牧)。我介绍谷牧成为左联一般成员,又发展他入党后,让他参加《泡沫》的写稿。

一二九运动的前奏

在 1935 年 5 至 7 月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华北的统治权,并调遣大批日军人关,以武力相要挟。国民党政府屈辱地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将冀察的主权丧失殆尽。而且,还颁布了《邦交敦睦令》,取缔抗日团体和一切抗日活动,规定报刊不准出现反日言词,甚至“日本”二字只能用××代替。

日本加紧策划“华北自治”,企图建立由其控制的伪政权。汉奸活动猖獗,日军在北平、天津横冲直撞,耀武扬威。侵略者的飞机在平、津、保的上空低空飞行。日军指使汉奸公开进行反共自治活动。

华北危机，平津危在旦夕，大难将至，民族将亡。“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深感国亡无日的切肤之痛，愤怒的火焰在胸中燃烧。于是，我们在7月间组织了向何应钦请愿的活动。爱国青年聚集在新华门外挥舞着写有抗日要求的小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吁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求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和全国一切抗日团体。

参加这次请愿的有大学生，多为中学生。有汇文中学、育英中学、女一中、女二中、贝满女中、念一中等学校，可以说这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奏。请愿后，我们非常振奋，彭涛、周小舟（武委会党团负责人）和我主张今后用公开的、合法的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等斗争方式，唤起民众的觉醒。

夏秋期间，连下暴雨，长江、黄河泛滥成灾。冀鲁豫流离失所的灾民，涌入北平的大街小巷，乞讨的灾民饥寒交加，急需救援。上级党组织指示，开展救灾活动，并把救灾活动与揭露国民党政治腐败、鱼肉百姓的本质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结合起来。

彭涛、周小舟和我，运用党的外围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和左翼文化组织，发动大中学校学生开展赈济活动，走上大街募捐。这一活动受到各界群众的同情和大力支持。我们于9月成立了北平各校水灾赈济会，并到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备案，成为合法团体。东北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北大、女一中等校先后成立了分会，救济活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在它的周围，团结了愈来愈多的爱国青年。

1935年秋天，我和彭涛、周小舟先后从不同渠道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文件，懂得了无产阶级要如何与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明确了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方向。根据上述精神，我们认为并提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抗日救亡是民族的心声，坚持团

当时到处散发的经宋庆龄等人签名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实际上是党中央于1934年制定的),已有新的精神。王学明、冷楚死抱着过去提出的“创造北方苏维埃”的口号,反对利用合法形式,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意见分歧,争论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王学明、冷楚竟采取组织手段说彭涛和我、周小舟是“右倾小集团”活动,决定撤销彭涛的宣传部长职务。这是非常错误的作法。我对王说,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应由河北省委决定。王不接受我的意见,我们在省委没有明确决定前,仍照以前一样和彭涛一块工作。

为此,我们给省委写了报告,交王转,他未给转。我们只好想方设法,派人到天津找河北省委直接申述我们的意见。同时,坚持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民主运动。从报上看到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将要召开,我们决定发动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提出抗日民主的要求,组织平津十所大中学校代表商讨,决定以各校联名电呈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形式,拟定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于11月1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

我们抓住时机,立即决定于该月18日,在北平各校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成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着手酝酿组织抗日游行。学联主席是女一中的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彭涛、周小舟和我组成学联党团,成为学联的领导核心,彭涛为党团书记。按分工,彭涛、周小舟可以参加学联的公开活动。我们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学校继续深入发动青年学生,如东北大学、师大、清华、燕大、中国大学、平大法商学院、北大、女一中、女二中、镜湖中学等校。周小舟去南方执行特殊任务时,由我和在北大读书的俞启威(黄敬)联系,周小舟也曾介绍彭涛和俞相识。大俞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多次开会,分析华北危机的形势,认为要求抗日救亡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呼声,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犹如

大地布满了干柴，一个火星即可引起熊熊烈火，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北平党内的意见分歧与激烈斗争

在日军加紧推行“华北自治”的关键时刻，北平地下党组织内部的意见分歧却已发展到白热化，形成激烈的斗争，情况紧急。我们速派周小舟去天津，向领导北平党组织的河北省委汇报了北平党内的意见分歧，说明我们的意见。认为目前已处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夜，党应当广泛地发动群众，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市工委主要负责同志王学明、冷楚则认为，发动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是右倾，应该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

中共河北省委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后，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批准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并决定立即改组市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决定我任市委书记兼团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周小舟回到北平后，在北海公园的一条小船上，给我和彭涛、郭明秋传达了省委的决定。

临时市委成立后，原工委主要负责人王学明、冷楚不服从省委决定，派人去天津找省委，提出应进行所谓“内部的反派别斗争”。省委坚持撤销北平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决定，并派李常青为特派员，来北平领导北平市委的工作。我们信心倍增，集中全部精力，继续以前的方针，把发动学生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壮大抗日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工作。

这一个时期，我住机关，多不公开出面。机关先设在什刹海附近的一个民房里，师大女附中学生高惠茹和我住机关（即假夫妇）。后搬到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一间民房，由另一女生小王和我住机关，高

惠茹调彭涛处住机关。

那时，团的组织发展很快，女一中、女二中、汇文、贝满女中、两吉中学、北大、清华、师大、中法等大中学校都成立了支部。和我直接联系的就有女一中、女二中，可能还有一个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的革命工作，是由我亲自发动，直接领导，单线联系。例如女一中学生杨彤介绍我认识了郭明秋（原名郭桂英）。后来我介绍她入党，让她在女一中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让她任支部书记。她满怀革命激情，立场坚定，又很能干，所以在成立学联时，我就决定让她担任北平市学联主席，彭涛、小舟亦同意。我和郭明秋以夫妻的名义，保持着密切的单线组织联系。

12月6日，北平学联发表宣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的九条纲领。平津15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通电，要求政府讨伐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汉奸头子殷汝耕，动员全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人民以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发展，各大中学校相继成立了学生自治会。民族武装自卫会和左翼文化组织的成员，都成为学生自治会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在他们周围，聚集着众多的爱国青年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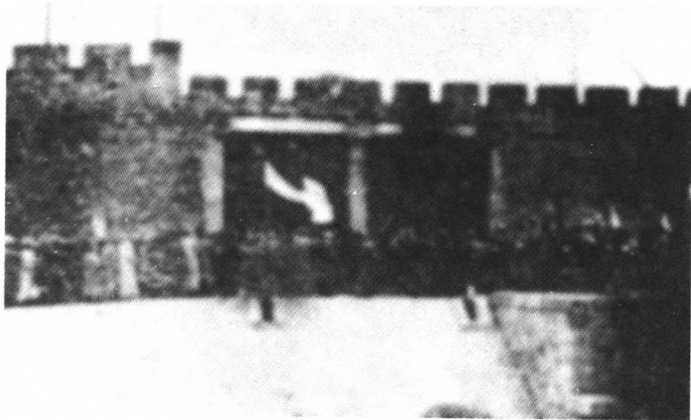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1935年12月9日，是国民党政府和宋哲元、日军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日子。这实际上是实现日军图谋已久的“华北特殊化”，使华北五省全部沦入敌手。在这样的危机关头，北平市临委当即决定，于12月9日这一天，由学联组织北平爱国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强烈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

我们在抗日同盟军中学到的军事知识，从党办的《长城》杂志中学到的游击战术，都派上了用场。事前，我们做了认真的准备，确定

了活动的原则，研究了具体战术。

12月9日早晨五点多钟以敲钟为号，各大中学的学生冲出校门，怀着满腔热血，向何应钦行辕进发。这一天，正值寒潮袭来，气温骤降，西北风吹来，凌厉刺人，但同学们的爱国热血在沸腾，愤怒的心像烈火般燃烧，完全不觉得严冬的寒冷。



12月9日早晨西便门紧闭着。

警察当局事先听到了学生要请愿游行的消息，清晨就下了戒严令，派警察堵住许多学校的大门，并在一些学校的要冲布置了岗哨，企图消灭这次运动。但是，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青年学生们，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指导和学联的具体领导下，自黎明时起，就按预定的计划，积极行动起来了。

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大家都认识到东北沦亡，华北垂危，学生已无法安心读书，国难当头，同学们应拿出力量，动员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而这次请愿就是我们抗日救国的一次行动。各学校的学生们，高举着自己学校学生请愿的大旗，手挽着手，潮水般涌上街头。当他们喊出了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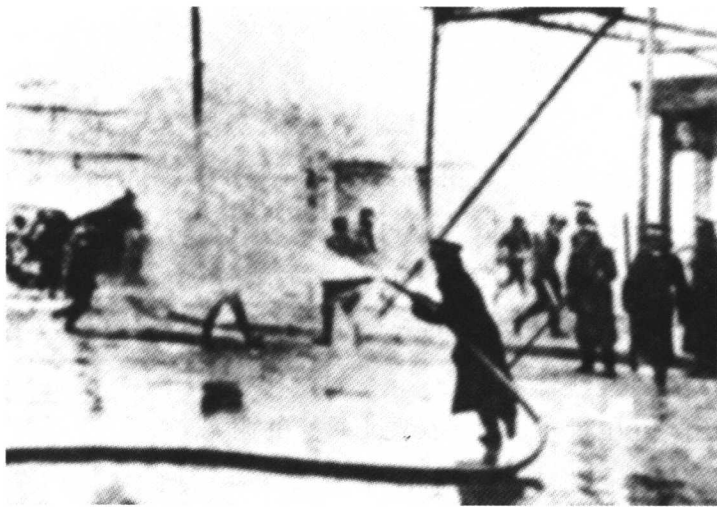
学生们冲断了城门的铁锁后，在欢呼声中进入城内。

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时都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当请愿游行队伍被武装警察堵住去路时，同学们紧挽着手臂，高呼“争取爱国自由”的口号，大踏步地向着军警走去。在“冲啊！”“冲啊！”的怒吼声中，冲破了道道封锁，跑步奔向新华门。何应钦就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办公。

当天，新华门紧闭，门前排列着警车队和架着机关枪的摩托车，还有手持大刀警察、警备司令部的宪兵、平津卫戍司令部特务营的士兵，杀气腾腾，如临大敌。这更激起广大学生的极大义愤。他们在

新华门前的广场上，挥舞着旗帜、标语，不停地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此起彼伏的口号声，经久不息地回荡在新华门上空。学生们派代表提出六项要求。要何应钦出来与学生见面，答复六项要求。何应钦避而不见，更加激起学生群众的愤怒，高呼“打倒卖国贼，不打倒卖国贼就不能救中国”、“卖国贼不是人”等口号表示抗议。

此时，根据临委指示，学生请愿迅速转为示威游行，并确定了游行路线。抗日救国的洪流，涌流在长安街上。在行进中，不停地向沿街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沿街群众热烈地鼓掌支持，争相抢阅游行队伍散发的传单。



反动派出动大批军警用水龙向游行队伍喷射。

游行队伍越走越大，浩浩荡荡，冲过了层层军警、大刀队的阻拦。警察以为游行队伍要冲击日本使馆，又调来大批警察，手持大刀、木

棍等凶器，虎视眈眈地准备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一批日军和日本浪人也出动了，沿街架起了机关枪。杀气腾腾的局面并没有吓退爱国学生，爱国学生的游行队伍仍在继续前进。敌人以水龙头向学生队伍喷射，冰冷的水柱像一把把尖刀扎在学生的脸上、身上。同时，军警挥舞皮鞭、枪柄、木棍袭击过来，学生们与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很多学生受了伤，流着血，愤怒地高呼：打倒汉奸走狗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沿路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游行队伍越来越大，抗日救亡的吼声惊天动地，革命斗志昂扬，气壮山河。

这一划时代的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爱国学生运动，掀起的民族革命的巨流波澜壮阔，打乱了敌人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图谋。一场震惊中外、名垂青史的一二九运动，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

接着又爆发了一二一六运动。我们临时得知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在16日这天，再发动一次大示威游行，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把学生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由临委具体确定示威游行路线和各路总指挥。于是，12月16日，北平城再次爆发了爱国学生震惊中外、波及五洲四海的抗日救亡大游行。这一次示威游行，在临委的紧张筹备、周密部署下，比一二九当天的规模更大，参加的人数更多，更广泛，准备更充分，组织更严密。

游行队伍在行进中不断遭到军警的阻截，军警挥舞着皮鞭、大刀、木棍、竹竿子、枪托等凶器向学生袭来，游行群众气愤至极，与军警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搏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最响亮！这是几年来蒋介石不许谈抗日的禁令下，强压在胸中的怒火爆发出来的心声。

这一天和军警搏斗中，爱国学生有几十人被捕，数百人受伤，重伤的送进医院。游行队伍最后汇集在天桥广场上，召开了市民大会，



反动军警用大刀、木棍等向游行队伍袭击。

当宣布大会开始后，顿时广场上旗帜翻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此起彼伏。学生代表黄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爱国请愿示威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活动，迫使他们不得不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游行示威取得了胜利。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一六运动。

当时，地下党严格规定，党的领导干部不能参加公开活动。一二九那天，我和李常青不能上街参加活动。一二一六这天，我和李常青实在压抑不住兴奋的心情，一同来到前门大街，观看怒吼奋进的游行队伍。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面对张牙舞爪的敌人，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激发了沿街群众及全市人民抗日救亡的激情，生死已到最后一关头，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决心深深扎到广大爱国人民的心中。



游行队伍在正阳门召开群众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等议案。

先烈功绩永志丰碑

一二一六之后，全国震动，各地学生奋起响应，社会各界纷纷声援，掀起了一个全民族抗战的高潮。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采取了种种手段分化学生运动。他们组织了伪学联，诱惑学生到南京去“聆训”。

为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阴谋，让青年学生继续在斗争中成长，使学生救亡运动健康发展，北平临委决定，组织学生南下宣传团，到工人农民中去，唤起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团南下后，根据工作需要，我退出了临委书记职务和学联党团成员，专任团市委书记兼文总左联书记，李常青接任市委书记。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大游行之后，国民党反动当局惊恐万状。断定这样有组织、有纲领、有策略的大游行，一定是共产党的严密组

织和领导,绝不可能是学生自发的运动。于是,国民党当局派出大量军警宪特抓捕了近万人,我也被捕入狱。后来经过曲折、巧妙的狱内狱外各方人士的斗争,被捕人员逐步放了出来。

我是到朝阳区内新鲜胡同 27 号泡沫社开会时被捕的。在监狱里,敌人只知道我是学生,丝毫不知道我的身份。当时,我有三个住处,一是正式注册的艺文中学宿舍,那里有我的床铺;还有沙滩北大东斋 61 号;另外就是经常住宿的东城一家民房。

敌人只知道艺文中学宿舍,搜查一次,其他两处未遭到搜查。在被捕的当天,贝满女中于恩溪立即告诉市委交通,组织上知道我已被捕,就及时转移了我住处的文件。敌人没掌握我丝毫东西,就放我出狱。经组织审查后,仍任中共北平市委文化委员,继续做团市委书记、文总和左联党团书记,李常青、李雪峰和何凤元先后领导过我。李常青从一二九运动之日起,到 1936 年底我离开北平赴山西就任之前这一时期,始终以省委特派员或市委名义和我发生着密切的组织关系。我和李常青、彭涛、周小舟同志在北平地下党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下进行革命斗争中,结成了生死之交的亲密战友。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的一次成功的抗日救国运动,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准备。运动从始至终都得到了党的正确领导。一二九运动发生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之时,形成了遥相呼应之势。这次运动发出的“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怒吼,代表全中华民族的心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揭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

毛泽东同志在 1939 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作了这样精辟的论述:有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这是不对的。我认为,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推动了七七抗战发展成为全民抗日运动。

一二九运动已经过去整整 66 年了,组成北平临委和学联党团的同志中,彭涛同志因病于 1961 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周小舟同志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黄、周、张反党分子,被迫害致死,已不在人间;李常青同志也历经坎坷,被打成反党分子,不幸长辞人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在此,我特向在一二九运动中做出贡献的彭涛、周小舟、李常青、黄敬以及给我当过交通、住过机关的所有同志,表示深切的敬意和缅怀!他们的历史功绩永志丰碑。

一二九运动的爱国主义革命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将激励我们这些幸存者和青年一代,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振兴中华,奋勇前进。

原载《党的文献》2001 年第二期,《人民日报》1995 年 12 月 9 日

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人物学科》副主编 张如贤

引 言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国青年学生运动史上的光辉典范,也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一二九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时所指出的那样:“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因此,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把可歌可泣的一二九运动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下来,并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对今天的中国青年将是一部有益的爱国主义教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在一些公开发表的一二九运动回忆录文章和史料中,笔者感到有一些重大史实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违背历史的说法和观点。比如一二九运动是学生自发的,还是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时党的领导者到底是哪些人?对于这些重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众说不一,真伪难辨。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四点:

其一,有的人不了解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特点。当时的北平是处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为了广泛发动和组织学生,又不使党的组织遭到暴露和破坏,党是通过一些单线联系,培养一批骨干出面公开活动的。这些活动在公开场合的人,有的是学联负责人,有的是学生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还有相当一批是正在接受党考验的进步青年。一二九运动就是在这种不为外界所知,甚至也不为每个党员所知的层层组织系统中被组织发动起来的。然而,有些人不了解这些情况,就想当然地认为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

其二,有的人,甚至一些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当事人,通过发表回忆文章,有意无意地使一些史实被歪曲或被篡改。有的人还自吹自擂,把自己本是某大、中学校的学生或学生积极分子,说成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结果在一二九运动史的研究中,使人经常在此处听到张三是领导人,而在彼处又听到李四是领导人,弄得历史失去原貌,以讹传讹,莫衷一是。

其三,有的人写史、论史不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是以现实中人的政治地位高低来写史论史。这个问题在一二九运动史的研究中尤为突出。比如有的人在当时一二九运动中只是某学校党支部的负责人或一个普通党员,但由于建国后随着在党内的地位逐渐提高,名气逐渐增大,有的人就机械地认为他们是一二九运动中党的领袖。甚至有的人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并没有任过北平左联书记这样重要的职务,只是一般的左联成员,但也由于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后曾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些传媒就公开在报纸上登出其是北平左联书记的职务。这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

其四,现已被历史事实证明:一二九运动时党的领导者是谷景生、彭涛、周小舟和李常青。但不幸的是,这四人中有三人早在建国初期就先后在政治上遭到迫害,从而失去了对一二九运动重大史实

的发言权。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松辽(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李常青,因惨遭政治迫害致死;20世纪50年代后期,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小舟,亦因被打成“彭、黄、周、张”反党集团,不久便含冤告别人世;20世纪60年代时任化工部部长的彭涛,虽幸免于政治迫害,却又被病魔过早地夺去了生命。

唯一幸存的谷景生,1957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时,也因妻子范承秀被打成右派,受到株连被降职。接着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扣上叛徒等政治帽子,开除党籍12年,坐牢八年,成了政治上的“哑人”。正是由于这四位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过早地受到不同的遭遇,而使一二九运动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犹如一团迷雾,笼罩了整整半个世纪,一直得不到廓清。

然而,令人欣慰而惊喜的是,1995年正当全国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之际,《北京日报》发表了当年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谷景生的《一二九与党的领导》的纪念文章。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青年报》、《瞭望》等报刊陆续转载;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又作了专题报道,使人们终于知道了一二九运动党的领导的一些真实情况。鉴此,笔者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访了这位唯一的历史见证者,年已87岁高龄的谷景生老人,并了解了他在一二九运动中的重大经历和光辉业绩,以及一二九运动前后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实。

2000年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65周年纪念日。值此,笔者将此拙文发表于世,以期有助于一二九运动史的深入研究和发

(一)

1931年9月18日深夜,一件关系中国命运、震惊全国的大事突然发生: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和沈阳城发动军事进攻。其时,由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很

快在短短四个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从此，中国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3000万骨肉同胞和无尽宝藏沦于敌手。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

面对这亡国惨祸迫在眉睫的现实，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迅速在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各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激愤，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函电，强烈要求政府救亡抗日。正如“义勇军进行曲”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喊出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满腔激愤。



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上海、杭州、南京、汉口、广州、西安……相继爆发了示威游行。

就在这一年，年仅17岁、就读于山西太原一中的谷景生，早已在1929年经太原一中图书馆管理员张盘石（地下共产党员）的介绍，参

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在学校的活动中,吸收了许多积极追求光明和真理的热血青年。谷景生与同学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党办的《向导》、《生路》等进步刊物,自觉地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

这一年,太原一中的读书会在学校的操场上召开过一次纪念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校园各处张贴了“打倒军阀”、“为死难烈士报仇”、“取消辛丑条约”等标语。面对学生们的这种爱国热情,校方领导却千方百计的压制,公开警告学生们“要回教室好好读书,国家大事,由政府处理,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闹事者要开除学籍的……”。而学生却反问校方:“反动军阀,杀戮无辜,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这如何能使我们安心读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犯了哪条王法?”校方对这些质问,只能哑口无言。

谷景生在参加读书会的这些革命活动中,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在这期间,为了扩大民主思想的宣传,团结更多的进步学生,谷景生还向张盘石老师建议,在读书会的领导下,再办一张小报,名叫《一中园地》。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张老师的支持,谷景生还担任了这个刊物“文艺版”的编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蒋介石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不抵抗主义,是年11月份,太原一中的进步学生又在太原市地下党组织的发动下,举行了一次抗日救亡的飞行集会。

太原的初冬,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这天,太原大街上熙熙攘攘,人流如潮。各家店铺门口、街道两旁,到处都是数不清的人群。人们挥舞旗帜,手举各色标语,高喊“团结起来,抗日救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谷景生也挤在人流当中,与群众一起高呼着口号。这时,广场上已聚集成一片人的海洋。由于人群的骚动与激荡,很多旗帜都变成了破碎的纸片,谷景生手中的小红旗也被挤得不知去向。接着,指挥游行示威的人发出游行开始的信号,太原一中的学生走在

队伍最前列。谷景生、王魁金等几个读书会的学生，不畏军警的阻拦，边走边带领大家高呼口号。这时路边的人也陆续加入了游行队伍，人流像潮水一般，冲开前来阻止学生游行的军警，继续向前行进……

这次游行示威引起校方极大的恐慌，国民党太原当局对青年学生实施了更加严厉的查禁。此后，谷景生这位进步青年，逐步得到了共产党员张盘石老师的赏识和器重。张老师一心想把谷景生培养成一名共产党员。

(二)

1932年初春，谷景生于太原一中毕业后，与六七名同学结伴随张盘石老师赴北平参加革命活动。到北平后，为了安全起见，谷景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实际上主要是参加地下党组织的一些革命活动。

一天，张盘石按地下党的指示，组织他们几个同学，秘密到街头张贴和散发传单，制造舆论，以迫使国民党当局尽快释放已被捕的国际友人牛篮夫妇。

这一天的晚上，谷景生接受任务后，按两人一组将传单分发给几个同学，然后分头到大街小巷张贴散发。他和刘毅同学分在一组，每到一个胡同，刘毅在胡同口放哨，谷景生进胡同里贴传单。一旦遇有巡警，刘毅就拍两下大腿或晃两下手电筒，谷景生闻讯立即从胡同另一端逃走。就这样，不到一会儿他们就跑了四五个胡同，几十张传单贴了出去。后来谷景生提议，光在这些小胡同贴传单看的人少，干脆到大街上去贴，看的人多，影响更大。商量定后，两人到灯市口大街，借着昏暗的路灯，躲开巡警，飞快的在墙上贴着传单。这一夜他们跑了三四条大街，把100多张传单全部贴了出去，勇敢地完成了任务。

后来谷景生回忆,这次行动是他来北平第一次参加组织交给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

随后,在张盘石的介绍下,谷景生先后参加了北平左联、“社联”和反帝大同盟,并担任了党的外围组织办的旭社社长。当时参加左联、“社联”、反帝大同盟等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都有强烈的革命要求,爱好文艺,向往未来,怀着满腔热情参加到左翼阵营来,希望能为革命文化事业做出一些贡献。谷景生就是怀着这种愿望,积极从事着左翼文化团体活动。

那时,谷景生的主要活动是参加读书会,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写文章宣传爱国抗日思想,参加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等。参加这些活动都有极大的危险性。国民党当局规定,凡参加游行示威和读书会、传递进步刊物的,一律当作共产党人看待,要判刑甚至杀头。尽管如此,谷景生还是毅然参加战斗,积极从事左翼文化团体的各项活动。

通过这些革命活动的磨炼和火热的斗争生活,谷景生更加坚定了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决心。他在日记中曾写道:“确立一种正确的人生哲学于每个人,那是生死攸关需要……我之所以把共产主义当作奋斗目标,是因为中国需要一种进步的主义,一个解救中华民族的政党……”此后不久,在共产党员牛照曦的介绍下,谷景生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转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之后,谷景生受地下党组织委派,担任了中共河北省机关报《反帝青年》的编辑兼校对。在这时期,谷景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地下党的工作。他一方面积极写文章,揭露日军在北平恣意横行、残害国人的暴行,一方面负责将编辑好的《反帝青年》想办法带到平大高中,散发到学校图书馆各地,向青年学生传播爱国抗日思想。

就这样,通过谷景生等党员学生的积极工作,当时许多进步青年都主动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不断扩大了爱国抗日的群众性阵线。1932年冬,鲁迅先生到北平作过多次演讲,谷景生与左翼文化

团体的成员一起亲聆了鲁迅的演讲。鲁迅的演讲在北平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鼓舞了青年们的爱国热情,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谷景生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1933年初,由于校方发现了谷景生和彭涛等同学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事,平大高中公开宣布开除了他们学籍。面对这一突然事件,谷景生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更加坚定了革命理想和信念。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段李大钊烈士的话:“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唯知跃进,唯知雄飞……”以此激励自己,并把它作为座右铭指导着自己的一切行动。

离开平大高中后,地下党组织又安排谷景生担任反帝大同盟机关报《反帝新闻》主编。这时,虽然北平地下党组织经常遭到破坏,但地下党活动并没有停止,许多共产党人,革命积极分子,仍然前仆后继,坚持斗争。

时逢,传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于1932年4月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独立和解放。同时号召:白色统治地区的工农兵学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卫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

谷景生从地下党员施繁夫手中得到这一文件后,立即组织地下交通赵贵碧和刘杰,他们三人一起连夜刻钢板,将此文件刊登在《反帝新闻》报上,然后乘黑夜到大街小巷散发张贴了出去。此事,极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当局,立即派出大批军警进行侦缉。不久,由于内部的泄密,谷景生得知赵贵碧被捕了。他立刻警觉起来,迅速通知刘杰将《反帝新闻》转移到另外,不畏敌人封查,继续开展活动。

同年4月,鉴于李大钊于1927年4月遇难后,其灵柩一直停放

在北平妙光阁街浙寺，未得安葬。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党组织的领导下，由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北平文总、河北省互济会党团负责，发起了为革命先烈李大钊举行公葬的活动。

殡仪于22日开始，先在妙光阁浙寺举行公祭。李大钊的生前好友和左联、“社联”，反帝大同盟等大多数成员都前去灵堂祭奠。这一天，谷景生怀着悲痛的心情，把他连夜写成的一篇祭文，亲自焚化在李大钊祭堂前。他在祭文中最后说：“我一定继承您的遗志，用您对革命的忠诚和精神，唯知跃进，唯知雄飞……”

第二天，举行公葬。谷景生又随着学生、工人、农民、士兵、市民等700余人组成的送葬队伍，高举着挽联、抬着花圈参加送葬。队伍由浙寺出发行至西单举行路祭时，队伍中唱起国际歌，高喊“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政府”、“欢迎红军北上抗日”、“为李大钊烈士报仇”等口号。有人还站出来演讲李大钊生前事迹、控诉反动当局杀害李大钊的罪行。沿途的群众也不断地自觉加入送葬队伍，形成了一支浩荡的洪流。当队伍继续行至西四准备再次路祭时，蒋孝先的宪兵三团出动大批宪警乘车赶来，以“妨碍治安”为名，开枪拦截，四处追捕学生，送葬队伍终于被冲散了。但仍有少部分队伍向香山万安公墓前进。这时，谷景生机敏地跑到一家中药店，被老板藏了起来。待宪警搜捕过后，他一个人继续追赶队伍到香山万安公墓，参加了李大钊烈士的安葬仪式。

实际上这次公葬活动，是爱国的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进行的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也是强烈号召国人团结起来反蒋抗日的一次爱国行动。之后，参加公葬活动的人们，继承李大钊烈士遗志，高举反蒋抗日的旗帜，更加勇敢地战斗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

(三)

1933年春,日军出兵进犯察东。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察哈尔,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原西北军将领吉鸿昌(共产党员)联络冯玉祥、方振武,共同发起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

同盟军成立后,积极对日作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旋即,中共北方局决定,由中共河北省委派得力干部,前去支持和帮助同盟军抗日,并在察北成立了中共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柯庆施任书记。

一天,谷景生被共产党员施繁夫叫去,向他转达了北平市委决定,派他到察哈尔前委工作。此次到同盟军去的还有彭涛。谷景生受领任务后,立即准备好行装,于次日晨乘火车到达张家口,按接头暗号与组织取得了联系。谷景生到前委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柯庆施。柯庆施经过与谷景生简短的交谈之后,安排他在前委主办的机关报《民众日报》任编辑。然后,柯庆施就从抽屉里拿出一篇稿子交给谷景生说:“这是‘肺病鬼’写的一篇揭露华北停战协议的文章,你看看,发在明天第一版头题。”这以后,谷景生经常看到这位化名“肺病鬼”的文章,但一直不知道他是谁,直到解放后才知道,“肺病鬼”就是陈伯达。

谷景生在《民众日报》当编辑时,抗日同盟军提出了许多抗日方案,如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同盟军誓以武力收复失地;同盟军主张联合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势力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等等。这些宣言均在《民众日报》上作了报道和宣传。

同时,为抗击日军进犯,同盟军还组成了以冯玉祥、方振武、佟麟阁、宣侠父等 11 人的军事委员会。旋即,同盟军在张北、清源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先后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城市,并收复了多伦。但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却用各种手段,破坏同盟军的抗日爱国行动。同年 7 月,蒋介石与汪精卫电告冯玉祥“勿擅立军政名义”以示警告。同时,国民党调集 16 个师计 15 万人,与日军勾结,协同进攻同盟军。

这时,随着战局的变化、战场的需要,谷景生不久就加入了抗日同盟军,从事军事工作。到同盟军之后,他被分在宣侠父为师长的五师。五师是抗日同盟军的主力,号称“王牌军”。谷景生被任命为该师政治部宣传科长。随后,为了加强第一线部队的政治力量,又任命谷景生为五师第一团政委,也就是张韬团团政委,此团又叫“黑马”团。此时,由于同盟军在日、蒋联合夹击下,处境十分艰难。8 月,冯玉祥被迫辞职,吉鸿昌、方振武通电宣布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继续抗日,奋战在热河、长城一带。

9 月底,讨贼军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做出先攻密云、怀柔,再克北平的决定,结果在北平外围小汤山一带与日军和国民党军作战中受到重创。

在这次战斗中,张韬与谷景生率领“黑马”团担任先锋,为全军开路。当部队行至潮白河口时,遭遇日军正面阻击和国民党军的腹背围攻,张韬和谷景生指挥部队多次突围,期望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但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此次战斗中,团长张韬英勇牺牲,谷景生身负重伤,昏迷后不幸被俘。当谷景生醒过来后,才知道被俘的伤员全部关押在一座大庙里。这时,他突然发现身旁还躺着一个全身鲜血、奄奄一息的伤员,仔细辨认,原来是他太原一中的同学王魁金。没等谷景生向他说一句话,就听到庙外国民党军又枪杀了一批战友。谷景生面对此情此景,怒火填膺,但由于伤口的剧痛难忍,又昏迷了过

去……

当谷景生再次醒来后，国民党军已撤离，他身边的战友王魁金全身已僵硬，眼睛却睁得很大。他怀着极度的悲愤，用手轻轻将战友的双眼合上，把自己的军帽摘下盖在王魁金的脸上，算是对战友的安葬。

这时，大庙里的30多名伤员全被红十字会收容照顾。大约两天后，柯庆施和另一位前委成员，化装成老百姓到大庙慰问同盟军的伤病员。当柯庆施走到谷景生面前时，附耳轻声说：“小谷，明天红十字会拉你们去青龙桥养伤，地下党会派人营救你的……”随手把十块铜洋悄悄地塞在谷景生的手里。

第二天，所有伤员被送到青龙桥红十字医院治疗。几天后，北平地下党派楚显和另一位同志以亲属名义，将谷景生接出来，送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期间，开始楚显经常来看望，保持着党的单线联系。后来又换了一位姓唐的女同志，来过二三次。

突然一天，小唐化装成一位阔小姐的样子，来到医院悄悄告诉谷景生，她要冒充国民党一要员的侄女到南京执行任务，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再接谷景生出院。谁知小唐走后，再也没有了音讯。从此之后，谷景生虽经八个月养伤，伤情渐渐痊愈，但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使他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

(四)

1934年初，谷景生伤愈出院后，化名谷峰住在北平第四中学一个叫周颐的同志的公寓里。当时，北平已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他从一个进步学生口中得知，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又遭到破坏，市委和党的外围组织左联、“社联”、“文总”的许多负责人被捕了，北平党组织已陷入瘫痪。

面对这种险恶局面，谷景生始终没有动摇和放弃追求革命的理想信念。他千方百计地寻找地下党，想尽快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但多日来却一直落空。一天，他突然想起曾在读书会见过的、在女一中学读书的女学生杨彤，她又是《民众日报》主编的表妹。于是谷景生到女一中找到了杨彤。见面时，杨彤还带着另一女学生叫郭桂英（现名郭明秋），介绍给谷景生认识。因为她俩都不是共产党员，这次见面谷景生只了解了一般情况，并没有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之后，谷景生仍抱定决心，继续想方设法寻找党的组织。几天后，在大街上偶尔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对方也同时注意到了谷景生。两人对面一看，谷景生立刻叫出了对方的名字——彭涛，彭涛也认出了谷景生，久别相逢的战友格外高兴。经两人互相交谈，谷景生知道彭涛也是从小汤山战斗失败后回到北平来的，也正在积极寻找党的组织。随后，通过彭涛又找到了共产党员周小舟。他们三人一起商定，今后要排除一切困难，努力恢复北平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救亡工作。

由于蒋介石继续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出卖华北利益的《塘沽协定》，整个华北危机日重，领导广大群众抗日救亡，已经成了党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们三人采用读书掩护身份。谷景生到艺文中学读书，彭涛到辅仁大学学习，周小舟去女中当教员。同时，积极在各大中学校组织读书会等，引导青年学生认清当时的政治形势，振奋民族精神，把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到底。

不久，彭涛与地下党员王学明、冷楚取得了联系，周小舟通过一个学生的关系又和河北省委联系上了。这样，1935年6月间，中共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到北平，决定建立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王学明任书记，成员有冷楚、彭涛等。周小舟负责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工作。同时，市工委决定，由谷景生担任北平市左翼文化同盟（简称文总）和北平市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党团书记。为了广泛开展

左翼文化运动,同年8月5日,北平左联又创办了一个刊物《泡沫》,由谷景生兼任该社社长。

《泡沫》是一个文艺周刊,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发表文章,更广泛地联系青年,发动青年学生开展救亡活动。谷景生在主持泡沫社期间,团结和发展了一大批革命青年为社员,有许多青年主动给《泡沫》写稿,积极宣传左翼文化思想。

谷景生在读书会,曾见过流亡青年学生刘曼生(现名谷牧)。经过一段观察,就介绍他入党,吸收他为左联一般成员,让他给《泡沫》写稿。刘曼生很崇拜谷景生,把谷景生称为他的政治引路人。另一个是文章写得很好的青年作者碧野。当时他写了一篇文章《窑工》,谷景生感到不错,专门约见他交谈意见。后来此人成了新中国文学界著名的诗人、散文家。这以后,谷景生在斗争实践中,通过考验,还介绍了在女一中读书的女青年杨彤和郭明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附：王云和一文——《往事中的泡沫》

泡沫社成立会 1935 年 5 月中旬在北平朝阳门新鲜胡同 27 号(后被确定为社址)吕奎龙家举行。会议就有关《泡沫》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其首当其冲则是一经正式成立,必需一位头面人物,兼顾内外,统筹规划。

经过提名、酝酿、协商、讨论,与会者一致推举谷景生为泡沫社社长。其人当时就读于艺文中学,祖籍山西,中等身材,举止潇洒,谈吐不凡。其年龄虽在我等之上,但未尝以长者自居;观察分析事物的能力虽远远超过我辈,却从不以志者自恃。此后,泡沫社阵容逐渐壮大,《泡沫》内容不断充实,影响日益广泛,方向始终正确,所有这一切都是和这位社长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

头两期《泡沫》为不定期刊，四开小报型，新5号字横排，每期印数约1000份。送往东安市场，西单商场各书店、书摊以及各大中学校寄售。其行销数量，购买速度竟大大超过我们的预计。《泡沫》小报初步获得成功后，泡沫社同仁的信心和勇气随之增加了。此时，《泡沫》具备了改刊16开本文学杂志的条件。

第一本《泡沫》月刊，封面蓝色，上端印有两个阴文大美术字，左下方印有苏联美术家为《阿Q正传》俄译本创作的插图。之所以标明为第一卷第三期，是为了跟前两期小报首尾衔接，一脉相承的缘故。第四期改红色，封面插图是苏联版画家克拉甫钦科为《静静的顿河》而制的木刻，还是比利时麦绥莱勒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为主题的作品，现因手头无原刊可查，只好有待将来补正。

……

1985年5月初，笔者个人为纪念泡沫社成立50周年，曾写下《〈泡沫〉五十年自嘲》诗二首，其中一首是：

古城垂危风雨间，
《泡沫》无声贼胆寒；
孤灯白发思旧事，
聊慰余生亦茫然。

录家父王云和之遗作。在清理家父遗物中发现。

1996年11月

此件是1996年11月20日王铁生(王云和之子)妻送来。

新的中共北平市委组成后，由彭涛、周小舟和谷景生一起，于1935年7月间，又组织了一次向何应钦请愿的活动。参加的主要是

教会中的学生。何应钦是国民党政府华北行辕主任，卖国的《何梅协定》就是他与日军签订的。

这一天，大批热血青年挥舞标语旗帜，喊着口号，聚集在新华门外，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卖国投降政策，全力和全国人民一致抗日。请愿提出了六项要求，主要内容是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取缔“华北自治”活动。参加请愿的学校有汇文中学、育英中学、北满女子中学等，还有一批大学生。这次请愿可以说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奏。

可惜，这次活动并没有得到新上任的北平市委书记王学明、成员冷楚的肯定。相反，他们认为搞这种合法的请愿是右倾投降。当时人们送给王学明和冷楚一个外号，一个叫“大布尔什维克”，一个叫“小布尔什维克”。这实际上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思想在白区工作中的反映。

但是，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等并不认为这是右倾、是错误。接着，他们又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群众性黄河水灾赈济活动，以期发动和团结更广泛的民众投入到反蒋抗日斗争中去。

1935年夏秋两季，黄河、长江、运河泛滥，大片土地被淹没，灾情蔓延到皖、赣、湘、鄂、冀、鲁、豫七省，灾民达1900万。一时间，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纷纷涌入北平。面对这一形势，组织领导学生开展赈济灾民，应是北平党组织的当务之急。这时，清华、东大、女一中、师大、艺文中学、汇文中学等大中学校纷纷成立了赈济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发表了《北平大中学校水灾救济会赈灾宣言》，制定了12项募捐办法。

北平党组织又不失时机地组织学生到天桥等地慰问灾民，发募捐来的钱物。各学校还派代表到河南、山东等地慰问灾民。赈灾活动中，学生们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而造成的灾荒，以及蒋介石推行卖国投降路线。动员灾民们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组织起

来抗日救国。这次活动为进一步开展广大民众和青年学生的救亡运动打下了基础,也为一二九运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五)

自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之后,日军进一步加快了侵占华北的步骤。1935年10月,在日军的策动下,汉奸殷汝耕粉墨登场,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这样,冀东的大片国土,将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殖民地。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下令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日本妄图使“华北特殊化”的野心,华北危在旦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就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北平地下党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方以王学明、冷楚为代表,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方针,认为发动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游行是右倾投降,主张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另一方以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为代表,坚持主张以合法方式与国民党投降主义政策作斗争,积极扩大和发展抗日力量,不断推动民族救亡运动。

正当这两种意见相持不决时,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他们从莫斯科《工人日报》、《国际工人通讯》上看到,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出了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定,以及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一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根据这些精神,谷景生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意见。认为,目前

国家已处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夜,更应当广泛发动群众,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尽快统一思想,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三人商量后,推举周小舟去天津,向领导北平党组织的河北省委,汇报了北平党组织内的意见分歧。

河北省委认真听取意见后,充分肯定了谷景生他们的工作,赞同他们的政治主张,并决定改组北平市工委,组成中共北平市临时市委和新的共青团北平市委。任命谷景生为北平市临委书记兼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彭涛任临委组织部长,周小舟任临委宣传部长。后来,当一二九运动开始时,又委派李常青来北平为特派员,代表河北省委领导北平党的工作。

中共北平临委成立后,立即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发动学生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壮大抗日统一战线。为实现这一目标,1935年11月,随着黄河水灾赈济活动的结束,北平市临委研究决定,把各校的黄河水灾赈济会转成学生会。再以此为基础,在中国大学成立了半公开的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女一中学生、共产党员郭明秋为学联主席,清华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姚克广(现名姚依林)为秘书,镜湖中学学生、共产党员孙敬文为总交通,东北大学学生、共产党员邹鲁风为总纠察,燕京大学学生、共产党员黄华为总交际。由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组成学联党团,学联党团是学联的领导核心。具体分工是,彭涛、周小舟可以参加学联的公开活动,北平市临委的有关决定要通过彭涛、周小舟向学联其他成员传达。由于地下党的性质,谷景生作为书记不能公开露面,而是驻机关在幕后指导。

此刻,刚刚成立的中共北平市临委获悉,国民党政府和宋哲元、日军预定在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实际上是实现日军图谋已久的“华北特殊化”,从而使华北五省全部沦入敌手。在这危急关头,谷景生、彭涛、周小舟商讨,果断决定于12月9日这一天,由

北平学联出面,组织爱国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坚决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为了组织发动这场请愿活动,12月6日晚,北平市临委书记谷景生和彭涛、周小舟一起以学联党团的名义,组织部分学联成员,在辟才胡同洋车厂里,也就是临委的临时机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首先总结了前几次游行示威的经验教训,重点研究分析了国民党当局可能采取的行动和对付军警阻拦学生的措施。最后,谷景生用在抗日同盟军担任政委时学到的军事知识,以及从党办的《长城》杂志中学到的游击战术原则,摊开北平市地图,谈了各学校向新华门进发的路线,并提出组织学生自己的交通队和纠察队,布置了如何利用外国记者和他们的车辆与军警周旋的办法。会上还要求各学校要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灵活方式,巧妙躲过军警的追捕,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整个行动要造成自发的印象,保护好地下各级党组织。谷景生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当时与会人的一致通过。

会后,还决定让清华大学的女同学陆瑾通知各学校代表,第二天,也就是12月7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召开各学校代表会议。这一天,到会的有20多所学校的代表,会上按照北平市临委的具体要求,又一次布置了请愿游行的集合时间、行动路线和口号。

会议决定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率队进城。两只队伍在西直门会合后,沿途再发动那些尚未行动起来的学校。会上,为了进一步鼓舞大家的士气和信心,彭涛再次分析了形势,强调目前北平的形势像干柴,一个火星就会燃烧起熊熊大火。还要求进步力量较强的学校要首先上街,造成声势,然后到进步力量弱的学校呼口号,动员他们参加。

会后,代表们都怀着征战前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将12月9日的行动计划带回各自学校,进行具体安排部署。燕京大学代表黄华返回学校,立即将学联的决定传达给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并于8日

晚以敲钟为号,召集全体学生大会,落实学联的部署,学生们一致表示赞同。

清华大学的代表返回学校后,也召开了学生大会,传达了9日的行动决定,并编制了请愿游行队伍。东北大学的代表郑洪轩、邹鲁风回校后,积极组织大家做好请愿游行的标语、旗帜、自卫用的石灰包等具体工作。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学院等学校都以同样的心情,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学联所在地女一中则更紧张,12月8日晚学联又开会研究决定,姚依林、郭明秋在西单亚北咖啡馆进行对外指挥。总交通孙敬文则负责把请愿游行的决定,通知到那些没有参加学联代表会议的学校……

此时此刻,北平古城已不再平静。广大爱国学生长久被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一旦喷射就会燃烧起熊熊烈火,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六)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1935年12月9日,沉默无声的北平城怒吼了。

这一天,朔风凛冽,滴水成冰。警察当局事先听到了学生要请愿的消息,清晨就下了戒严令,派警察堵住了城内外许多学校的大门,并在一些街道要冲布置了岗哨,企图消灭这次运动。学校当局也奉命把守校门,阻止学生出入。但是,城内外参加请愿游行的学生们,在中共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领导下,自黎明起冒着刺骨的寒风,按照预定计划积极行动起来,分路奔向新华门。在城内,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的学生。

这天清晨,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在军警包围了学校的情况下,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当宣布今天举行请愿的决定后,同学们热

泪盈眶，群情激奋，一致表示排除万难，坚决参加请愿游行。接着学生们冲开学校的警卫，向街头奔去。

根据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决定，东北大学的校址在西直门内，应首先与从西直门进城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队伍会合，然后直奔新华门向何应钦请愿。可当时传来清华、燕京的队伍已被阻止于城外，于是东北大学决定单独行动。



各校队伍胜利会合后，浩浩荡荡地奔向正阳门。

他们手挽手，高举请愿团的旗帜，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请愿队伍由北向南行进，沿途他们机警地避开了在新街口一带设置的封锁线，从北河沿转到西四北大街。这时，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二三十名学生，突破军警的阻拦，加入到了队伍中。接着，东北中学的一些学生也冲破军警的包围，加入了队伍，使请愿队伍越来越壮大。一路上学生们高呼“争取爱国自由”的口号，不畏军警的棍棒和大刀，与军警开展英勇的搏斗。最后学生们冲破一道道封锁线，冲向新华门。与此同时，城内的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市立女一中等学校也巧妙地摆脱军警的包围，向西单北大街，向新华门奔去。他们一路高喊口号，一面散发中国大学的《告各界同胞书》和学联的《请愿宣言》。

城外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清晨五点多钟就集合点名，向西直门方向行进，当两校的学生队伍冲破军警的阻拦赶到西直门前，警察当局已将西直门关闭，城楼上下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宪兵，学生们经反复斗争均无结果。这样，清华、燕京等学校的学生队伍被困阻在西直门外。

这时，已经是上午10点多钟，在新华门前已汇集了几千名学生，而新华门却紧紧关闭着。门前排列着手持刀枪的警察宪兵，各个杀气腾腾，如临大敌。面对这种敌对局面，更加激起了广大学生的义愤。他们在新华门广场上挥舞旗帜，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武装保卫华北”、“立即停止内战！”这呼声划破了笼罩在古城上空的乌云，喊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为了取得请愿斗争的胜利，学生们临时推选了中国大学的学生董毓华、东北大学的学生宋黎，北平师大的学生于刚等人为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

代表们提出六项请愿要求：(1)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类似组织；(2)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

的外交政策；(3)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4)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6)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但何应钦却避而不见，对学生们的要求不予答复。按北平市临委预先部署的策略，各校代表立即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与此同时，被军警关闭在西直门的清华、燕京等学校的学生队伍一直坚持抗日宣传，与军警进行着斗争。

在整个请愿游行的过程中，北平市临委派到第一线公开露面指挥的是彭涛，同时还有学联的主要负责人郭明秋、姚依林等人。谷景生和李常青按地下党的规定，不能公开参加请愿游行指挥，而是由学联随时派交通员向他们两人汇报。

当游行队伍经过西单时，遭到上百名军警的阻拦和大刀、木棍、枪托的袭击。学生们勇敢地冲破封锁线后，得知西直门附近已布满了武装军警、宪兵，要以武力驱散学生。彭涛及时派人把这一情况向谷景生和李常青作了汇报，他俩立即指示学联指挥部，为避免牺牲，应改道东行。于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由北向南前进，沿途不断有市民和学生加入。队伍抵达王府井大街时，已经发展到四五千人。待游行队伍继续行进到王府井南口时，又一次遭到军警、宪兵的镇压。手持大刀、木棍、皮鞭的军警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猛击乱打，用消防水龙冲击学生。同学们与军警、宪兵开展十几分钟搏斗后，游行队伍最后被冲散了。

此时，在市临委机关的谷景生和李常青得到游行队伍被冲散的消息后，为了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又通过地下交通员通知在一线指挥的彭涛暂时停止游行，10日起实行全市罢课，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随后，游行队伍按这一决定，怀着强烈的愤怒和坚定的决心，在暮色中分路返回学校。

通过一二九这一天的请愿游行，不但沉重地打击了北平当局妄图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图谋，而且使广大的爱国学生受到了深

刻的教育,更加坚定了爱国学生和广大市民将这场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北平发生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很快传遍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七)

一二九之后,各学校爱国学生罢课斗争的热潮,便席卷了整个北平城。北平市临委的谷景生、彭涛、周小舟和李常青在一起,又开始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

从12月10日起,为了使罢课斗争有明确的方向,以学联名义首先发布了一个《宣传大纲》。提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内战和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联合全国民众,结成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接着,北平各大中学校也联合发表了罢课宣言,呼吁爱国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一致行动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这样,北平学生的罢课斗争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罢课中,北平市临委又指示学联,要积极抓好学生们的组织建设。这是因为在一二九之前,一些学校的学生自治会等组织普遍不健全,不少学校的党团组织基本没有建立起来,致使广大学生还处在散漫无组织状态中。

根据学联的要求,一二九之后许多学校都纷纷成立学生自治会或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从而使各校参加救亡活动的人数迅速扩大。随着学生救亡工作的蓬勃开展,各校地下党团组织也在斗争中得到了加强和壮大。一些学校建立了党团支部,成为运动的领导力量。这就为下一步举行更大规模的斗争做了准备。

当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了关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又决定在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后,中共北平市临委立即决定,

在12月16日这一天再发动一次大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把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旋即,北平学联在临委的具体领导下,及时研究和制定了举行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战斗部署和行动路线。具体是:城内各学校一律早上七时出发,城外各学校相应提前行动,分别到天桥集合,召开市民大会。然后进前门,经天安门,向东单行进,再到“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外交大楼举行总示威。并成立了示威游行指挥部,由宋黎和邹鲁风公开负责指挥。

15日,各学校学生接到通知后,立即秘密召开学生大会作传达动员,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吸取一二九游行队伍被阻止于城外的教训,两校组成了100多人的先遣队,于15日夜里提前进了城,分散住在东北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

为了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12月15日晚,北平市临委书记谷景生委托彭涛前去联络学联主席郭明秋、秘书姚依林以及北京大学的黄敬、中国大学的董毓华等人,在王府井长安饭店佯装打牌,再次召开会议,认真检查了示威游行行动计划和行动的准备情况。

12月16日,北平古城再次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这一次示威游行的规模比上次更大,参加游行的人更广泛,组织的更周密。

这天,示威游行的队伍按照北平市临委的部署,分为四个大队:城内第一大队由东北大学率领;第二大队由中国大学率领;第三大队由北京大学率领;第四大队为城外各学校,由清华大学率领;参加的学生总计约1万人。

16日清晨,各校学生们有的采用先化整为零,冲破军警的包围和阻拦,然后再化零为整的方法;有的则采取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游击方式越过军警的封锁线,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在游行示威中,许多学生遭到军警的皮鞭、棍棒的毒打或水龙的射击,不少人被捕。但游行队伍已具有了一二九斗争的经验,学生们无所畏惧,勇往直

前。经过顽强的斗争,大部分学生终于到了集合地点,在天桥举行了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北大学生黄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在正阳门前召开的全市人民群众大会,通过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收复东北失地,要求爱国自由等议案。

大会通过了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议案。会后举行了大示威,学生们手挽着手,由天桥向前门进发,沿途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并向道旁市民和行人散发大量传单。市民们对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同情,有的自动加入了游行队伍,有的给学生们送来开水和食物。这一天,谷景生和李常青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化装成老百姓到前门大街观看了怒吼着奋进的游行队伍。

当游行队伍到达前门时,遇到军警、宪兵的拦截,他们鸣枪威胁,

不准队伍入城。在这种情况下,游行指挥部当即决定在火车站广场举行第二次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卖国外交,不得任意逮捕或屠杀学生等九项议案。大会还决定,要求进城继续示威游行,于是派代表与军警多次交涉。军警只准少部分学生由前门进城。其余大部分则分别从和平门和宣武门进城。可是在学生们到达和平门和宣武门时,城门却已关闭,且有军警持枪把守。到晚上九时许,聚集在宣武门外的学生已饥寒交迫,但仍坚持斗争。突然,埋伏在四周胡同里的军警熄灭路灯,挥舞着皮鞭、棍棒冲向爱国学生,前堵后截,大打出手,又一次暴露了反动当局的凶残。这一天战斗中,全市学生被捕30余人,被殴伤400余名。

在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领导下,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不但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同时,也极大地宣传和发动了北平广大学生和各界人士,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图为反动军警抓捕游行示威学生。

(八)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结束之后，北平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既恐慌又憎恨，妄图一举扑灭。于是，当局一方面下令学校提前放假，迫使学生各自回家，不能再集中；同时还下令学校派代表到南京“聆训”，企图拉拢部分学生，妄图把学生运动纳入他们的轨道。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断定两次游行示威是有组织、有纲领、有策略的，绝不可能是学生自发的活动，一定是有共产党严密组织领导。决定派出大批特务，再次破坏北平地下党组织。

针对这一局势，北平市临委书记谷景生，成员彭涛，省特派员李常青，立即召开了紧急碰头会，研究了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如何防止地下党组织再遭破坏及设法营救被捕的学生等问题。会后，市临委指示彭涛连夜召开学联成员会议，进一步研究讨论这些问题。

第二天，谷景生秘密与学联主席郭明秋在中山公园接头后，听取了学联开会讨论的情况，并向郭明秋交待当前要做三件事：

一是要继续组织学生罢课，反对提前放假，反对派代表到南京“聆训”；二是派代表到上海，向各界介绍北平学生运动情况，以扩大运动的影响，寻求全国的支持；三是收集在游行示威中受伤学生的血衣，举行展览大会，并组织各界同胞慰问受伤学生，以此揭露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

之后，在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领导下，爱国学生运动一直方兴未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正如鲁迅先生说的“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然而，北平爱国学生运动下一步“向何处去”的问题，此刻却严峻地提到了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面前。这些年轻的领导者们开始讨论着、思索着。



平津学生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

就在这时，也就是在 1935 年底，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指出：“学生运动已有了极大的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士兵的斗争结合起来，才有可能。”

同时，共青团中央向全国爱国学生也发出号召：“爱国学生们，要使我们的运动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必须要与国内广大民众的斗争相结合，帮助他们，唤醒他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士兵中去，到游击战争去，到民间去。”这些精神，像灯塔一样给当时的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成员们指出了明确的斗争方向。

根据这个精神，北平市临委成员及时召开会议决定，北平学联与天津学联联合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由董毓华、宋黎、江明（姜文



浩浩荡荡的京、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出发了。

斌)担任总指挥,彭涛为党团书记,带领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唤起民众,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团的学生们到农村后,看到了广大农民的悲惨生活,听到农民们的血泪控诉,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认识到民众中蕴藏着抗日救亡的巨大力量,许多人由此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宣传团南下后,1936年2月初,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改成中共北平市委,市委书记由河北省委派来的李雪峰接任。

由于工作的需要,河北省委决定,谷景生继续抓团市委的工作,并继续担任左联书记,“文总”书记和泡沫社社长。此时,北平当局发出通令,要取缔学联,以弭隐患。派出大量军警宪特抓捕了近万人,谷景生也被捕入狱。北平又处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之中。后来经过曲折巧妙狱内狱外各方人士的斗争,被捕人员逐步放了出来。

谷景生通知左联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到泡沫社开会,研究如何纪念三一八惨案十周年的事宜。当他戴着礼帽,穿着长衫走进泡沫

社后被捕。一起被捕的还有吕魁龙和清华大学学生王云。《泡沫》也被查禁。



图为宣传团队员向农民进行救亡宣传。

接着,军警将他们三人带到了北平市警察局。后来被关押在宪兵司令部。在狱中,谷景生受尽严刑毒打,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只知道他是艺文中学的学生。这样,在敌人没有查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谷景生得到艺文中学校长查良剑的保释,被释放出狱。出狱后,谷景生继续任北平团市委书记、左联书记和“文总”书记。

但是,这样功勋卓著,把整个身心无私地献给党和人民,组织领导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运动的谷景生将军,竟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反”分子、叛徒,坐牢八年,被清除出党12年,受尽摧残折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昭雪平反,但已是风华不在之年了。谷老的坎坷历程,使我感慨不已。深深认识到他是我们最可敬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

在采访结束时,谷老语重心长地说,我可以总括地向你说几句:“一二九运动,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进行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二九运动。当时,由我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李常青任省委特派员。那时,我们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组织领导这场震惊中外的抗日运动,并不是我们个人的马列主义水平多高,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我们顺应和代表了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救亡图存的心声,才能够登高一呼,天下响应,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洪流。一二九运动所激发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当代青年,应当发扬光大。爱国主义永远是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的旗帜。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永放光芒。”

这段话,就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2000年12月

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 坚强领导者

——访中共党史学者胡长水、王朝美

《人民日报》记者 马 利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一个伟大事件。毛泽东曾把它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他说五四运动是大革命的准备，一二九运动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准备。“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所展现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成为中国青年乃至我们民族英勇奋斗的不竭的精神源泉。因此，每当一二九纪念日来临的时候，人们总要深深地怀念当年为之呐喊、奋斗的先驱。听说党史界近几年在一二九运动史的研究上有一些重要发现，为进一步探究历史的真谛，记者走访了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军队学者胡长水大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原科研部主任王朝美教授。

两位学者首先介绍说，在关于一二九运动的领导问题上，过去研究得还不够，因而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二九运动带有自发的性质。近年党史界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确认了一二九运动是当时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简称北平临时市委）组织和领导的。主要领导人是：北平临时市委书记谷景生、组织部长彭涛、宣传部长周小舟，以及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

抗日救亡是党的首要任务,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方式去发动和组织所有民众,尤其是要用抗日、民主、自由的口号去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学生

两位学者介绍了这一重要历史事实的基本情况: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华北大部地区已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民族矛盾已明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华北人民,尤其是青年学子,更是群情激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当时,在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为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学明,宣传部长彭涛,组织部长冷楚。市工委领导下的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左联的党团书记是谷景生,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的负责人是周小舟。面对汹涌而来的民族危亡的局势,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针,当时,北平党内产生了意见分歧。

彭涛、谷景生、周小舟等人曾从不同途径看到党的《八一宣言》,认为抗日救亡是党的首要任务,主张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方式去发动和组织所有民众,尤其是要用抗日、民主、自由的口号去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学生。但是王学明、冷楚等人不同意这一主张。他们仍然坚持过去提出的“创造北方苏维埃”的口号,认为不是向国民党争抗日的自由,而是整个地打倒国民党。双方意见分歧,争论激烈。王学明还采取组织手段,说彭涛和谷景生、周小舟是“右倾小集团”活动,决定撤销彭涛的宣传部长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彭、谷、周等人商量,由周小舟前往天津,直接向上级党组织河北省委汇报争论的情况。河北省委认真听取意见后,肯定了他们的正确主张,并决定立即改组北平市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由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兼团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为加强新市委的领导和党内的团结,河北省

委很快又派李常青(代号土耳其)为省委特派员来到北平。

北平党组织紧紧抓住挽救民族危亡这一主题,顺应历史大势,采取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新市委组成后,立即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联络和组织进步学生作为工作重点。谷景生和彭涛原是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的同学,1932年同时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3年同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任职,谷景生是团政委,彭涛同时是共青团张家口工委书记,他们是在抗日同盟军被“围剿”后来到北平的,具有相当丰富的地下斗争和军事斗争经验。他们汲取过去“左”倾错误的教训,决定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建立北平市学联。学联主席是女一中的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谷景生直接联系的主要是女一中、女二中、中法大学。和谷景生保持密切单线联系的是学联主席郭明秋。对外,他们则以夫妻的名义出现。

1935年12月,为适应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和宋哲元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当时的危急关头,北平临时市委当即决定于12月9日这一天,由北平市学联出面,组织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事前临时市委对活动的原则、方法和请愿路线,作了认真的研究。确定12月9日凌晨5时以敲钟为号,各大中学校学生冲出校门,向设在中南海的何应钦行辕进发。

请愿时提出的“六项要求”,也是谷景生和彭涛等人商议拟定的。12月9日请愿随及转为游行示威,12月16日,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大游行。临时市委还周密制定了讲演及讲演后的撤退计划:当游行队伍到天桥汇集后,由曾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此时在北

京大学读书的黄敬在天桥有轨电车上发表演讲；他刚讲完，立即冲上来五六个学生，护卫着他回到游行的队伍里。这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黄敬当年在电车上演讲的照片的来历。

史实表明，一二九运动完全是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坚强领导和组织下进行的。它是当时北平党组织紧紧抓住挽救民族危亡这一主题，顺应历史大势，采取正确的方针和策略的结果，因而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支撑以上叙述的历史根据或曰历史资料是什么呢？这是党史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两位学者回答说：目前支持这一历史结论的主要材料有：

一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等单位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其第二卷第三编中已明确说明：1935年11月成立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为谷峰（即谷景生。谷景生这个名字是他后来到山西参加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和山西新军时，薄一波为他改成的）。这是一部权威性的工具书的记载。二是1944年周小舟在延安整风时写下的自传。其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一二九运动前中共北平市委内部的分歧和新市委成立的经过。三是谷景生发表在《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上的《回忆“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地下党》一文。还有一些其他的回忆、研究文章，以及一些口述史料。

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得以逐渐披露的这段重要历史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学生运动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才能把炽烈的爱国热情化作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

听到这里，不禁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实，直到近几年才逐渐披露出来，以至今天许多人仍然不知其详？

两位学者分析，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原因：一是党纪念、宣传一

二九运动早就开始了,但相当一段时间是着重于一二九运动的群众斗争、伟大历史作用和其革命精神。二是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开始回忆、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时,注意到的是活跃在历史前台的先进人物,主要是北平市学联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大中学校党的负责人,而真正在领导指挥这场运动的党的领导人,许多人包括一些当时在前台活动的人物并不知晓。这是党的地下工作的规律使然。当时,彭涛和周小舟是以学生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的,而作为临时市委书记的谷景生和特派员李常青,则处于很隐蔽的状态,不允许参加公开活动,以防不测。三是作为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北平临时市委的谷、彭、周、李四人,后来多数很快受到了错误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任国防部五院政委的谷景生因为坚持不愿和被打成“右派”的妻子“划清界线”,而被调职。任松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李常青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即被错误地撤销职务,后又因所谓“包庇右派”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1960年遇车祸身亡。任化工部部长的彭涛1961年即因病过早离开人世。周小舟则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处理,1966年12月不幸逝世。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不能再说什么了。

到20世纪80年代,四位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健在的就只有谷景生一人。此时,曾经担任第二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十五军政委,和军长秦基伟一起率部参加抗美援朝、身经百战的谷景生将军,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之后,正担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1982年10月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又参加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工作,率中央联络组赴东北。

饱经历史沧桑和政治磨难的谷景生将军,心里想的是如何为党再多做一些工作。每当知情人向他谈起这一重要事实时,他总是淡然一笑,觉得历史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去说什么了,显示了共产党人

的磊落胸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一些热心党史研究的同志一再要求他为这一重大事件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时,他才打破沉默,在一次一二九运动纪念会上扼要地说明了情况,五年后,才在《党的文献》上发表了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尽管如此,有些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史实在一些重要的党史著作中仍未完整地反映出来。

采访结束时,两位学者说:这位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谷景生将军已于几天前逝世。这个不幸的消息,给我们带来深深的遗憾,同时也庆幸将军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把历史的真相留了下来。

这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学生运动,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才能把炽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化作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一二九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那些站在这一运动前列的引导这一运动向前发展的优秀的共产党人,同样永远值得怀念。

历史应该记住他们!

背景资料

1935 年 12 月 9 日,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民党政府为迎合日军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12 月 9 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下,为反对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华北,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上午 10 时 30 分,爱国学生 6000 余人涌向新华门,向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何应钦避匿不见,由秘书侯成代见。侯拒绝了学生提出的六项要求,激起众愤,学生遂结队游行。游行队伍在西单及东长安街遭到军警木棍、鞭子、水龙头、大刀的攻击,百余人受伤,30 多人被捕。城外清华、燕京两校学生,因城

门关闭未能入城，在朔风凛冽中坚持终日，含泪向围观市民控诉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指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学生的响应，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

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10日起，杭州、武汉、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学生教职员等纷纷集会，发表宣言、通电，举行罢课、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实现抗日。

原载《人民日报》（2004年12月9日第10版）

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发动真相

《中华儿女》杂志编委 王 凡

今天是一二九运动 69 周年的纪念日，然而就在前两个星期，这场伟大运动硕果仅存的直接发动领导者之一谷景生，不幸与世长辞。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几位知情者披露了一些重要线索，使我们能够在谷景生生前聆听了他所亲历的一二九运动。

随着谷景生的追忆，使我们以往在阅读那场运动之际，因时间的久远和某些特殊缘故语焉不详而产生的疑问，得以解析。我们记录和整理出了这个历史真相逐渐廓清的过程，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发表，用以纪念这场意义非凡的运动，同时也表达我们对一个情操高尚的共产党人的深切追思。

运动是伟大的，发动领导者却语焉不详

稍通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会记住发生在 1935 年的一二九运动，关于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还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人士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概括得最为精辟。他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 250—257 页。）的确，如果我们沿着一二九运动的脉络往下读中国的历史，就会清晰地看到：正是这场浩大的运动，激励起全民族的抗日勇气和热

忧,大批的知识分子溶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并成为尔后的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栋梁才俊。

从许多经历者的回顾中,从《青春之歌》一类文学作品中,类似“敌人以水龙向学生队伍喷射,冰冷的水柱像一把把尖刀似的扎在学生的脸上、身上。同时,军警挥舞皮鞭、枪柄、木棍袭击过来,学生们与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搏斗……游行队伍越来越大,抗日救亡的吼声,惊天动地,革命斗志昂扬,气壮山河”运动场面的描述,不知凡几,而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这场运动究竟是如何酝酿策动的?有没有一个总揽全局的领导集体在运作?这个领导集体究竟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则语焉不详。

恰因历史的留白,导致长久以来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的叙述屡有抵牾争议。有人说是自发的学生运动,与共产党没多少关系;而多数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观点的人,又在领导者为谁的问题上,要么言辞囹圄,要么歧异纷纭……

在运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观点中,将领导层定位最高最广的是毛泽东,他1939年的讲话中说:“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再次是共产党的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

必须说明的是,毛泽东这里说的,不仅是以1935年12月9日、16日北平爱国学生举行的请愿示威为标志的一二九运动,而是包括从狭义一二九运动、民族解放先锋队组建发展、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荡及数省的以爱国学生为主体的救亡运动,是一个被大大泛化了的观念。因此,直接领导者亦被扩大到中共北方局、上海以及各地的党组织。这种大而化之的概括,显然没有解答发生在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是如何酝酿策动、真正的领导集体由哪些人组成等具体问题。

关于中共北方局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性诠释,是这样表述

的：“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即李葆华）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直接出面领导运动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珩等同志。”

如上表述舛误不止一二，其一是李葆华在一二九运动前及其间，并不在北平，也没有担任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彼时他正以河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冀东地区工作，直到1936年春季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后，才把他调往北平担任领导工作。

其二是把陈伯达列入领导人之一，而陈伯达本人就是一个运动“自发”说的附和者。他曾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的开展开始是自发的，后来处于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我在天津看了《大公报》，知道学生运动的爆发。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竟出现了这样英勇的示威游行，我心情很激动，大哭了一通，马上买车票赶到北平……这一时期我为学生们起草过一些文件、宣言和宣传大纲。”于光远回忆说，一二九时期有句名言，叫作“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他印象里就出自陈伯达的手笔。作为中共北方局工作人员的陈伯达的亲口回忆，显然不只单单披露了他个人不知道一二九运动的筹划组织，且从侧面揭示了北方局直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都没能立即做出反应，陈伯达自己赶到北平参加运动，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当时担任学生联合会秘书的姚依林的回忆，进一步证实了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并未得到来自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的具体指示。他说“那时河北省委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同志。在一二九运动发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

其三是后面开出一串直接领导者的名单，多为北平各学校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其中只有个别人进入了由北平市学联党团掌控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领导圈子。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回忆说，接到了

辗转传递过来的发动组织请愿活动的指示,但对是否有上级组织在运筹,更高领导究竟是何人,却一直无从知晓。

还有一种把北方局的领导具体化到刘少奇的说法,就与事实更远了。刘少奇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后,于1936年春季才作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离开陕北前往天津的。而在这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例,又证明当时的北方局还不能对北平地下党的活动实现很直接和具体的领导。例如,1936年3月末,北平学联党团为追悼因参加救亡活动被捕并遭严刑拷打至死的学生郭清而发动的“抬棺游行”,刘少奇在事后才获知,随即对北平地下党领导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如果领导具体且指挥管道通畅的话,就不致事后再予纠正了。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

既然中共北方局没有对运动做出过什么指示,那么领导一二九运动的这个党,就只能从北平市地下党组织方面进行稽索。可此刻我们才发现,1935年前后北平市的中共组织情况,又是一个语焉不详的问题,且在1995年前没有一部公开发表的著述,对北平市中共领导机构是如何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做过权威而详尽的陈述。

一本发行量有限的《北京革命史大事记》上,关于一二九运动前夕北平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不足200字:“1935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北方局)听取汇报后,决定撤销中共北平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平,直接领导北平党、团工作……”

大事记上提到的四个人,李常青解放初曾任松辽(黑龙江)省委书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受迫害,于1960年遇难身亡。周小舟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但在1959年庐

山会议上被错误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而降职任用，于“文化大革命”初期逝世。同为候补中央委员的化工部部长彭涛，虽未遭遇政治波折，但在1961年因病去世。谷景生解放后曾任防空军副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等职，因受夫人被错划“右派”的牵连，长期被控制使用，他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始终持低调。了解了上述事实后，对1935年期间北平市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只那么寥寥几笔，人们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了。难道就因为他们的政治坎坷沉浮和过早的辞世，一场对民族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进行得有声有色堪为白区斗争范例的运动的高层邃密运筹，就将永远一语带过吗？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当一二九运动60周年来临，中共中央决定举办有规模的纪念活动。11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准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由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参加的纪念座谈会。此时当年清华大学的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已经去世，组委会找到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当年的北大学生会执行主席韩天石处，送上了请柬和开会人名单。韩天石的秘书胡文斌对中共党史相当熟悉，他看了名单后，对来人指出名单缺少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谷景生，一个是黄华，这两个人不到场，对纪念活动来说是缺憾……”

来人走后，胡文斌随即给原全国人大常委谷景生家打了一个电话，告知此事。不久，家里也接到了团中央的邀请通知。下午3点就要开会了，谷景生的秘书12点半才取到请柬，负责会议筹备的团中央有关人员一再向秘书解释，说以前确实不知道谷老。

因为座谈会的议程事先已定，没安排谷景生发言，所以待别人都讲完，他才要求“讲十分钟”。他讲的很简洁，中心即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运动的步步铺垫，其间党内的激烈纷争，以及他作为中共北平临委书记的活动等细节都没有提到。

虽说接到邀请实属偶然，但谷景生是有备而去，此前他经反复斟

酌推敲,写成《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把一二九运动的来龙去脉做了完整的勾勒,通篇强调运动环环相扣,但没有一个环节是自发的。稿成后就让秘书送给了人民日报社和北京日报社。

在人民日报社,稿子经过总编辑范敬宜的手,被安排在“文件·报告·回忆录”专栏。在北京日报社,稿子交到了“北京人物”专栏。专栏主编看了,感到了这第一手材料首次披露的价值,但他吃不准“这种叙述准确可靠吗?有什么依据呢?”毕竟,谷景生的名字对他实在是太陌生了。秘书告以谷景生确系当时的北平市临委书记,《北京革命史大事记》上有记载。专栏主编马上找来了相关的书籍,看到了本节前面援引的文字。他决定立即发,并拟了300余字的编者按。文章于1995年12月8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登出,立即吸引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等主流媒体的关注,谷家门前的寂静,被纷至沓来的采访打破。

参加座谈会的李昌、韩天石等人,也都让自己的秘书打电话,说明在此前确实不知道更上层领导机构对运动的运筹指导,所以在以往的回忆中没有叙述过这一内容。作为一二九运动后期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兼党团书记和当时北大的支部书记,已属于运动中比较高的领导了,连他们都不知道市一级领导机构的情况,别的人自然就更不可能对此置喙了。这也正是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回忆虽多,但对究竟是如何发起和运筹的总语焉不详的根由。

多少年来,面对讹传失真的一二九,作为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却不能澄清历史原貌,一直令谷景生心绪不宁。此时此刻,他感到完成了一项使命,可以告慰那些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结成生死之交的亲密战友们了。

一二九运动险些胎死腹中

《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勾勒出一二九运动的完整脉络：针对日军的进逼，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秉承蒋介石“不抵抗”旨意，一再签约退让，华北主权益渐沦丧，中共北平市领导成员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依靠他们同北平各大中学建立的关系，有步骤、有策略、渐进地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

7月，他们策动了以中学生为主的新华门请愿，作为更大规模行动的预演。8月，通过赈济黄河灾民的活动，组成合法赈灾团体，争取公开、半公开活动的便利。10月，筹划发表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书面请愿《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与此同时，就是否开展合法斗争、及时调整策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北平领导层出现尖锐激烈的纷争。11月，将赈灾团体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北平市工委撤销，新组成市临时工作委员会。12月，在中共北平市临委统一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

一篇3000字的文章，显然无法将每一个细节绘声绘色地再现出来，但一二九运动系由当时的中共北平市临委统一领导的命题，引起了党史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并提供了更广泛深入挖掘的线索。

当我们依据谷景生文章的线索，通过对史料的搜扒和对知情者的进一步访谈，将这场运动的诸多细节逐一放大后，发现某些缺失的细节，竟然是与这场伟大运动的成败乃至有无直接联系的关键；而还有一些细节经过深思品嚼，至今仍不失启示意义。

首先，是以往公开发表的追忆从未详实披露过的党内纷争问题。以往分析一二九运动形成因素，不外乎迫在眉睫的危亡时局、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共产党人的振臂一呼，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干柴和火种，当然他还补充了红军到达陕北和《八一宣言》发表的影

响。但谷景生的叙述,使我们在对运动重新审视时注意到:倘若没有几位具有顺应时变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领导者,并在党内取得主导地位,这一场影响中国现代史进程的运动,也许就不会在那个特定的日子爆发。

让我们在此稍费笔墨做一点回溯吧

在运动的酝酿期间,以什么为指导方针,采取何种斗争形式,提出怎样的口号这些关键问题,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他们并没有直接得到来自党的上级机构的指示。他们只是通过各自的渠道,从外文报刊上看到了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

这次大会通过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实现统一战线,共产党必须消灭自己队伍中自满自足的关门主义,“力求在具体的反帝纲领的基础上,同民族革命组织和民族改良组织采取共同的行动”。而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并发表于法国巴黎中文《救国报》和苏联莫斯科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的《八一宣言》,更具体提出:“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经过领会分析,彭涛、谷景生、周小舟敏锐地发现,基于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现实,党的方针政策已有变化,因此北平工作的方针政策,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他们在北平市工委会议上,提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争取利用一切公开合法方式发动救亡运动的意见。他们的提议遭到了中共北平市工委书记王健、组织部长朱子贞的极

力反对。王、朱固守着“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时的旧旨，认为岂能向国民党求抗日民主，北平党要做的仍是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

我们从档案中找到了周小舟写于1944年6月的自传，其中也有涉及会议争论的内容：“开会的时候，彭、谷和我坚持提出抗日民主自由的要求，认为这样能团结广大学生群众。王、朱坚决反对提民主要求和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认为当时不是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问题，而是坚持打倒国民党，这两种意见相持不决。”

王健等人的革命坚定性尚堪嘉许，但思维僵化和缺乏政治智慧，使他们没能成为历史转变当口的承担大任者。特别是他们对持不同意见者还采取了压制打击的作法。当彭、谷、周要求将他们的主张上报中共河北省委裁决时，他们不予转递，还将彭、谷、周定性为“右倾小集团活动”，撤了彭涛市工委宣传部长的职。

此外，在彭、谷、周听闻有王揖唐、王克敏等汉奸参加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将成立的消息，紧锣密鼓地筹备发起请愿运动时，王健等还试图切断他们与各校学生组织的联系。周小舟的自传中记载道：“王健、朱子贞二人与各校无关系，故各方面找这些学校的关系，企图停止这个运动，他们间（似应为‘还’——作者）发表宣言反对。”

彭、谷、周只得“一面继续搞学生运动，一面设法找省委联系”。最后由周小舟赴天津向省委报告，省委在听取汇报后，决定撤销中共北平市工委，新组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然而，“王、朱不服从省委决定，由一姓梁的前往天津找省委”，中共河北省委坚持前议，并派李常青以特派员身份到北平支持临委的工作。正是由于形成了李、谷、彭、周为首的北平地下党新领导集体，一二九运动才得以顺畅地发动。

如果没有谷、彭、周等顺应时变，以其政治敏感和睿智提出调整斗争方略的主张，并积极推进救亡运动，没有在中共河北省委支持下

完成了中共北平市领导机构的更迭，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当然总会有喷发的机会，抗日战争的全民动员也总有一天以某种方式进行，但绝不会以历史上的这一个一二九的形态出现。

几名党员像几颗火种，点燃伟大运动的地火

当我们为廓清历史的真貌，而聆听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谷景生对当年北平的大环境及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的回忆时，一些出自他口述的细节，更让人不能不对那一代共产党人生出高山仰止的虔敬。

1934年至1935年初，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对中国共产党危害最烈之际，毛泽东将之简括为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长期工作在白区的刘少奇曾生动地描述道：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党的组织一般没有保存下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46页。）具体到谷景生个人，他说那时住在北平城里，晚上常能听到宪兵三团宪警在西直门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枪声，那是一个革命者随时受死神觊觎的年代。

1933年秋季谷景生重返北平城，是让人抬进去的。他担任政治委员的抗日同盟军五师张韬团，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下全军覆没，谷景生左肩胛骨被子弹击中，伤及神经，半身瘫痪。北平地下党通过红十字会的关系，把他从伤兵收容处捞了出来，送往协和医院。因为没有钱，协和医院是以用他做医学实验的名目收留的。

因血腥的白色恐怖，北平地下党组织几经严重破坏，养伤期间谷景生不时要转换住址，照料过他生活并负责和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的人，亦由杨克冰、楚显和一位姓唐的女学生几度变更。但未等伤愈，他还是和党组织断了联系。谷景生拖着带伤的身体，既要设法生存，还要为逃避特务追捕东躲西藏，但他从不曾对自己的信仰和人生

选择有丝毫的游移,通过各种关系寻找组织。在穿棉衣的冬季,他偶然遇到原平大附中的同学彭涛,彭涛也是受党派遣渗入同盟军于兵败后和组织失去联系的。他们相约分头寻找组织,并经常相晤,一起分析形势,商议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自行展开革命工作。他们利用昔日的同学关系,发现思想进步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以读书会等形式,积蓄党的外围力量。例如一二九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人物,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主席郭明秋,就是谷景生通过一位熟人介绍认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发现她有很高的革命激情和活动能力,就发展她为中共党员,并在市学联组建时,将她推上领导岗位。

当时在中共北平地下党屡遭破坏的几年里,许多党员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包括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与谷景生等人观点相左的朱子贞,就曾在1934年中共北平市委被破坏后,联络上聂真、闻永之、梁寒冰几个人组建了北平市临时工委。1935年夏,王健膺命组建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也是在5月的北平地下党遭受大破坏之后。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彭涛告诉谷景生,党组织找到了。当时的市工委也就几个人,王健任书记,彭涛任宣传部长,朱子贞也归并过来,任组织部长,还有杨子英。谷景生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周小舟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负责人。

彼时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的公开身份都是学生,谷景生联系最直接的是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郭明秋即女一中的学生。彭涛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周小舟直接领导的有清华、师大、朝阳大学、平大法商等学校。他们同青年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就是因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决定了一二九运动的主体。

11月,将北平各校水灾赈济会改组成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时,由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三人组成学联党团,形成领导核心。学联的主席是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

就是在那样严峻的环境下,几名党员像一颗颗火种,燃烧着自己,激励着他人,使一场伟大运动的地火紧张有序地运行。经过他们的发动和联络工作,不仅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群体团结和动员在学联党团的周围,而且使许多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分散的基层组织,重新纳入中共北平市临委的体系。谷景生说:王健新组市工委的时候,他知道的党员也就十多个,而到运动起来的时候,能联系上的党员已达三五十人。

历史真相的淹没与金子一样的品格

我们问谷景生听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将成立的消息,决定于12月9日举行请愿活动的会议,是在哪里开的?他告诉我们是在他的住处,西城区的一个洋车厂里。“房间不大,也没什么陈设,就有一张睡觉用的床,但能容纳十几个人开会,月租二三块大洋。当时的与会者只记得有彭涛、周小舟、郭明秋,别人的名字记不得了”。他还告诉我们行动方案议定后,由地下交通员传递消息,与各校的地下党组织联络。当时的交通员有谁他也记不得了,因为并不是由他亲自布置这类任务。他本人的很多意见是通过郭明秋传递出去的。

当时党组织有严格的规定,作为特派员的李常青和临委书记谷景生,要处于很隐蔽状态,不允许参加公开的活动,以防因突然变故失去统筹全局的人。运动期间和谷景生保持密切单线联系的郭明秋天天和他见面,她对外假扮为谷景生的爱人,而实际上她也正是他的第一位恋人。因此,她成为运动期间大家都看得见的“领袖”。这也就是为什么参加运动的各校的党组织负责人,都不清楚上层机构的运筹情况,也不清楚运动的领导人是谁的另一重要原因。

“请愿时提出的六项要求,第一就是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带有明显的共产党人操刀的痕迹,是谁起草的?”我们问。谷景生说:

“是彭涛和我事先商议拟订起草的。”

12月9日的请愿和游行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和北平当局的镇压,30多名学生受伤。学联党团和学联随即开会商讨了对策,决定从12月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要求严惩破坏学生运动的肇事者,同时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行动。有些学校的党员和学生是事后得知12月9日行动的,对没有通知到他们参加有意见,也强烈要求“再来一次”,例如以学生身份在北大学习的原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黄敬就有意见。在更大规模行动准备期间,学联组织人到各校活动,控诉国民党北平当局军警的暴行,陈设展览遭到殴打学生的血衣,并迅速建立健全学生组织。

就在这时,北平报刊登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6日成立的消息,于是,更大规模行动的日子就定在了这一天。由于有关这一天运动情景的描述可车载斗量,所以谷景生只讲了个小插曲,即此次行动让颇有口才的黄敬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当示威游行的队伍在天桥汇集后,由他跳到一辆有轨电车上发表演说。“我们事先做了安排,他一讲完,马上就有五六个人冲过去,护卫着他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自毛泽东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后,运动意义非凡的评价日渐升温,许多参与者相继口述行文公开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但李、谷、彭、周却从未以一二九运动的领袖的口吻专门谈论过运动的来龙去脉,历史的真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淹没尘封。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其他非正常因素外,恰恰反映了这几位真正的领导者们那常人难以企及的襟怀和情操。直到在担负这场伟大运动领导大任的人一个个离开了人世,由于历史的留白,致使一二九运动垂诸史册的文字在失真走形的情况下,谷景生才在人们的一再劝说下,决定打破几十年的沉默。

在拜谒访谈中,谷景生总是强调党对运动的领导,他说出彭涛、

周小舟、李常青等一个个他凡能记得，并真正在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者的名字，却就是不愿意多谈他自己在运动中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我们领略了他金子一样的品格，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品格。

我与一二九

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周小舟

杨子英(陕西人)当时是北平党组织负责人之一,1935年4月末介绍我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简称武卫会)。

五月初《何梅协定》签订时,我们曾在学生中酝酿反对《何梅协定》,联系的有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吴承明,平大医学院的田际华(唐诃)等。不久,王健(王学明)通过杨子英与我谈话,我经杨子英介绍五月在北平入党,即任武卫会北平市委宣传部长,书记为杨子英。

武卫会在学生中有一定的工作影响及组织发展。当时我负责领导清华(有姚克广、吴承明、蒋南翔等人)、师大(有武尚仁、敖白枫等人)、朝阳大学(有魏震等人)、平大法商等校。

为争取公开活动,七月黄河水灾,我们发动各校组织黄河水灾救济会,以女一中、师大、清华、东北大学组织较好,这个组织团结了许多先进青年,为以后一二九运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九十月间,党市委增加了朱子贞(冷楚),原党市委为王健(王学明)、杨子英、彭涛三人,王是书记。我是武卫会党团负责人之一。谷峰(谷景生)大概是社联党团负责人。

.....

十月和十一月之间,国民党六中全会将开会,我们拟在学生中提出争取抗日民主自由的运动,向国民党要求抗日民主自由。当时我们看到莫斯科《工人日报》及《国际工人通讯》上面有王明、周和生的

报告,主张团结各种力量,共同抗日,争取抗日自由。还有第三国际的许多文件,主要是无产阶级如何与反法西斯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主张民主。我们当时的意见,主要根据这样的原则。

开会的时候,彭、谷和我坚持提出抗日民主自由的要求,认为这样能团结广大学生群众。王、朱坚决反对提民主要求和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认为当时不是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问题,而是坚持打倒国民党,这两种意见相持不决。

其后,我们写了报告给省委,让王转,王未转去,就由杨子英到天津找省委去了。之后,彭、谷和我几人坚持继续进行民主活动。1935年11月,天津《大公报》登载了北平学生要求,燕大学生联系各校秘密研究的是水灾救济会的发展,也是一二九运动的前身。

我们领导几个基础较好的学校:清华、燕京、师大、辅仁、女一中、念一中等,仍继续进行抗日民主自由工作。我们介绍黄敬参加了武卫会,那时黄在北大,并通过我黄敬与彭涛、谷峰见了面,我们筹备成立了全北平学生组织。

“冀察政委会”将成立的消息传出以后,我们开了很多会,筹备一二九运动,反对“冀察政委会”的成立。王健、朱子贞二人因与各校无关系,故各方面找这些学校的关系,企图停止这个运动,他们还发表宣言反对。我们一面继续搞学生运动,一面设法找省委联系。

彭、谷推我去天津向省委报告,省委接谈的姓刘,省委决定撤销北平市委,成立北平临时市委,以谷峰为书记,彭涛为组织,我为宣传,并同意当时提出的口号与进行的工作,决定派人去北平整顿组织,这大约是11月20日前后的事。王、朱不服从省委决定,由一姓梁的前往天津找省委,省委决定仍照前决定处理。临时市委成立后,继续以前的方针,中心工作在于反对“冀察政委会”的抗日运动,筹备了一二九运动。

1944年6月

在一二九运动史学研究中 认识的谷景生

原中央党校一二九运动研究班史学家

北师大历史系教授

麻星甫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经总书记胡耀邦批准，由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蒋南翔主持设立一二九运动研究班，研究一二九运动，撰写一二九运动史。我有幸在此班参与此事，因此与谷老相识，并成忘年交的朋友。

我从史料及对当事人的访问中，得知谷景生（时名：谷峰）在1935年下半年，曾任北平文总、左联和团市委党团（即党组）书记。他和周小舟（时名：周怀求，中共领导下的秘密群众组织——北平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负责人之一）、彭涛（时名：彭定乾，中共北平市委宣传委员）等共产党员，冲破中共北平市工委负责人“左”倾势力的阻力，在北平广大学生中组织开展公开合法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得到中共北方区委的支持。

中共北方区委改组了北平市工委，任命谷景生、周小舟、彭涛三人组成北平市临委，谷老任书记。他们三人又是北平学生运动的公开群众组织即北平学联的党团成员，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领导发动了一二九运动，点燃了抗日救国运动的烈火，并迅速席卷全国。谷老对领导发动一二九爱国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永垂青史。

当时在白色恐怖环境中，党组织处于极端秘密状态，虽然北平临

委以谷景生为首,但他隐蔽在幕后,与上下级又是单线联系,地下党领导更不被人所知。新中国成立后,对是谁领导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有这样那样的说法,谷老从不与人谈起当时的情况。我们从历史档案中了解到以上情况,拜访他核对事实时,他才说出确有此事。至此,有关一二九运动是否是中共组织领导发动的及北平党组织领导人有哪些同志等历史问题才得以澄清,还以历史的真实。

谷老的平易近人,诚恳、正直、谦逊和博大的胸怀,使我深为感动。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良师益友。谷老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从一二九的历史经验 看党的领导与学生运动

共青团郑州团市委

谷景生 20 世纪 30 年代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一直就是负责学运的。一二九运动时期，年仅 22 岁的他，不仅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书记，还是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北平学联领导成员之一，可以说是学生运动的专家，对学运问题是最有发言权的。

他通过领导北平学生运动和直接发动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证明了一个历史性的结论，那就是在现代中国，学生运动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才能健康发展，才能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作用。推动历史进步的学生运动，反过来也壮大了共产党的队伍。

中国的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1919 年，北京的五四学生运动，广大青年学生就是以新文化的闯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精神领袖，发动起来的。正是五四青年学生运动的核心领导人高君宇和许德珩等带领十几个学生冲进赵家楼，痛打了签订卖国条约的官员章宗祥，演出了五四运动最畅快淋漓的一幕。而高君宇和许德珩，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五四运动反对的是袁世凯卖国的 21 条，袁世凯龙廷坐了 81 天，就倒台了。五四运动，确实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

1926 年，北京三一八学生运动，是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的

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发动的。有60多个团体、80余所学校共计5000余人参加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三一八惨案。但是，历史不可逆，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也在全国上下的抗议浪潮中，倒台了。

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更证明了这一点。其实一二九以前很长时间，北平的学生运动状况很不好。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是一个衰退中的城市。北京在1928年6月以后，一下子丧失了有500多年的首都地位，变成了北平。建筑、设施、用品、行业、人员劳动力都出现过剩，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那时一个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而如果能出国留学，“镀金”一下，立刻身价百倍，成了“抢手货”。因此，在许多学生中流行的思想走向是，低头学习不闻政治，把宝压在出国留学的理想上。

北平学生们让残酷的政治现实刺伤了。九一八事变激起的爱国热忱，在学生南下向南京当局请愿失败被押送回北平后，就低沉下去了。这时的北平地下党，受王明“左”倾冒险路线影响，只知暴动，一露头就被破获，党组织屡遭破坏，党领导下的各校学生会组织，也破坏殆尽。《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国民党一再向日军妥协。同样是面对华北危机，很多学生只是在怨愤，苦闷找不到出路。于是沉醉歌舞逃课罢考之事屡见不鲜，或者就是削尖脑袋备考留学，想逃避眼前的一切。

1935年，朱自清教授曾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信说到：“近来的北平，乌烟瘴气，固然可以说一般人‘见惯不惊’，但怕的还是‘心死’吧。这回知识分子最为苦闷，他们眼看着这座文化的重镇，就要沉沦下去，却没有充足的力量挽救它。”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等共产党人在学生中艰苦工作、积极引导，北平的学生运动，不会有后来令人振奋的局面，也不会发生一二九那样影响历史进程的伟大运动。

国民党右派也在极力影响学生。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北平学运会是另一种结果,这从一二九时发生的一些真实情况中,是可以看出来的。当时,清华、北大中,右派学生活动猖獗。一二一六示威前两天,清华请来许德珩在大礼堂讲了很有鼓动性的话,说五四运动北大光荣,一二九运动清华光荣。右派学生当场破坏捣乱,往台上扔鸡蛋和碎煤块。

反动学生还组织了以刘同声为团长的“献剑团”,去南京向蒋介石祝寿献剑。蒋介石接见了他们,赠每人一把“军人魂”(军人短佩剑)。他们回来后将“军人魂”挂在腰间,气焰嚣张,神气活现。

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政府,为了让学生运动纳入他们的领导,采取了两套办法:一是命令各地大、中学校提前放寒假,迫使学生各自回家,不能再集中;二是由南京政府教育部命令各地大、专学校,以每人发30到40块现洋收买学生代表,由校长带领去南京“聆训”,妄图把学生运动纳入他们的轨道。如果学生运动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的局面就不会有了。按照国民党的作法,学生运动就会归于寂灭、归于失败。

然而,共产党积极领导了北平学生运动,并且摒弃了过去关门主义的错误,以正确的政策策略吸引了大批愿意抗日的人们。比如,当一二九游行队伍来到北大红楼时,整天“泡”图书馆用功不问政治的历史系的学生王德昭,却主动跑来敲响了高悬在红楼后面上下课报时的铜钟,用紧急的钟声,呼唤北大同学加入示威游行。这个意想不到的情节,感动了很多同学。再比如,在党的领导下,全市学生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得到充分激发和聚集。单就北大而论,尽管平日不同政治观点的同学,开会来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但在党的“抗日救国不分你我”的口号前是一致的。当北大队伍在南长街南口遭遇警察高压水龙喷射时,同学们同仇敌忾地展开一场争夺水龙头的英勇搏斗。

有人在现场留下一张夺水龙头搏斗的照片。现在谈论一二九运动,往往都以这张照片作为历史见证。就是在那群与警察争夺水龙头的北大同学中,既有左派学生领袖人物朱仲龙(朱穆元),也有右翼头面人物李彬。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表现得同样英勇。这正是中共北平临时市委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主张的成果缩影。



广大爱国学生在示威中,斗志昂扬,英勇地夺下水龙头。

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谷景生和他的战友们的领导下,不仅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也为党和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干部力量。这一大批从一二九运动洗礼中走出来的青年学生,与工农相结合,走上了抗战的战场,大都成长为共产党员。解放后,他们大都担任了党和国家各级岗位的重要职务。人们能数点出一大串辉煌在共和国史册上的名字:黄敬、黄华、姚依林、蒋南翔、韩天石、李昌、宋黎、郭明秋等等,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五四学生运动、三一八学生运动、一二九学生运动,都在说明进步的学生运动和先进的革命理论、先进的革命政党有不可分开的关

系。这是一个宝贵的历史经验。它对今天新世纪、新时代的青年学生,仍然是有效的。学生运动一定不能脱离党的领导。



在示威游行后,组织自卫,坚持斗争。

现在,作为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的谷景生将军已经谢世。但他的战斗经历告诉我们,不但不能脱离党的领导,而且澎湃的激情只有同冷静的理性结合,才能养成坚忍不拔的意志;个人的得失只有服从整体的大局,才能确保革命事业的成功。

作为一个热血青年,看着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祖国,谷景生也恨不得马上奋起抗争。但是,当党组织内部出现纷争的时候,他不是意气用事,单枪匹马地蛮干,也不是意志消沉,一味地感叹报国无门,而是通过积极的努力,取得上级党组织的支持。用组织的力量、集体的智慧,去战胜错误和困难,去赢得胜利。

在运动爆发以后,谷景生又何尝不想加入学生的游行队伍,振臂高呼,或是对民众发表演说,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何等的激昂慷慨!但是党组织的命令是神圣的,他做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英雄。

血气方刚是青年人的特点。但血气方刚既能使人在正义的激情支配下,在关键时刻奋不顾身地采取正义的行动,也会使人在感情胜于理智的时候,一念之差,铸成大错。血气方刚而同时不以“情”代“智”,才是最可贵的。正是这个道理,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就指出:“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振兴中华是当代青年的使命,但这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作保证。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先辈在拯救苦难、动荡的中国基础上换来的,为此洒了多少血。谷景生等一二九先辈掀起狂潮是为了扫除百年的苦难和动荡,是为了我们今天不再有苦难和动荡的日子。今天稳定和谐的环境来之不易,每个学生和青年都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知识,或者参与搞建设、谋发展的事业,不再有当年“偌大华北,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悲愤了。

一二九的精神,就是民族的图强与奋发。当年在党的领导下,谷景生等一二九先辈的图强与奋发,是为了赶日本强盗出国土,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同样,在党的领导下,今天的青年,是要在祖国的这片土地上,建设出令世界瞩目的富裕和强大来。

一二九运动两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领导决策参考》周刊社总编辑 张瑞田

一、一二九运动与共产党的领导

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指出：“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接着，毛泽东又说：“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呢？毫无疑问，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

毛泽东对一二九运动与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阐述。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国青年学生运动史上的光辉典范，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然而，围绕一二九运动的开展与发生，时常会出现一些噪音，比如，一二九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紧密的联系，一二九运动是自发性学生运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对一二九运动的说明也如盲人摸象般零乱、浅显，不足以说清一二九运动的史实。

对于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关系，毛泽东做了精辟的概括：“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广

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

周小舟在1944年6月撰写的《我与“一二·九”》一文,披露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重要史实——“十月和十一月间,国民党六中全会将开会,我们拟在学生中提出争取抗日民主自由的运动,向国民党要求抗日民主自由。当时我们看到莫斯科《工人日报》及《国际工人通讯》上面有王明、周和生的报告,主张团结各种力量,共同抗日,争取抗日自由。还有第三国际的许多文件,主要是无产阶级如何与反法西斯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主张民主。我们当时的意见,主要根据这样的原则。

“开会的时候,彭(涛)、谷(景生)和我坚持提出抗日民主自由的要求,认为这样能团结广大学生群众。王、朱坚决反对提民主要求和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而是坚持打倒国民党,这两种意见相持不决。

“其后,我们写了报告给省委,让王转,王未转去,就由杨子英到天津找省委去了。之后,彭、谷和我几人坚持继续进行民主活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天津《大公报》登载了北平学生要求,燕大学生联系各校秘密研究的,是水灾救济会的发展,也是‘一二九’运动的前身。

“我们领导几个基础较好的学校:清华、燕京、师大、辅仁、女一中、念一中等,仍继续进行抗日民主自由工作。我们介绍黄敬参加了武委会,那时黄在北大,并通过我黄敬与彭涛、谷峰(谷景生)见了面,我们筹备成立了全北平学生组织。

“‘冀察政委会’将成立的消息传出以后，我们开了很多会，筹备一二九运动，反对冀察政委会的成立。王健、朱子贞二人因与各校无关系，故各方面找这些学校的关系，企图停止这个运动，他们还发表宣言反对。我们一面继续搞学生运动，一面设法找省委联系。

“彭、谷推我去天津向省委报告，省委接谈的姓刘，省委决定撤销北平市委，成立北平临时市委，以谷峰为书记，彭涛为组织，我为宣传，并同意当时提出的口号与进行的工作，决定派人去北平整顿组织，这大约是十一月二十日前后的事。王、朱不服从省委决定，由一姓梁的前往天津找省委，省委决定仍照前决定处理。临时市委成立后，继续以前的方针，中心工作在于反对‘冀察政委会’的抗日运动，筹备了一二九运动。”

毛泽东对一二九运动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与总结。尤其是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周小舟的回忆，更加使我们坚信了中国共产党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作用。

二、谷景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做为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谷景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鲜为人知。

谷景生是我军著名的儒将，处事低调，深得同志们的爱戴，但是，正因为如此，他的许多功绩就被自己的“低调”掩埋了。

随着历史距离的拉开和思想的解放，我们有勇气面对过去的一切，尤其是那些被扭曲和篡改的史实。如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人物学科》副主编张如贤所说：“有的人写史、论史不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是以现实中人的政治地位高低来写史论史。”这个问题在一二九运动史的研究中尤为突出。比如有的人在当时一二九运动中只是某个支部的负责人或一个普通党员，但由于建国后随着在党内的

地位逐渐提高,名气逐渐增大,有的人就机械地认为他们是一二九运动中党的领袖。

张如贤所言,正是庸俗社会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

时间会洗清一切,历史雄辩地证实,一二九运动时党的领导者是谷景生、彭涛、周小舟和李常青。

1935年华北事变后,华北大部分地区落入了日本侵略者之手,民族矛盾已明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华北人民,尤其是青年学子,更是群情激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当时,在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为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学明,宣传部长彭涛,组织部长冷楚。市工委领导下的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左联的党团书记是谷景生,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的负责人是周小舟。面对民族危亡的局势,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针,在北平党内产生了意见分歧。彭涛、谷景生、周小舟等人曾从不同途径看到党的《八一宣言》,认为抗日救亡是党的首要任务,主张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方式去发动和组织所有民众尤其是要用抗日、民主、自由的口号去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学生。

但是王学明、冷楚等人不同意这一主张。他们仍然坚持过去提出的“创造北方苏维埃”的口号,认为不是向国民党争抗日的自由,而是整个地打倒国民党。双方意见分歧,争论激烈。王学明还采取组织手段,说彭涛和谷景生、周小舟是“右倾小集团”活动,决定撤销彭涛的宣传部长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彭、谷、周等人商量,由周小舟前往天津,直接向上级党组织河北省委汇报了争论的情况。河北省委认真听取意见后,肯定了他们的正确主张,并决定立即改组北平市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由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兼团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为加强新市委的领导和党内的团结,河北

省委很快又派李常青(代号土耳其)为省委特派员来到北平。北平党组织紧紧抓住挽救民族危亡这一主题,顺应历史大势,采取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市委组成后,立即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联络和组织进步学生作为工作重点。谷景生和彭涛原是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的同学,1932年同时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3年同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任职,谷是团政委,彭是共青团张家口工委书记,他们是在抗日同盟军被“围剿”后来北平的,具有相当丰富的地下斗争和军事斗争经验。

他们汲取过去“左”倾错误的教训,决定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建立北平市学联。学联主席是女一中的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黄华。谷景生直接联系的主要是女一中、女二中、中法大学。和谷景生保持密切单线联系的是学联主席郭明秋。

1935年12月,为适应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和宋哲元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当时的危急关头,北平临时市委当即决定于12月9日这一天,由北平市学联出面,组织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事前临时市委对活动的原则、方法和请愿路线,作了认真的研究。确定12月9日凌晨5时以敲钟为号,各大中学校学生冲出校门,向设在中南海的何应钦行辕进发。请愿时提出的“六项要求”,也是谷景生和彭涛等人商议拟定的。12月9日请愿后,12月16日,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大游行。临时市委还周密制定了讲演及讲演后的撤退计划。当游行队伍到天桥汇集后,由曾任党的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此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黄敬在天桥有轨电车上发表演讲。

史实表明,一二九运动完全是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坚强领导和组织下进行的。它是当时北平党组织紧紧抓住挽救民族危亡这一

主题,顺应历史大势,采取正确的方针和策略的结果,因而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谷景生同志功不可没。

三、评价一二九运动必须树立科学精神

为什么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才能够逐渐完整而真实地披露这段重要的历史事实?以至今天许多人仍然不知其详?张如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要害:有的人,甚至一些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当事人,不是出于公心而是为突出个人,通过发表回忆文章,有意无意地使一些史实被歪曲或被篡改。有的还自吹自擂,使历史失去原貌,以讹传讹,莫衷一是。

尽管一二九运动的历史史实基本上大白于天下,但是,新近出版的一些书籍中仍时有硬伤。在表述一二九运动时,遗漏了一二九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谷景生同志,也未能科学、全面地说清楚中国共产党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核心究竟有哪些人,有时候模糊不清,有时候张冠李戴。

一二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公论,其历史作用,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我们对一二九运动的研究出现不该有的错误,如果不及时修订、更正,对我们全面完整地研究一二九运动将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因此,我们建议有关领导和部门,应该对一二九运动进行一次彻底的文献勘误,树立科学的学术精神,把一二九运动的研究纳入公正、客观的轨道,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



二、丰碑下的沉思

谷景生于2004年11月28日因突发医疗事故，不幸含冤辞逝于北京。谷景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的一生，也是为坚持真理不屈不挠斗争的一生。

从青少年时代起，谷景生同志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1929年，年仅16岁的谷景生，在太原一中学习期间接受进步思想，参加革命活动。1932年，在北平平大高中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陷入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谷景生投入到抗日斗争中，1933年，党组织安排谷景生到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任宣侠父师张韬团（五团）政委，在小汤山战役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弹尽粮绝，战斗到最后，全军覆没，谷景生也身负重伤，被红十字会从血泊中抢救出来，送到北京协和医院救治。伤愈后，谷景生在北平继续为党工作。当时，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誓把共产党人消灭光）、抗日有罪

的高压政策下,在极端艰难的白色恐怖之下,谷景生和彭涛、周小舟等同志,毅然组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谷景生有勇有谋,有胆识,在运动中担任北平临时市委书记,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地下党工作的隐蔽性和保密要求,当年谷景生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历史,一直鲜为人知,这也正充分体现他高风亮节,淡泊名利的优秀革命品质。

一二九运动以后,谷景生奉调太行山参加创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为太行根据地的建立与扩大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开始后,谷景生调任中原野战军九纵政治部主任。淮海战役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十五军政委、党委书记,参加渡江作战。全国解放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他不负党的重托,发挥了卓越的政治工作才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建国后,谷景生积极投身国防建设,任防空军副政委、党委第二书记,国防部五院第一任政委、党委书记,为国防航天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1980年底,在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露头,新疆喀什叶城等地先后出现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煽动群众闹事的事件。中央调谷景生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主持全面工作,为新疆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

发展、保卫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谷景生一生光明磊落、坚持真理。在党内运动中，遭受过残酷迫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叛徒、苏修特务等大罪状，受批判，被数次抄家。1968年2月被当时的中央“二办”关进监狱，整整八年。做出定为叛徒、清除出党、遣散回乡、监督劳动的结论。直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下，才彻底得以平反昭雪。面对迫害和冤屈谷景生心胸豁达，表现出了极强的党性原则，正像他自己说的：“每次运动都是为了纯洁党。但每次运动往往上演坏人整好人的悲剧。”他还说：“要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任何艰难困苦、委屈、冤枉都不怕，都能顶得住。”

谷景生的一生，是一座革命的丰碑，丰碑上记述了一位共产党人对理想、对真理、对革命事业的不懈追求。下面的文章从不同侧面记叙了他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战斗和生活的一些片段回忆。让我们一起在沉思中品味一个真正共产党人。



患难与共

范承秀

我和景生同志共同生活了60年，我了解他的历史，更了解他的为人。在他身上体现了第一代共产党人最可宝贵的品质。

……我想说的是，正当他受到党的高度信任，委以重任之时，我被打成右派，但他坚决不接受同志们的劝告，不同我离婚，遂使自己而后几十年的政治生涯受到了严重影响，却无怨无悔！共产党人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牵连了他，而他却始终以同志的真诚来对待我。如毛泽东所说，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正是他的这种情操，鼓舞我们全家度过了20多年的艰难时光，也感动了周围很多很多的群众。



谷景生与妻子范承秀。

荣辱不惊谷景生

国防大学副政委 李殿仁

我认识谷老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我在总政徐立清副主任处做秘书。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沉浸在欢庆的气氛之中。

一天晚上外边刮着刺骨的北风，门口哨兵告诉我，有一对老夫妇要求找徐副主任反映情况。徐副主任有一个很好的作风，他嘱咐我凡是来访者，不管认识不认识都要热情接待，听完人家意见再说，千万不要拒而不见。当时，我就把二位老同志请到我的办公室兼宿舍。

两位老同志冻得浑身发抖，情绪有些激动。原来，他们到总政一位负责落实政策的领导同志家去求见，先后找了十次人家拒而不见。夫妇俩决定来找徐副主任试试。这时我才知道，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老革命家，一位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并被关押十多年的老将军。“四人帮”垮台后，他虽已出狱，但结论是敌我矛盾清除出党，遣返回乡自食其力。

听了老同志的申诉，我不仅十分同情，更肃然起敬，十分佩服他的坚定信念和正直品格，佩服他的大度和坚韧。我当时就答应向徐副主任报告他的情况，请他等消息。没想到徐副主任对谷老很熟悉，又专门约他们来说明情况，并当场表示组织上要给谷老作结论，推倒强加给谷老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再分配适当的工作。为了顺利解决谷老的问题，徐副主任还同以前曾和谷老搭过班子的秦基伟同志作了商量，由他们分别向邓小平汇报情况。

后来,在邓小平的关心下,谷老先是到广州军区任副政委,后又到乌鲁木齐军区任政委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新疆建设兵团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全面主持新疆工作。从此我同谷老结下了不解之缘,经常聆听他的教诲。谷老在我心中是一位具有长者风、师者风、学者风、帅者风的良师益友。回忆起来,印象特别深的有这样几条:



1981年,谷景生陪同邓小平视察新疆工作时的合影。

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谷老一生历经生死、荣辱考验,受过多磨磨难和莫名的冤屈,但他始终坚信党,坚信马克思主义。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在敌人威胁利诱面前始终坚贞不屈,保守党的秘密,保护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后来他又被林彪、“四人帮”陷害坐了共产党的监狱,在专案组面前始终实事求是、大义凛然,决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的铮铮铁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曲折,受到什么打击和委屈,他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历史的坚定信念从未动摇,始终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立场和科学态度。

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谷老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二九运动是1935年以谷景生为书记的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组织领导的。参加领导的还有组织部长彭涛、宣传部长周小舟以及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三人。毛泽东称一二九运动是伟大的抗日战争准备，“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谷老作为主要领导人，贡献是卓著的。



杨得志到新疆视察工作时与谷景生合影。

然而，由于他长期做党的秘密工作的特殊要求，由于他后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段历史始终鲜为人知。许多人建议谷老讲一讲，他总是说，宣传了党、宣传了运动本身的意义就够了，对个人所起的作用还是少讲不讲为好。这种有功不骄傲、谦虚严律己的精神，表现了

他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谷老转战南北，屡建功勋，领导国防科研呕心沥血，主政新疆团结各族干部群众诚心诚意，贡献大而不张扬。他的这种大公无私、不计名利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很多同志的赞颂。

高度的负责精神和待人的真挚感情。谷老对党的事业、对担负的工作总是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他一生主要是从事党务工作，做党的领导工作和政治工作。他的工作岗位转换过多次，从做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到开创抗日根据地，从指挥千军万马到领导科研工作，从抓军队工作到抓地方工作，无论哪一行他都干得非常出色。为什么？这里边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就是爱学习、肯钻研。

谷老是我们党的知识分子，但他从不满足，一直是孜孜不倦地钻研新知识，还经常深入群众，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探索新规律。所以，他的决策一般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失误。从中我们悟出了一个道理：只要有了事业心、责任心，不懂的可以学懂，不会的可以学会，外行可以变为内行。

谷老对同志满腔热情，真诚而淳朴。他的夫人范承秀同志被错划右派，由于怕他受牵连而主动提出离婚，有的好心人也多次劝他离婚。但他对爱情坚贞不渝，说我了解范承秀，她从14岁参加八路军，进过马列学院，既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有坚定立场，怎么说了几句公道话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谷老甚至因此而在使用上受到影响，但始终无怨无悔。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很关心，一方面在政治上、工作上、作风纪律上严格要求，积极培养；另一方面在职级待遇、生活待遇、福利待遇上热情关照。这使周围同志很受感动。

疾恶如仇的坚强党性和直爽率真的突出个性。谷老爱憎分明，对党、对人民、对战士、对家人都是一片深情，而对邪恶、对不正之风则旗帜鲜明地反对。他最看不惯那些看风使舵的“风派”、溜须拍马

的“奴派”、编造谎言陷害他人的“震派”。他性情如日月光明磊落适微清明。在几次大的斗争中他总是坚持真理，敢讲真话，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很多老同志都称赞他正派而直爽。我所知道的像在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坚持两个团结（即团结各民族干部、团结各民族人民）等方面，他都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而实践也往往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谷老达到了无欲则刚、无私无畏的境界。

谷老在退出一线工作参加全党整党指导委员会期间，坚持深入一线了解情况，呕心沥血，慧眼识才，为党和人民选拔了许多德才兼备的干部。这些人中有的早已走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这也是他的卓越贡献之一。

谷老去世了，但他的思想、品德、精神永存。我们要继承谷老的遗志，以谷老为榜样，完成谷老的未竟事业，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谷老。

2005年4月5日

未被传奇的传奇人物 ——谷景生将军

宋 协 龙

在世界诸多的政党中，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党。因为，共产党创造了人类最辉煌的历史——使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依赖于一批非凡的领袖人物，依赖于一大批像本文主人公谷景生这样的将军和战士。

(一)

在中学读书时，我们就知道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有两大政治运动具有划时代意义。一是五四运动，一是一二九运动。人们能看到的纪念一二九运动的书籍很多，但多数书中只是说一二九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具体领导人是谁却不知道，所涉及的人物有的是北平学联负责人，有的是某学校的支部书记或学生积极分子，而作为直接领导这场伟大运动的中共北平市临委，其市委书记及其市委成员是谁，多年来却没有文章提及。

1995年12月9日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活动开始前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电视台等，几乎是同时发表了一二九运动党的四个具体领导人的唯一幸存者——老将军谷景生的署名文章。其中《北京日报》加了这样一条编者按：

明天,是一二九运动60周年纪念日,《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关于一二九词条的解释,第一句就是:“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的抗日救亡运动。”后面则明确地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抗日救国。中共北平市委和党的领导下的北平学生联合会决定在12月9日举行请愿示威游行。”

那么,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都是哪些人呢?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历史大事记》中写道:“1935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北方局)听取汇报后,决定撤销北平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北平,直接领导北平党、团工作……”60年后的今天,我们惊奇地获悉,当年的谷景生依然健在,这篇纪念文章,就是他写来的。

谷景生的文章记述了当时他们几个人如何恢复被破坏的北平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回忆了当时该不该发动一二九学生大游行的党内两条路线不同意见斗争情况,并讲述他们如何运用军事战术组织指挥游行、巧妙地与敌人斗争的生动史实。

经历了60年的漫长历史,领导一二九运动党的领导人依然健在,这一消息引来了众多的关注和拜访。从这位开国将军身上,人们能读到“共产党员”四个字的真正涵义,这是一位非常感人又令人崇敬的老将军,是千百万老共产党员中的普通一员,也是一位未被传奇的传奇式人物。

(二)

作为一二九运动的党的主要领导之一,足以确定老将军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然而,人们还惊奇地发现,他一生的革命实践,都可以用

“辉煌壮丽”与“轰轰烈烈”来概括。

谷景生 1929 年在中学读书时，便参加了进步的读书会，组织一些青年读进步书籍和共产党的地下刊物《出路》等，从这些书籍和刊物中，他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认为共产党代表了社会的进步，共产党人都有很高的理想与情操，在他们身上集中了人类道德与奉献精神，体现着人生的价值与信仰。于是他开始自觉地用共产党人的形象来塑造自己，并于 1932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谷景生入党后，很快成为北平地下党的活动骨干。1933 年，他被地下党派往抗日同盟军，成为著名的张韬团的团政委。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谷景生回到北平，和彭涛等同志一起恢复被破坏的北平地下党。他先后担任过中共北平团市委书记，北平左联书记，“文总”书记，泡沫社社长。这期间，为革命培养的一大批进步的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很多当时的左联成员和受《泡沫》影响的青年，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进步作家。

1935 年 11 月，谷景生被任命为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彭涛、周小舟、李常青勇敢地组织发动一二九运动。他和彭涛、周小舟、李常青能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非凡的智慧和胆识，发动组织了震惊中外的伟大的爱国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民族革命的巨流，他们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地位是无法抹煞的，是功不可没的。

谷景生的人生历程是辉煌的，从将军的履历中可以看出，似乎他天生就是一个“打天下”者，哪里需要，党就把他派到哪里，派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干出一番辉煌的业绩。

1936 年，党派薄一波赴山西与军阀阎锡山搞统一战线，急需一批得力的党的领导干部，于是，北方局把谷景生等人派往山西。毛泽东曾说过，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最成功的一例，就是薄一波对阎锡山的统战，拉过来 5 万人马，而后的百团大战，这支人马发挥了重要

作用。

1947年6月,太行军区抽调各分区的领导骨干组建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需调一个既懂军事又懂地方工作的纵队政治部主任,在太行区八个地委书记中,区党委推荐了谷景生,当时谷景生任太行区党委第七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

九纵在豫西奋战,连克数个县城,开辟了三个分区的根据地,再克洛阳后,组织上遂任谷景生为洛阳市委书记。

1948年10月,中原野战军攻克郑州。由于郑州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谷景生被任命兼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和警备区政委。

郑州的政权刚建立起来,各条战线开始就绪,谷景生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十五军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秦基伟任军长,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十五军在二野首长刘邓指挥下,和兄弟部队一道突破长江天险,横扫残敌,在四兵团率领下一路征杀,千里追击,解放了全国最后一个城市——昆明。昆明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留下了大批潜伏特务,既有军统的,又有中统的,加上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斗争形势十分复杂。昆明党政让谁来抓?政权由谁来建?中共西南局经过反复研究,又把这个重担压在了谷景生的肩上。

调谷景生任昆明市委书记、警备区政委。经过十多个月的努力,稳定了昆明的形势,政权建设与生产都抓得非常出色,惩治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特务,受到西南局的首肯。

全国解放了,正当谷景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地方政权建设上的时候,抗美援朝战争又爆发了,十五军受命赴朝参战。

西南局书记宋任穷告诉谷景生:“景生,邓政委让我通知你,立即把昆明的工作交接一下,回十五军赴朝!”

谷景生服从组织决定从昆明飞往重庆亲自找到邓小平,谈了昆明的工作和自己希望能留地方工作的想法,因为全国已经解放了,战

争已经结束。小平同志沉思片刻，既缓和又坚定地对着谷景生说：“你还得去，担任志愿军十五军政委兼党委书记，秦基伟任军长。朝鲜战争结束后，去不去地方工作那时再考虑。”于是谷景生与秦基伟一起，率领十五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与美帝国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激烈战斗，成为朝鲜战场上的一支常胜军，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一大批战斗英雄。

从朝鲜班师回国后谷景生被任命为防空军副政委，党委第二书记。

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由聂荣臻具体抓导弹的研制和导弹部队的建设，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谷景生为政委、党委书记。

谷景生，这位老共产党员，用他的工作实践，真正实现了入党的誓言：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打到哪里，就在哪里创造辉煌。

（三）

谷景生，不愧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的一位优秀战将，也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更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丰富人情味的普通人。就在他为我国第一支导弹部队的建设而运筹帷幄的时候，1957年的“反右”斗争开始了。与他几十年并肩战斗的妻子范承秀被诬陷成右派。国防部五院关系到国家的核心机密，在“左”的路线影响下，谷景生被调离五院，到总政任群工部部长，控制使用。谷景生从此便被打入“不被重用”的行列，但共产党员的党性没有使他萎靡不振。他对工作依然兢兢业业，尽职尽责。

这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责令军委三总部，组织两次庞大的联合工作组，一次是赴西藏调查解决西藏暴乱后中印边界军地双方发生的复杂问题；一次是赴邯郸调查解决极左路线下大刮“共产”风如大

食堂、军队劳民伤财的问题。这两次解决重大问题的工作组组长都是由谷景生担任。

去西藏调查中印边境的军事情况历时八个月，谷景生每天要向总参汇报情况一次并报总理。他在缺氧条件下跋涉千山万水，克服重重困难，经过七八个月的调查研究，对中印边防的军事状况，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调整等都详细向总参作了报告，需立即回答的问题，总理都及时作指示由总参作回答。

谷景生对情况掌握之清楚，对问题分析之透彻，以及所建议之正确得到周总理的赞许。

不久，谷景生的报告便作为军委绝密文件，发给有关领导和西藏边防部队。

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过的《伟人周恩来》的电视片中，出现过周恩来总理在记事本上写着“找谷景生谈话”的镜头，就真实地记录了周恩来当时找谷景生谈话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中，将军遭受了难以置信的劫难，但丝毫没有减弱将军对党的忠诚，对人民事业的信念。他被打成“叛徒”关进监狱八年，在狱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关押他的牢房，窗户用木条钉上，昼夜点着一个100多瓦的灯泡，睡觉都不准关灯，而且不准他翻身，只能脸朝外冲着强烈的灯光睡。

“四人帮”的爪牙为摧毁将军的意志，还使用了压头、做喷气式等十几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每逢这时，将军就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骨气与之斗争，让他低头，他偏倔强的站着；头被压下去，他偏又抬起来，直到被折磨得昏厥过去为止。

“四人帮”可以摧毁将军的身体，但却摧不毁将军的意志。在监狱的前六年，和家人断绝了音讯。但他始终惦念着亲人，他用床上的一块木片当小刀，用烟纸做成一个小盒，里面记录着妻子和五个女儿的生日。这寄不出去的礼物，他每年都要做六个，以表示对亲人们的

思念。

残酷的折磨,使将军的身体患了多种严重的疾病,在三〇九管制就医时,一位医生检查了他的病情后感到非常吃惊,这样一位老将军,生命已经到了垂危阶段,是用什么样的毅力和精神支撑着生命?经过一段治疗,他从侧面了解了将军的历史,油然而生出一种敬佩之情。

这位医生从小就看过描写上甘岭战役的影片,曾立志要向邱少云、黄继光式的英雄们学习。没想到上甘岭战役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就在眼前。他不相信这样一位意志坚强的将军能是叛徒,回家告诉了妻子。妻子听后也很受感动,做了点好吃的专程来看望将军。

守卫战士也被将军的精神所感染,不怕自己受处分,为医生的妻子放了行。结果“四人帮”把这一件事当作了重大事件,给这位医生和有关战士以严厉处分。

将军就是在这种非人的生活中,忍受了多少屈辱,艰难地度过了八年的监狱生活。

1978年11月27日谷景生终于得以平反,12月5日他就接到命令,到广州军区任副政委,奔赴对越反击战前线。谷景生,这位党的忠诚战士,顾不得和孩子们团聚几天,顾不得家里已经濒临倒塌的房子,直接奔赴了战火硝烟的战场。

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后,谷景生回到广州。他想,这可能是自己一生南征北战的最后一次指挥战斗了,也可能是自己一生为党工作的最后一站。直到这时候,他才有了一个家的概念。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只身刚刚搬进宿舍的第八天,中央又来了道紧急调动的命令,让他到新疆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军区政委。原来是邓小平指名派谷景生赴新疆主持工作,任新疆党政军第一把手。到任后实际上也是起着第一书记的作用!



1987年，谷景生在老山前线。

于是，胡耀邦电令谷景生即刻赴京，当面委以重任。第二天，谷景生飞往新疆。

有干部问：“你这次从北京来，是否带来一大批人？”“我带人干什么？你们都是我的人嘛！”谷景生微笑着高声回答。

认识谷景生的人，内心不觉都产生一种疑问，他的资历和能力都很高，但最终职务却不高，他1935年就是北平市委书记，当时在他的领导培养下的一些进步青年后来有的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而他竟然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有人真诚地问将军：“您一生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职务却并不高，你不觉得遗憾吗？”将军严肃地沉思片刻，突然反问：“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员吗？”

然后将军笑着平静地说：“要说有遗憾的话，就是在那些受迫害的岁月里，失去了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浪费了很多时间。至于个人的荣辱，我看得很淡，职务高低都不重要，只有共产党员的党性、做

人的品德最重要,我已 83 岁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只要后人觉得我们这些老党员无愧于人民就行了……”

将军的话,说的那么平常,那么轻松,那么自然。然而我们却可以从看到这话语沉甸甸的分量。

2001 年 10 月

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物

《人民日报》主任记者 曾 坤

1982年12月8日下午4点钟，新疆乌鲁木齐地区七所大学在该市团结剧场联合举办歌咏大会，纪念一二九运动47周年。事先，举办者向自治区党政军所有最高领导发了邀请。下午3点以前，各院校演出队伍已陆续到场。

到了3点整，一切准备就绪，只等领导人的到来。谁知，天公不作美，从早上开始，纷纷扬扬的大雪就下个不停，马路上全是积雪，行人嘴里吐着白气。几位大会组织者此刻的心情，就跟这天气一样不安宁，一个个不约而同地跑到剧场外翘首张望。

3点40分，时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的谷景生，第一个来到会场，所有的人都大喜过望。最高领导亲自出马，大会的规格一下子就上去了。举办者这种欣悦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而作为采访大会记者的我，则对正处高度紧张工作状态中的主要领导人能亲临青年团歌咏大会，是不多见的。这深深感染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记者。

当天我从老同志那里了解到，谷书记是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市委书记、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与李常青、彭涛、周小舟等组织领导了一二九运动。

第二天，《中国青年报》上登载了我写的一篇消息：“本报乌鲁木齐12月8日电乌鲁木齐地区七所大学，今天下午联合举办歌咏大会，纪念一二九运动47周年。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当年一二九运

动组织者之一、北平团市委书记谷景生参加了大会。各族大学生满怀革命激情，高唱革命传统歌曲，热情歌颂党、歌颂祖国，决心继承和发扬一二九革命传统，为振兴中华做贡献。”

岂料，一则小消息却引起大轰动。短短数日内，我接到全国十几封来电来信，纷纷询问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中怎么突然冒出个姓谷的来？依据什么？过去怎么没听说过？党史中怎么没记载？

蓦地，我意识到这是一条重大新闻线索。此后，我被逼得翻箱倒柜，查史阅卷，了解到许多有关的历史事实。对这一线索的采访延续了十多年，一直到我调入人民日报社，成为了主任记者。在追溯谷书记经历的过程中，总是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例如，我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样一位资深的老将军，为了忠贞的爱情，宁愿抛弃高官厚禄，饱尝艰辛和苦难。

谷景生的名字重新出现在报刊上，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而报刊上将他当年在一二九运动时的突出贡献公布于众时，已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

谷将军20世纪30年代初加入中国共产党，20岁当团政委。抗美援朝时，他任政委、秦基伟任军长的十五军，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打出了威风。1955年谷景生被授予少将军衔。“反右运动”之前，他相继担任军委防空兵副政委、党委第二书记，国防部第五院政委、党委书记。

1958年，他的妻子范承秀因替一位同事秉公直言，被错打成右派。此时，范承秀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并还怀有身孕。谷将军铁骨铮铮，不忍独善其身，誓不与妻子离婚。结果，仕途一落千丈。“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了“四人帮”迫害的重要对象，被关押入狱长达八年之久。直到1978年之后，谷将军才得到解放。历任广州军区副政委，乌鲁木齐军区政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书记、第一政委。

长期的磨难并没有改变他求真、求实的生活态度和理想主义的人生追求。20世纪80年代初,谷将军刚出来工作不久,某文学研究所拟整理出版一部《左联回忆录》,纷纷向当事人与知情人约稿。一些人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不说真话、依附权贵。谷将军得知后,疾书致该研究所:“编写《左联回忆录》,应以历史事实论史,不要重蹈以现在人的地位论史的覆辙。保持历史本来面目。”虽然短短两行字,但这在当时,仍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后来,研究所将谷景生的信原样收录在《左联回忆录》这本书中。

谷将军今年已90岁高龄了,晚年生活很幸福。如今他和老伴范承秀住在京城一座四合院里,享受着大军区正职待遇。说起往事,一副超凡脱俗的态度。只是谈到子女时,却有说不完道不清的不尽悔意!他人生道路上的坎坷经历,像一把双面烙铁,使子女背腹受伤。他衷心希望,父辈的“升”与“降”,再不会涉及子女的身上,给子女们一个自由的空间,让他们去走自己的路!

2003年12月9日

患难夫妻白头情

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 叶家林

谷景生将军今年 89 岁了。我对他可说非常了解。他生性爽直，处事却细致入微，对人和善可亲。正像我党很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谷老几十年革命生涯，有很多辉煌的时候，也有过一段身陷囹圄、含冤受辱的岁月。

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有两段可说最为闪光。

1935 年，23 岁的谷景生任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书记兼共青团市委书记，与组织部长彭涛、宣传部长周小舟一起，直接策划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

毛泽东在 1939 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这样说过：“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推动了‘七七’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

谷景生另一闪光的人生经历，是他担任第十五军政治委员的六年征战中，与秦基伟军长及其他军政指挥员一道，带领所属部队转战 2 万余里，作战 1000 余次，歼敌 23.6 万余人。特别是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这支英勇善战的英雄部队，立下了赫赫战功，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一大批值得中国军人骄傲的战斗英雄。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成名远扬，在我军的建军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谷景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段身陷囹圄、在危难中抗争的坎坷经历，既令我十分同情而又感奋不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总政被诬为“阎王殿”，大小干部一概被打倒。曾作为群工部长的谷景生早两年就离职治病了，但也很快陷入困境。造反派先把他定作“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复批斗，后从谷景生的历史档案中查出他在一二九运动中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就凭这一点便咬定他是“叛徒”，进行轮番残酷的批斗，逼迫他交待“罪行”。谷景生是个坚强正直的汉子，大拍桌子说：“老子革命什么都不在乎，难道就听任你们颠倒黑白、造谣诬蔑？！”

造反派到他家里三次抄家，翻箱倒柜大搜查，发现他的妻子范承秀多年来向北京市委、党中央所写的为自己被打成“右派”申辩的材料，如获至宝，认为这下又找到了谷景生为右派翻案的证据，对他加大火力批斗，吃饭前勒令他“请罪”，他严正地说：“我无罪可请！”

我当时在总政也是挨斗的一分子，趁着身旁没人，悄悄走近谷景生小声说：“看来这场运动一时完不了，不吃饭身板子抗不住啊！”他没有吱声，只点了点头。此后就见不到他了。后来听人说，他被中央“二办”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剥夺政治权利，关押监禁。

早在1958年，谷景生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调到总政任群工部长。有一天晚上他到老首长傅钟副主任家中探望，并请示工作。在座的有傅副主任的爱人刘筱圃和我（我任傅的秘书）。谷部长和傅副主任久别相见，两人交谈甚欢。傅副主任历来重视群众工作，在抗日战争初期曾任第十八集团政治部主任兼群众工作部部长，彼此交谈的话题很多，刘筱圃在抗日战争前，曾在北平市临委领导下做地下交通工作，虽未见过面，但她知道临委书记谷景生。交谈中，她问及谷部长的爱人和孩子可好？谷部长低下头来深叹了口气说：“我爱人范承秀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了右派，现仍在劳改农场监督劳动。”因时近深夜，谷部长不便细说便告辞。

第二天一大早，刘筱圃对我说，昨夜谷部长说他的爱人被打成了右派，可他不肯多说就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要我抽空打听一下。

我经过多方面的了解,才知道范承秀是北京市中级党校教研室主任。整风运动开始,她作为党支部整风领导小组组长,积极领导同志们学习有关文件,按照上级的部署,学校也展开了“大鸣大放”,贴出了大字报。有一天,学校突然宣布彭浩如是右派,范认为她是抗日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对敌斗争中,她勇敢坚定,从哪个角度看都不会是“右派”,公布的所谓材料,也不过是她给某些人提了点意见。范承秀找到校党委书记,为彭浩如说话:她最多是个思想问题,决不是政治问题。

范承秀哪里知道,噩运正朝她走来,说她屁股坐在了右派的一边,为右派鸣冤叫屈,说她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因此,她也是“右派”。

组织结论是要本人签字的,范承秀就不签,并写了不同意结论的声明。造反派认为她态度“太坏”,决定开除党籍,押送到大兴县农场监督劳动,家中留下五个小孩。谷景生又当爹又当妈,处境十分艰难。

有一次,已当上国务院副总理的谢富治对谷景生说:“小谷,快离了吧,这不是个人生活问题,你要晓得这是个政治大问题呀!……”谷景生没等他把话说完,扭头就走。

我把所了解到的情况向刘筱圃作了汇报,她听罢连忙说:“太冤屈了,请你写一份材料给主任看看。”我把写好的材料交给傅副主任看了后,他唏嘘不已。我正要走出他的办公室,他把我叫回去说:“现在时近冬季,你给管理局打电话查问一下,给谷部长家烧锅炉的煤送去了没有?”我记得自这以后,每年过春节不管天气怎么寒冷,傅钟副主任都要去谷部长家拜年,询问生活情况。特别在1962年,全国闹大饥荒,总政从内蒙弄来一批黄羊肉,傅钟副主任要我打电话给管理局说,谷部长家里小孩多,应照顾多发一些。

范承秀的申辩材料被群工部的造反派送到北京市委中级党校,党校的造反派又把范承秀抓了去关进水房里,使她身心健康受到很

大的摧残折磨,在那黑白颠倒的日子,谷景生处境更加险恶,最终也被抓入狱。

几年过去了,局势越来越乱。谷景生关押在哪里?是死是活?范承秀无法知道。她夜思梦想,有谁能告诉我,谷景生究竟还在不在人世?她在恐惧和焦虑中煎熬……

直到九一三事件以后,1973年情况才有了好转。范承秀设法给叶帅送去一封信。叶剑英很快作了批示,二办专案组又拖了好久才让她和孩子去探视关押在监狱中的谷景生。范承秀对我说:当我见到他时都不敢认了,真是惨状难言!个子比先前矮了,腿是瘸的,脸色青紫,破军裤上大补丁套着小补丁。更可怕的是,他不会说话了,反应迟钝,看到他这个样子,我的心似刀割,六年不见,孩子们,他都不认识了。此情此景令人心碎!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为了挽救党和国家的命运,急需配备干部,邓小平让秦基伟找谷景生来面谈,秦无奈地说:“小谷还在监狱里关着。”后来小平同志在范承秀的申诉书上做了批示,要中央二办尽快处理谷景生的问题。可是那时中央二办在“四人帮”掌管下,就是顶着不办。

粉碎了“四人帮”,谷景生分别上书叶帅、小平同志要求彻底解决自己的问题。小平同志多次敦促总政有关负责人尽快查明情况。他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任命他到广州军区任副政委,1980年初,中央决定调谷景生到新疆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范承秀调到自治区党委担任宣传部副部长。

现已耄耋之年的谷景生仍时刻关心祖国的大事,每天的报纸必读,电视《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必看。我对他们夫妇生死相依的真情万分敬佩,信口吟出几句诗以颂之:信誓鸳鸯不慕仙,岂因偶挫即思迁?梦魂各守半边月,患难夫妻五十年。

原载 2001 年 2 月《中华魂》第 71 期

望河怀宛洛 沙场秋点兵

——谷景生在二野九纵工作片段

原总参测绘局政委 刘增钰

—

1947年春节后，我奉调进入驻在河北省涉县赤岸村的太行区党委党校学习。开始三个月是整风阶段，说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其实这次整风虽然没有像1943年前后那样的暴风骤雨，却也没有什么和风细雨。在白天，一“上立场”，照样是做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搞不完的批判站不完的队，生活非常严酷而紧张。到晚上，倒是真的有戏看，当时太行军区正好有一个京剧团，行当俱全，而且拥有不少名角，几乎每隔一两天就有一场演出，学员门这才能够喘口气，轻松一下子（这个京剧团随十五军进入昆明后，与当地关肃霜剧社合并成为云南省京剧团，曾经名噪一时）。整风结束，接着是学习路线，听报告、看文件、记笔记，小组大组讨论会。这阵子，太行区的土改运动已进入填平补齐的收尾阶段，各地正忙于丈量土地，发放土地证；贫下中农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涌动的参军热潮方兴未艾；全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商业都在蓬勃发展，市场繁荣，社会秩序稳定，呈现出一片太平景象。学习期间，我们还经常到漳河两岸的农村参观考察，体验生活。应该说，这段学习是颇有收获的。

7月间，豫北战役正在激烈进行。

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令下,太行区继第三、第六纵队之后,第三支野战纵队……第九纵队正在筹建。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窦力新调任独立二旅政治部主任(这个旅即后来九纵的二十六旅),军区政治部袁子钦主任要我去接替他的工作,回政治部担任敌工部长。我便匆匆结束学业回到王堡。正巧黄镇同志从豫北前线回来参加区党委会,也住在这里。他原是太行军区副政委、区党委副书记,已被总前委任命为拟议组建中的第九纵队政治委员。在区党委会结束的当天晚上,他把我叫到家里,对我说,目前在豫北作战的独立二旅,在战役结束后,将要和一些分区的基干团组成新的野战部队——第九纵队,任务是和四纵组成一个作战集团,在潼关、洛阳之间横渡黄河,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以牵动敌军在西北和中原的部署。纵队司令是秦基伟,副司令是黄新友,参谋长是何正文,政治部主任是原七地委书记谷景生,这次区党委会他也在场。他接着说,这次南征作战,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大兵团在新区行动,没有巩固的后方是不行的。既要打仗,还要开展地方工作,创建新的根据地,都需要大批干部。我已和袁主任商妥,决定让你到九纵担任敌工部副部长。接着还谈了一些任务和注意事项,并要求我作好准备,迅速赴博爱报到。第二天一早,他便离开了太行军区。

那年月,首长说话,一锤定音,坚决执行莫商量。我也想走出去,见见世面,长点见识,于是就立即进行准备工作。

区党委和军区在九纵组建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是多方面的。仅就我们一个小小的敌工部门来说,他们的帮助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政治部在短短的几天,就给我们组建了一个前方战俘军官收容所,全所50多个人,大部分是由太行战俘军官教导团调集来的。除管教人员以外,还设有一个五人医护小组,其中有个医生是日本人,这人在解放郑州战役中阵亡。敌工部还帮我们收集了不少有关豫西情况的材料。

后来,我又跑到区党委面见李雪峰,目的是想了解一下新区的情况。当即由赵德宗给我拿来一大摞文件,大部分是豫西各区的政治、经济和人文方面的情况,诸如文化教育、文化艺术、民俗风尚、新闻出版、学术团体、名人轶事和宗教会道门的记载。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地方党的组织活动和党员名单,以及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做潜伏工作人员的线索。他说,这些材料,原来是给小谷同志准备的,因为他走时匆匆忙忙,没有来得及带走,正好由你带去,这样更好。他特别提到,这些材料大部分是抗战初期收集来的,有的还可能更早一些,所以只能供参考。事过境迁,那里的情况已有很大变化,人也是会变的,你要告诉小谷,在名单上提到的那些人,在启用时,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必要时要进行审查,切不可掉以轻心。告别时,雪峰同志问我,过去认不认识谷景生,我摇摇头,表示没见过面。他说,小谷在内战时期曾在部队待过一段时间,当过团政治委员,后来才转到地方来的。他在基层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是一个很杰出的领导同志。这次九纵出征,开辟中原战场,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总前委采纳区党委建议,任命谷景生为纵队政治部主任。为支持他的工作,创建新的根据地,区党委已选调了200名干部,归他节制,如果发展顺利的话,这点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今后,区党委必将尽最大努力,满足前方的需要,将陆续选派更多的干部前往支援。记住,太行区永远是你们的后盾。

我们这一行人马,于7月底由天堡启程,沿着公路经东阳关、黎城、潞城、长治,到达晋城。休息一天又继续南行。天井关真是名副其实,四面高山壁立,山谷中只有一条崎岖小道,越走地势越高。经过一番跋涉,终于爬上了太行山南端的绝顶。这里高入云端,飞鸟难渡。回首北望,但见群峦叠翠,苍山如海。向前看,则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豫北平原。弯弯曲曲的溪流,河上的点点风帆,丛林烟树,星罗棋布的村镇,都历历在目,顿觉眼界为之一空,好象天地也大了许多。

稍向西去，进入一个很大的村寨。时值盛夏，烈日当空，直走得人困马乏，我们便在村里停下来，准备吃点东西，稍事休息后再继续上路。

我信步走向街心，看到远处零零星星站着一些人，好象也是刚刚吃完饭，要继续赶路的样子。其中一个人，正在向周围的人说些什么。我一时好奇心起，便走了过去。这才看清，那个讲话的人，其实年龄不大，约莫有30来岁。身材并不高，却也并不瘦弱，浑身散发着一股青春的气息。他穿着一身贴体的军服，显得是那么潇洒蕴藉，风度翩翩，完全是一付学者派头。在他身后，是两个腰扎九龙带，背着驳壳枪的警卫员，稍远处是两头高骏的黑骡子，驮着一些简单的行李。看样子，必定是某机关的一位首长。他的听众却都穿的是便服，有的是中山装，有的是对襟小褂，有的腰里还别着“碰弹”，完全是老太行县区干部的穿着打扮。只听他说，大家在幼年时期，大概都念过《三字经》吧，还记不记得“昔仲尼，师项橐”这两句话。听众中有的人摇摇头，意思是早已忘记了。他接着说，其实那段故事，2000多年前就发生在咱们现在站着的地方。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由子路推着车路过这里，正巧村子里有十来个小孩子在玩耍。在路当中，用石头堆叠起来一座小城，这些小家伙还真有点建筑才能，居然修建得有城门、有女墙，满像那么回事儿。子路推着车，高声喊着，赶快让路，眼看着就冲了过来。忽然从旁边蹦出一个小孩子，挡住了去路。这个顽童，大约只有六七岁，梳着两个冲天小辫，生得眉清目秀。他姓项，因为背有点驼，小伙伴们就把他叫做项橐。只见他双手叉腰，挺着胸脯，两条腿八字撇开，站在路中央，凛然一副一夫当关的架势，硬是不让子路过去。孔夫子赶快走下车，问道：“小朋友，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去呢？”项橐把小脑袋一搏楞，翘起大拇指朝后一指，道：你看没看见，我的身后乃是一座城池。孔夫子点点头说，不错，是一座漂亮的小城。项橐说，你已经活了这么大年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你听说有哪一座城池曾经给车和行人让过路？车马行人要想

过去,只能经城门穿城而走或绕城而过。孔夫子连连点头说:你讲的很有道理,一座城池是绝对不能够自己爬起来,给车马让路的。而且也绝对没有人能够把一座城池搬起来,给车马行人让路,丘谨受教。于是便让子路推车绕城而过。

项橐聪慧机敏的才智和孔夫子谦逊好学的美德,相得益彰,佳话就这样流传下来。这个村子,也就成了拦车镇。当时,这里也可能是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小村落。斗转星移,2000多个年头过去了,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了拥有千把人家的村镇,真是人世沧桑。这段故事,虽然已经老掉牙了,直到今日,还仍然在发挥着它独特的影响力。后来,孔老夫子还曾感叹地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意思是说,个人总是微不足道的,而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一个人,如果要想为人民做一点事,为国家尽一份责任,那么,他就必须谦虚谨慎,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才行,只有这样,才能有所作为。有一点成绩,就故步自封,就骄傲自满,就盛气凌人,就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这样的人,总是要碰钉子的,归根结底是必然要失败的。小则犯错误,挨板子,霸王别姬,大则身败名裂,变成一堆历史垃圾,贻害国家,贻害人民。

这位首长的态度平易近人,显得非常诚恳,讲话的语调平缓,十分吸引人,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丝毫不带有要教训什么人的口吻,使人听了如浴春风。这时,尽管中午已过,日影已稍稍东移,但夏日的骄阳,仍然灼得令人难以忍耐。可是,听众却都站在露天里,凝神静静地听着,不觉得自己已经汗流浹背。直到讲完了,这才在深思中陆陆续续踏上自己的行程。

我伫立街头,久久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心里在想,这个同志,学识渊博,且能寓教于谈笑之中。如果是在部队工作的话,他一定会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儒将,一位才华出众的指挥员;如果是在地方的党政机关,也必然是一位能够独当一面、领导阶层的人物。

下山后，迤迳东去，进入清化境内。这里是河南的鱼米之乡，素有小江南之称。竹影婆娑，十里荷香，田野里，稻浪翻滚，到处渔歌声声。和太行山区相比，自是别具一番风光。到纵队政治部报到时，这才知道，原来，在拦车镇见到的那位，竟然是我的顶头上司——政治部主任谷景生。

初来乍到，人生地疏，在一个新的环境里，新的工作，又面临着一大堆任务。我内心里，为能有这么一位领导而感到欣慰。

纵队政治部是一个新摊子，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如张彦、许志奋两人，他们便是结束在高树勋起义部队的工作，刚刚回到军区时，由黄镇政委“顺”来的。1945年，邯郸战役，高树勋率国民党新八军战场起义，随即，该部便由平汉线西调进入太行。晋冀鲁豫军区为改造这支军队，曾派人不少干部。他们俩在那里工作近两年，积累了不少经验，是最早到政治部报到的部长。郭春文原在地方工作，是河北赞皇县县委书记。其余的人，有的来自太行军区，有的则是刚从独立一、二旅调进来，连同勤杂人员，全政治部也就七八十号人马，摊子并不大，但它却是全纵队政治思想工作的统率机关。位置这么重要，而人员又都互不认识，要想一下子把大家捏拢，顺利地展开工作，单纯依靠党性和下级服从上级的律条，显然是不够的。这里，必须要有一个像磁石一样的人，把大家吸引到周围，才能使机器运转起来。而刚刚到职的谷主任，就有这种本事。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秘诀，只是由于他具有一副宽容和坦诚的胸怀。下马伊始，他就推心置腹地逐个找部属谈心，了解他们的工作经历，征询意见，交换看法。发现有的同志思想有疙瘩，有顾虑，便苦口婆心地进行教育开导，使之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发现有的人业务生疏，对工作环境不太适应，便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不厌其烦地进行指导，逐渐使之理顺自己的工作关系；发现有的同志在一些理论上，或是一时不能理解，或是另有见解，便和他们一起探讨，以求得共识。仅仅两三个星期，他和部属

之间的距离，便拉近了许多，大家感到，好象老早以前，就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相处得那么自然。这样一来，上下同心同德，工作起来，自然也就得心应手。王培纯（干部科长）、张纯清（组织科长）说，他们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总觉得在谷主任领导下，工作起来分外带劲儿。当时，面对此情此景，我也深受感染，曾经想起过昔日谢灵运的感怀诗：我本湖海客，忠义感君子。精神的力量，并且竟然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太行第九纵队是一支新军，唯其新，没有包袱，勇于进取，所以就有一股子锐气。加之，它的团一级军政干部，大都是抗战初期入伍的，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热血青年。他们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善于在斗争中学习政治工作，经过十年磨砺，已成长为一批英气勃勃的战斗骨干，一批出众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思想工作者。这样的军队必将前途无量。

正是：等闲飞崆秋原上，独向寒云试射声。

二

渡河前的准备工作，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整个工作的大框架和总的指导意图，经过纵队党委认真研究确定之后，具体工作则分头由各职能部门予以实施。诸如部队的编成序列，装备的补充与调整，作战方案的研究与制订，实兵演习的策划与监督，以及部队技术战术训练和军事教育等工作，就归参谋长领导下的司令部负责；而关于干部的任免与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的搭配，党委和支部的建设，政治思想工作和理论教育，对内对外的宣传以及严肃军纪，开展地方工作等事项，则由政治部主任领导下的政治部门负责。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部门之间既有分工，又有配合，这样就组成了有机的整体工作。

九纵组建时,独立第一旅和二旅在豫北战役结束后,已相继于7月中下旬集结在清化一线进行休整。这两个旅人员齐全,装备也比较上档次,改制为九纵第二十五旅和二十六旅时,基本上是原班人马,变动不大。二十七旅则是由太行三个分区的五个乙种团(乙种团是只有两个营的团队)合编而成的。它的领导班子需要新建并需要磨合,它的旅直机关,虽有原五分区的一部分人做基础,但也从各团调进一批新力量。所以在组建过程中,工作量是蛮大的。作为政治部主任,工作自是十分的紧张。加上会议又多,几乎每天都要忙到深夜才能休息。要找干部谈话,尽管是说服工作,我说你服,可是要说服的对象是那么多,要做到服的程度,也需要有很大的耐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据警卫员讲,他有时在夜间还要阅读文件,每天只能休息三四小时。

我到达政治部的时间稍晚一些,第二天,才找到一点点空隙时间,向谷主任做了简要的汇报,并把从太行区党委带来的材料交给他。敌工部长张彦到职较早,当时也在座。经主任指派,敌工部的工作由张彦负全责,我只分工管理审查被俘军官和教育争取改造被俘士兵的工作。并把警卫营第四连和黎成民兵营,拨给我指挥,担任战俘收容所的戒备任务。

谷主任的到来,给部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首先表现在:他不端官架子。

由于长期行军作战,冲锋陷阵,决战决胜,这种严酷的战斗生活,习与性成,就养成了部队的一种特殊性。那就是等级森严,一切行动规范化。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接触,都有一套刻板的程式。下级晋见上级,进门先喊报告,见到首长要举手敬礼。做汇报或听候指示,事情办完,立即举手齐眉,一个向后转,两个脚跟一碰,然后齐步离开。同级之间,上下级,一般打招呼,也得用官衔,什么长,什么政委,什么员,什么主任,不能随便乱叫。在地方上,可就没有这么多繁

文缛节，上下级之间来往，要比较随和得多。即使见到李雪峰这样的大人物，也只是称老李，点点头。推门就进，先握手问好，然后随便坐下来，就能汇报、请示工作或研究问题。这在部队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便有，也只是在同级之间，他们有时也打打闹闹，开开玩笑，轻松轻松。但一见首长驾到，就会立马安静下来，站起身，听候指示。而地方上则要宽松一些，没有什么军容风纪问题，要更多一些人情味。谷主任长期从事地方工作，他的到来立即就把这种风气带入了政治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么一来，政治部也就类似于地方的党政机关，大家相处的也就更为和谐。就拿吃饭来说吧，纵队首长们吃小灶，是在十年战争中逐步形成的。开始时，物质条件差，灶儿虽小，但菜却不多，也不太精致。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水平逐步提高，范围也逐步扩大。不但纵队和旅，就是团一级也有了很不错的小灶伙食。纵队司令部和政治部，行军驻军都在一起，所以，他们几个首长在一起吃小灶，乃是约定俗成的事。黄镇政委几次邀他去一起用餐，他都婉言谢绝，但他却在政治部开了一个叫做中灶的小灶，把几个部长集中在一起吃饭。我和任大卫、郭文春三个副部长，初时都不太愿意参加。任大卫说，男人的两件苦差事，一件是陪女人逛大街，一件是陪领导吃饭。他说，和首长一起吃饭，感到拘束、沉闷。后来，毕竟我们还是参加了，任大卫的态度也有转变，他说，和谷主任这样的首长在一起“搅马勺”，满惬意的。据谷主任说，他这么做，第一，是为了和大家联络感情，沟通思想；第二，是为了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避免高高在上。和大家在一起，可以多听到下面的一些情况；第三，是有些小事情，不必召开部务会就能决定下来。最后他说：“总之，我愿意和大家在一起，同吃同住，风雨同舟，这样，我感到踏实。”我在九纵前后近半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政治部度过的。

其次，是由于他的民主作风。

民主究竟是什么，而且一提起民主，就会联想到集中，这两者之

间又是什么关系,多少年来,莫衷一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要想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还真不容易。近年来,有人把民主说成是一种手段,而集中才是目的。谷主任对这种说法是有保留的,他在一次部务会上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民主,把它说成是一种手段,这样的绝对化,恐怕是片面的。比方说,西方的旧民主革命,当时新兴起的资产阶级,曾高喊“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向封建势力宣战,这时的民主就是目的,由于有新生资产阶级的领导,现代的民主制度,取代了过去的封建统治。现在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其实也是一种民主集中制,它的精髓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允许反对,保护少数。为了遏制极端民主化,建立了互相抑制的三权分治制度。议会、行政、立法相互关联而又各有专司,用以防止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这就是所谓法治国家。这种制度,尽管还有缺陷,还存在很多问题,并不那么完善,但是毕竟比中世纪黑暗的封建统治要先进得多。可见,民主乃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标志,它代表着文明。在咱们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2000年来人民处于皇权的统治之下,受尽了摧残与压迫。大家都知道,当时流传着一句官铭,也叫官箴:当官不为民作主,枉吃皇家俸禄银。人民是不能为自己作主的,自己的主,要由官府和朝廷来作。做州官的叫州牧,老百姓都是被牧的对象。这哪里能谈得上民主,甚至连一点点民主的气味都闻不到。历史上,也曾有过个别的君主,下诏征求直谏,也曾有过一些直谏之臣,如魏征之流。也曾有过个别君王能够听取一些诤言,如唐朝的李世民,他是以一个能够纳谏的明君载入史册的。如果把这种臣下向上级的进言,叫做民主的话,那么,这时的民主就是一种手段。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样的民主,把它叫做民主,是很勉强的。君王们把臣下的意见集中起来,去芜存精,择善而从,主要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统治策略,以加强自己的家庭独裁专制。这么一来,这种民主反而变成了封建主义改善统治的一种手段。所以说,民主与

集中是对立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到明朝已发展到顶峰。满清入关后，原封不动继承了朱明的统治体制和政策，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实行高压，再加上民族之间的疑忌，其残酷程度也就发展到了极限。文字狱，在咱们中国，是古已有之的，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东汉的党锢之祸，宋代的同文馆狱，明代的东林党案，可是也“罪”只及身，很少株连子女家庭。到清一代，竟然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吕留良一案，除诛绝九族，连死人也不肯放过，还要开棺戮尸。一个书生，在室内写诗，触景生情，因为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就遭到灭门之祸。这种惨无人道的恶行，始于康熙，到雍正、乾隆朝，进入鼎盛期。黑暗野蛮的统治，使当时的中国几乎变成一片荒漠。这时的欧洲，工业革命正蓬勃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空前繁荣。我们中国在干什么？满清王朝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实行压制的政策，毕竟还是没能把汉人锁住，结果是人家打进来了，对内也并没有把中国人民压垮。帝国主义的入侵，一方面人民在遭受苦难，另一方面固然来了，我们自然也就有人出去，人来人往，思想、认识、文化也就会有交流，中国人的眼界打开了，看到了外部世界，于是民主意识也在蓬勃发展。先驱者们前仆后继，为争取民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国，才建立起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政体——中华民国。洪宪复辟和张勋复辟的相继失败，说明中国人要民主，不要独裁，要人民共和国，不要专制王朝。可见，凡是被奴役被欺凌的民族，他们就渴望民主。争取民主自由，就成了他们奋斗的目的。

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打倒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对内实行镇压，不准人民说话，饭馆里都贴着莫谈国事的标语；对外向帝国主义卑躬屈膝，奉行不抵抗主义。直弄得内忧外患。经过八年抗战，好不容易打倒了日本军国主义，接着又是连年不断的内战，陷人民于

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就这样夭折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担子就落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我们党是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们领导的这场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战斗的目的，就是推翻蒋家王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

谷主任的讲话，言简意赅，使我们受到很大启迪，只是在战争时期，没有能够做进一步的探讨。接着，他便把话题转入到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一原则，其实也是舶来品，其核心精神就是少数服从多数。集中就体现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因为，中央领导站得高，看得远，它代表着全党的利益，所以全党服从中央，也就体现少数服从多数。但是，有时真理竟在少数人手中。于是有了允许反对，保护少数的原则，这就是民主。我们党从支委会到中央，委员会都是以奇数组成。五人的委员会，有的问题，三人赞成，两人反对，那么，那两人就必须服从多数，执行委员会决议，不得掺杂有个人成分，不能讲价钱。但是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如果实践证明，那两个少数是正确的，就进行检讨，把偏差纠正过来。20多年来，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其效果也是显著的。我们的部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党是由民主集中制原则组成的。那么，在部队，也应该是民主的。我们反对极端民主化，可是并不反对民主。只是由于军队任务的特殊性，集中要多一些，民主要少一些。没有下级服从上级这一条，怎么打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没有集中，就没有拳头，就打不赢敌人。同时，也应该看到，部队的党组织也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在党的会议上，可以对任何人提出批评，有谁敢于打击报复，是要受党纪制裁的，这就是一种政治上的民主。此外，还有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如在攻取某个目标时，指挥员把部属召集到一起，说明敌情任务，让大家出谋划策，三个牛皮匠，

凑一个诸葛亮，在这种叫做诸葛亮会议上，让大家讨论，以确定作战技术的运作，以极少的代价去夺取大的胜利，这就是军事民主。军队的伙食账目要公开，如有积余，就分给大家做零花钱，在红军时期就是这么办的，这就是经济民主。这也就是我们和旧军队的根本区别。

须知一个人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一定要有自知之明，万万不可自我陶醉，自我膨胀，意气用事。时时都要想到群众，这种作风，实际上就是一种民主作风。这是我们都能够做到的。谷主任言行一致，在听取部属汇报时，从不打断别人的谈话，在部务会上，更能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归纳总结，做出果断决定。所以他和同级、和部属之间都处得比较融洽，他在九纵的人缘是很好的。可是，他认为是自己正确的意见，有时和人争论起来，直争得面红耳赤，不坚持到底，决不罢休。加上他性情比较急躁，如发现部属有办事不力，工作懈怠，或行为失检，惹来麻烦，就会大发雷霆，进行严厉的批评，绝不姑息手软。因此，谷主任本身，就是一本书，一部大书，读了，可以使你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可以使你增长见闻，积累知识；可以使你理解处世哲学，了解人生真谛。初时，大家都以为他只是一个一般的知识分子，后来才逐渐发现，他的人文修养竟如此的广泛，他的文化底蕴竟是如此的厚重。实际上，他个人本身就是一部历史，是一本读来令人受益的史书。

8月20日，纵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请副参谋长李静宜介绍豫西情况，会议由谷主任主持。李静宜，栾川人氏，在豫西生活多年，对那里的情形比较熟悉，报告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可能是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报告中也夹杂有一些偏颇的见解。所以，谷主任在他报告结束之后，又做一些补充说明，大意是说，豫西的情况虽然复杂，封建势力和土顽武装盘根错节，十分嚣张，但是，那里的人民群众所受的压迫特别深重。一经发动起来，就会闹它个天翻地覆。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信心百倍地去战胜敌人。

8月21日,谷主任召集南下地方干部开会,部署工作。由太行区党委调拨归谷主任管理的地方干部,此时报到的共191名,有县级干部67人,其余大多是区级干部,还有少数精选来的村支部书记,党、政、群、团干部都有。这近200名干部,有一半是由七分区调出的,都是谷主任的老部属。会前,谷主任已经和所有县级干部谈过话,根据他们各自的工作经历,选出12个小组的正副组长(实际上就是拟建中的县委书记和县长),然后由他们协商,编成12个小组,每组15个人左右,意思是每攻克一个县城,就派一个组,在武装人员的配合下,迅速占领阵地,组成好县区领导班子。这项工作是谷主任亲手抓的,工作做得十分细致,而且速度十分惊人,仅两天时间,就顺利完成编组任务。这个工作队,谷主任指定暂由郭春文领班,随政治部一起行动。这次会议,由郭春文主持,政治部有张彦、刘增钰、王培纯在场。谷主任首先做报告。他说,大家都清楚,我们即将渡过黄河进入中原。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扎根伏牛山,开辟豫西革命根据地,任务是很重的。豫西的情况和太行山老区有的不同,论自然条件,那里要好得多。在平原地带盛产小麦、烟草;在山区盛产桐油、木材,比太行山要富裕一些。可是,那里的封建势力和地方武装力量,却也不能小看。……这就决定了要想在那里站稳脚跟开展工作的艰苦性和复杂性。这一工作,光靠我们在座诸君,看来是不行的。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就必须在军事上压倒敌人,把敌人击垮。

我们这次出征,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根据军委指示,我们将于近期在洛阳、潼关之间横渡黄河,斩断陇海铁路,以豫西为依托,面向平汉线展开。一是寻求战机,大量消灭敌人,打乱敌人的部署,以减轻大别山和西北我军的压力。二是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兵团在新区运动作战,没有巩固的后方,便没有回旋的余地。而且,粮草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兵员的补充,都会有很大的困难,这样,就会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捉襟见肘的境地。中原地肥物美,战略位置关

系全局，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是绝不会轻易放弃的，必然会拼死挣扎，所以，战争必将是十分惨烈的，一城一地，必将是经过反复的争夺，才能稳定下来。应该说，这是一场文武兼备的斗争。没有武打，是不可想象的，武打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其次就是这些保安、土顽的武装。要开创新的根据地，就需要在武打的同时，把地方工作开展起来。这就是文唱，在座的同志就是文唱的主角，你们就是新区的县区领导骨干，你们肩上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具体地说，就是依靠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准确无误地执行党的政策，争取在短期内，把县、区、村三级的党、政、群、团机构建立起来。同时要抓武装力量的建设，在主力部队的支撑下，尽量做到能依靠自己的县区武装，把那些土顽武装干掉，起码也要把那些分散的土顽消灭。工作位置的摆法，应是城乡并重。城市的解放会有反复，在县城被敌占领后，应立即向乡村转移。须知，豫西的地方土顽统治虽然残暴，情况虽然复杂多变，可是那里的人民群众所受的压迫特别深重，一经发动，就会爆发出革命的火花，他们的觉悟也就会迅速提高。切记，一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样，就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你们这 200 人，就是一批火种，撒出去，就会遍地开花。不久，在中原就会燃烧起一场燎原大火。

谷主任讲话后，接着是大会发言。发言的情况甚为热烈，属于询问性质的，谷主任都耐心地一一做了回答和解释。

8 月 21 日凌晨，纵队直属部队开始行动。二十六旅和二十七旅作为先头部队，在秦司令员和黄副司令员率领下，已于午夜提前出发。二十五旅作为后卫，走在直属部队的侧翼。直属部队是一支庞大的队伍，除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警卫营和地方干部工作队外，还有太行山的支前大军、运输队、担架队、七个县的民兵营，一共大约有 8000 人。这支队伍由博爱沿公路向西行进，一路上浩浩荡荡，远远望去，像是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

行军时,为避免敌机骚扰,大半是在夜间和拂晓行动。三天内,经过沁阳、济源县城,于23日到达西承留村附近,做翌日渡河临战前的准备工作。

这次陈谢大军渡河作战,鉴于九纵是一支刚刚组建的新部队,陈司令员出于照顾“小弟弟”的考虑,把九纵派做第四纵队的第二梯队。实际上,我们是跟着“老四哥”渡过黄河的。24日,四纵以强大炮火掩护,强渡黄河成功后,九纵的二十六旅和二十七旅随即跟进,在陇海线北侧分两路推进。当我们抵达狂澜渡口时,已是当日的黄昏。太阳已经隐没在西边的群山背后,天空中飘着一抹红霞,照映得碧山如洗,景色显得分外秀丽。迎面便是滔滔黄水。这些日子正值北方雨季,连日几场大雨,引发山洪,使得河水陡涨。但见浊浪翻滚,一泻千里,真的是声势磅礴,气象万千。啊!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河——黄河,见到她,每个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似乎心里都在喊,我们就要跨过黄河了,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在河对岸起伏的山岭上,已无敌踪,山上山腰和山脚下,被炮火摧毁的成百座碉堡,都冒着残烟,沿河岸的壕沟边上,尘埃被炸得七零八落,到处是被炸断的树枝杂草,零乱的散在地上。这显示出在几个钟头以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激烈厮杀。随处是隆隆炮声,天上是敌机,在盲目的扫射投弹,使得刚刚平静下来的环境,重新增添了不少战时的气氛。

夜幕降临了,我们开始渡河。这里集中的大约有百多艘船,少部分是征集来的,是使用过的旧客货船,容量较小。大部分是近两个月来临时打造的,载重量较大,每艘可载运百十来号人马。船工是黄河上的老艄公,他们都是志愿支援大军渡河的。在四纵强渡时船工有伤亡,可是他们并不在乎,依然是英气勃勃,豪情满怀,表示一定要把大军全部送过河去,而且以后还要负担前后方之间的运输任务,保证渡口畅通无阻,让军队在前方有吃有穿,打大胜仗。

渡河的总指挥是黄、谷二位首长，而具体工作则是由作战处长崔星、供给部胡孝武、杨以山二位部长完成的。渡河的组织工作做得非常细致，渡河时秩序井然。第一批上船的是纵队直属部队。行船时，政治部都坐在一艘船上，谷主任坐在第二排中间，眯着双眼，仿佛在领略渡河时的情趣。天上由敌机投放的照明弹，明明灭灭，灭时眼前是一片黑暗，明时，照着水面的粼粼波光，照着船上一张张兴奋的面孔，船前船后不时有溅起的水柱。飞机的轰鸣声，机关枪的扫射声，炸弹的爆炸声，混合着船头船尾舵工的行船号子，交织成一片不协和却又十分悲壮的伴奏，是那么的刺激而富有诗意。啊，好一幅黄河夜渡图！

船只靠岸后，直属机关清点过人数，便整队南行，依照指定路线，于25日拂晓时分，进入新安县城。与此同时，何参谋长率领的二十五旅，也已由关阳渡过河到达新安以东地区，进驻陇海铁路两侧。供给部部长带领着支前大军，直到中午，才陆陆续续赶到，被分派在城关的附近村庄休息。

我们在新安县城驻扎的时间，大约有十天左右。在这里纵队召开了过河后的第一次党委会，会上认真研究了中央军委和集团军前委的批示并制订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时，在谷景生主任的倡导下，确定了开创豫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方针。正式提出：剿匪反霸，走马点火，群众抄家，清仓济贫，减租分田，放手发动群众，创建以伏牛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口号（与原话是否有出入，因已是53年前的事，记忆或有疏漏，但大致是不会错的）。这次会议，对我纵的工作动向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会后，谷主任向政治部全体干部做了传达。并立即调拨少量部队人员，会同十多名南下的地方干部，以新安县为中心，协助太岳军区建立起太岳军区的第五军分区。这个军分区，在我纵二十六旅的支撑下，向东监控横水，牵制洛阳之敌；向西对潼关方向实行警戒。

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工作，在保卫黄河渡口和配合我纵南下伊洛的作战中，做出积极的贡献。



九纵在豫西收复一个县城后。右一为秦基伟，左二为谷景生。

进入豫西伊始，杂事繁多。在新安驻军期间，政治部曾召开过三次部务会议。第一次，主要是研究布置部队的政治教育，党的建设和民运工作。第二次，讨论的重点是宣传工作。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的恶意歪曲诽谤，国统区的群众对我党我军有过不少误解，所以谷主任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为了安定民心，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在会上，他指令宣传部立即起草文件，要求各师团部队严饬军纪，不得侵犯群众利益，一定要做到秋毫无犯。并应组织所部宣传队伍，除做好行军途中的鼓动工作外，还要在沿途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在纵直机

关驻地周围则指定由任大卫负责，把文工团调动起来，积极投入工作。为了统一口径，这一时期的标语传单内容，都是由主任亲自拟定或审定的。在对外宣传方面，他要吕梁的新华分社做出努力，组织部队多写稿件，把对外的报道搞好，这次会议讨论很热烈，整整用去半天时间。

部队向前推进，捷报频传。战俘也随之增多。根据这一情况和我分管的工作范围，我向主任提出，是否应该发个指示，把敌军工作



谷景生在豫西与潘彦(左)、杨勇(中)合影。

抓一下。他让我写成文字材料,拿到部务会讨论,于是我便起草了一个稿件,洋洋洒洒大约写了有1500多字。

这篇文稿,谷主任看过以后说,写得蛮好。在部务会上,大家也说,这篇材料,文字简练,说理明,写得不错。只有个别同志认为,道理是说清楚了,有很大的说服力,但是理论多了一些,具体办法却少了一些,意思是需要做些补充。其实我也有同感。这项工作对我来说,也是老兵遇到了新问题,自己是一点经验也没有,1000多字大都是抄来的,纯粹是纸上谈兵,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加以补充润色,使之更完美一些。但谷主任却说,实践出真知么,既然道理、工作方向和工作方法都已经讲清楚了,我相信,我们师团营连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其中藏龙卧虎,大有人在,他们是会在工作中积累经验,把事情办好的。我看就这样发下去吧。

9月初,我们离开新安南下洛河,新安城旋即又被敌占领,以后经过两三次反复争夺,这里才安定下来。

二十七旅攻克嵩县城,黄镇政委和秦、黄司令员一起随部队行动,纵队后方由何参谋长和谷主任率领,游动于洛宁栾川卢氏间,对三十八军在组建豫西一分区的工作上,也曾做过不少帮助。9月下旬,供给部长胡孝武向谷主任反应,部队进入新区后,人员众多,流动性又大,目前已逐渐远离后方,部队的补给已变得十分困难。在攻克城镇后所有粮食,均已救济贫苦农民,以至近期部队的给养形势已变得越发紧张。请组织考虑,是否需要开仓济贫的政策做一些修正。谷主任听后,认为所言有理,便商得黄政委同意,立即电令各部废止开仓济贫的口号,并提出凡是缴获的仓库,未经政治部门和供给部门认可,不得动用。

10月初,三分区建立,谷主任让我去担任政治部主任,参加地委常委工作,我便离开了纵队政治部。

鸣皋会议,三分区地委书记史向生曾经参与,在谷主任倡议下,

会议明确提出：依靠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剿匪反霸，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减租清债，反奸复仇，平分土地一锅煮，建立地方党政机构，发展群众武装，创建伏牛山根据地的响亮口号。

会后，纵队党委决定筹建第五军分区，由谷主任亲手策划，并把敌工部长张彦派出担任副政委。这样敌工部只留下一个科长、两个干事。

10月下旬，我到政治部向谷主任汇报工作，因为当时分区工作，包括党政军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纵队的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电台也只对纵队联系。在谈完工作后，我向谷主任反映，在部队一些干部中，其中有的还是相当负责的同志，对他有一些说法。他们说，我们的谷主任，简直变成了地方上的政治部主任了，今天调一个排，明天调一个连，今天要调张三，明天要调李四，几乎把部队快要抽空了。其实，这些同志的反映，也不无道理，部队在新区作战，减员大，补充不易，而战斗又是那么频繁残酷，作为一个指挥员，也自有他们的苦衷。我说完了，谷主任只是轻轻一笑，说：老农民，简直是些老农民！意思是，这些人目光短浅，只见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只考虑局部利益，缺乏全局观点。小道理只能服从大道理，局部也只能服从全局。就这样在短短的三四个月之内，纵队就在豫西建立起三个军分区，在中原站稳了脚跟。

事实胜于雄辩，大道理其实就是硬道理，理解万岁。

三

1948年3月下旬，经过近半年的锐意经营，分区的各项建设已初具规模。各县区村的党政群团机构，在逐步完善。组建起的洛宁、栾川、嵩县、伊阳、伊川、宜阳、伊鲁嵩七个县独立团已能独立执行各项任务。分区范围内的残余顽匪也被基本肃清，工农业生产也有发

展。形势随着季节的转换,也由寒变暖,由萧索的严冬变成了生意盎然的春天。这时分区接到纵队党委电令,内容是任命甘德洲为三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继联为三分区参谋长,刘增钰为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长,望速到职视事。署名是秦何谷。洛阳在3月初被我军攻克后,敌援军从东西两面进行夹击,我军主力转移,洛阳城旋又落入敌手。

4月7日晨,洛阳守敌弃城逃窜,被九纵围歼于洛阳城东郊。8日,我进城去见谷主任,一是向他解释一时不能归队的原因,二是想从缴获物资中,要点武器。解放洛阳之日,他被任命为市委书记,兼城防部队政委,已进入原市政府大楼办公。这次我没有白来,他拨给我50支汉阳造,这些枪大都是主力部队替换下来的旧枪械,但是对我们这些土八路来说,也是宝贝疙瘩。还拨给我一部分弹药。我于9日返回白马寺驻地。

首任洛阳市委书记的谷主任夜以继日,大刀阔斧,雷厉风行,铺开摊子,打起锣鼓,把工作全面展开后,集团军前委派刘有光来接替他的工作,他便又回到纵队。他在洛阳的大量工作给以后洛阳的建设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4月底,我带着一部分武器,进驻偃师以南的回郭镇,这个镇子盛产卷烟,有成万家烟场,虽是大小不等,手工操作,产量却也惊人,因此商业也挺火。我去回郭镇,是奉命筹措经费,收购布匹。这里旧政权的人员已经涣散,新的政权机构还未建立,我便抽调人员临时组建了一个管理小组,依靠旧商会去进行工作。正好,纵队直属机关也驻在这里,显得市面繁荣,人欢马叫,社会秩序也井然有序。在纵队见到了刚从黄河北岸来的谷主任夫人小范同志,和她在一起的还有黄以仁的夫人。她们是第一批跨河南下的妇女干部,勇气可嘉。其余太行山的婆姨们,是淮海战役结束后,在12月底才进入中原的。听她们谈起太行山这半年来的变化,十分令人神往。君自故乡来,应

知故乡事。谈起故乡事，感到倍感亲切。谷主任要我很快归队。这时我已接到指示，洛阳县即将撤销并入洛阳市，地委让我立即结束工作，回洛阳交接工作。我答应谷主任，事情办完，立即打道归队。

10月19日下午，纵队直属机关随部队向郑州开进，经三昼夜急行军，于22日凌晨，到达郑州以西的石佛，我和敌工部人员，奉命停下来，准备在这里接收战俘。这时郑州守敌发现我军兵临城下，在我军强大压力下，惊恐万状，弃城向北逃窜，经我二十六旅二十七旅分南北两路夹击，被围于老鸦陈固城地区。下午三时我军向敌发起总攻，经过三个小时激战，将敌全部歼灭。邙山之敌闻其主力被歼，曾有一部经铁路北逃，只留1000余人固守。24日，要塞被我二十七旅攻破，守敌全部被歼。至此黄河两岸的交通要隘，被我控制，郑州宣告解放。是役也，共歼灭敌人1.4万余，被俘人员近万名。从22日战斗打响后，便不断有战俘送来，除士兵大部经教育后补入部队外，至24日止，我们收纳的已近千人。这么多人，要吃要住，还有伤病患者要安顿治疗，直搞得大家手忙脚乱，审查工作进展缓慢。战俘中有将校级军官，绥靖公署的特工，还有警官党棍、还乡团土顽骨干，还有一大堆家属，成分异常复杂。光靠我们这点人手，实在无法在短期内完成审理任务，于是我于25日下午进城求援。在县前街遇到纵队供给部副部长杨以山，见他双目红肿眉头双锁。纵队供给部驻嵩县时，为部队筹措给养制作军服，我们经常打交道。见他愁容满面在街头彷徨，便问他，郑州刚解放，那么多仓库，那么多物资，你不去忙乎，为什么跑到街上乘凉来了？他说，他已被撤职查办，和工作不沾边了。说着说着，眼里满含泪水，只是强忍着没有流出来。我问是怎么回事？他说真是一言难尽。原来入城后城防部队由二十六旅担任，他在检查缴获物资时，见车库里有几辆比较新一点的小轿车，溜光闪亮，非常漂亮。他回想起在宝丰会议时，见到刘邓首长刚从大别山出来，使用的吉普车又破又旧，于是脑子一动，就调拨出两辆，打算送给

刘、邓首长,叫他们也改善一下装备,也算是我们纵队的一点心意么。谁知有个地方干部叫巩培基,他们知道了之后,大为恼火。昨天上午邓政委来郑州视察,他就告了一状,说九纵供给部副部长杨以山顶风违纪,在仓库抢去两部新小轿车。邓政委听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撤销了他的职务。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向纵队首长们反映一下,以求得谅解。他说,他给纵队脸上摸了黑,丢了人,他已是戴罪之身,实在没有脸去见他们。我听过后,也为他抱不平。

谷主任这时已被任命为郑州市委书记。我向他汇报工作并申明来意后,他便让秘书打电话,抽调二十六旅保卫科长孟维良、二十七旅敌工科贾增暄各带三名干事速赴石佛帮助敌工部进行工作。我们事情办完,就向他谈起杨以山的问题。谷主任说,杨以山的事,他听说过,只是不甚了解详情。既然所反映的事实有出入,趁邓政委还没有离开郑州,给他解释一下也好。于是摇通了邓政委的电话,向邓政委请示过几个工作问题后,便谈起杨以山事件的经过。邓政委讲了些什么,我听不大清楚,只听说过一句:可见兼听则明么。随后还讲了一阵子,可能是在做工作指示。打完电话,谷主任说邓政委已经了解事件真相,认为杨以山已不适合再呆在九纵,要他速去野战军总部报到听候处理。月底,接到命令,杨以山已被任命为中原野战军供给部财务部长。

这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学习到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首先是对邓政委,他自1938年初出任师的政委以来,一向以雷厉风行取下严格而著称,平时不苟言笑,全师上下对他都存有一种敬畏心理,就连陈司令员,在他面前也显得那么循规蹈矩。想不到竟然也能坐下来倾听下面的不同意见,是那么的通情达理,从善如流。其次是对谷主任,尽管他来时,对下边也是批评多,鼓励少,有时甚至会达到近似吹毛求疵的程度。但是从这件事上看,他对下边的干部却是非常关注与爱护的。理之所在,他敢于迎面向上坦陈自己的看法。在

古代这就是一种犯颜直谏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虽说时代不同了，谷主任本身也具有一些特定的条件。如他是大学生出身，在地方做负责干部多年，调来部队的时间不长，当时又是郑州市委书记，说起话来，自然也有一定分量，但毕竟也是担着风险的，有这样的胆识与气魄也是令人敬佩的。

11月6日，淮海战役在碾庄打响，九纵奉命东移。15日，二十七旅八〇团协助三纵攻克宿县城。九纵当即在宿县城南展开，阻击北上的刘汝明李延年兵团。任桥一战，敌溃败南逃。后奉命转移，到达四纵左翼进入阵地。时黄维兵团经四纵阻击已后退守浍河南岸。26日夜，九纵主力在友邻部队支援下，强渡浍河，激战终夜，将敌部署打乱，敌人损失惨重，被我四面紧逼，北进无望便向东西方向突围，又被我兄弟部队予以迎头痛击。看到突围已不可能，遂龟缩于双堆集地区，构筑工事固守待援。经过近十天的消耗，敌人阵地逐渐收缩。12月6日，总前委下达发动总攻令，经过九个日日夜夜的苦战，终于在15日午夜，攻克双堆集，将敌人全部歼灭。

我曾经随谷主任和二十六旅的首长到过那里，只见到处是欢腾的人群。战士们在含着眼泪高呼，谷主任说那是胜利的眼泪，是喜悦的眼泪，让他流吧。缴获的照明弹，不断地向天空发射，照得一片通明。黄维的最后防线，原来是用汽车构筑成的，远远看去像是一条长蛇，汽车一辆接着一辆，上面和下面都堆满黄土。榴弹炮阵地也是用汽车围着，远远看去像一个个鸡窝。黄维的地下指挥所还有发电和照明设备。“野战医院”则是一片露天的荒地，成千的伤兵，成排的躺在那里，呻吟声不绝于耳。弹指间50多个年头过去了，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此次战役，九纵打得非常出色，受到了总前委首长的表扬。

此次战役，九纵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其实，在政治工作上也是成功的。

人的行动是由思想支配的，做思想工作，说穿了，就是做人的工

作。军队是为完成一项政治任务，由人组建起来的武装集团。因此，向这些执行政治任务的人做思想工作，通常就叫做政治思想工作。人们常说的政治挂帅，并不是指要什么政治要员、政治主任、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这些人在挂帅，其含义，就是政治任务高于一切，政治任务统帅一切。一个人，能够大公无私和为完成政治任务而奋斗不息，他在思想上就是政治挂帅，一个人如此，一个单位也是如此。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挂帅的机关呢？有的，那就是党的委员会。党委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其实也并不是政治工作人员的专利，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每个人都要做的，政治机关只能起策划和引导作用。一个指挥员，在做战前的动员报告，他要分析敌情，指出对我方的有利条件，鼓舞斗志，去争取胜利，他就是在做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的范畴，当然还有干部的调配奖惩、保安纪检、法制统战等一系列组织工作，但最主要的则是教育和思想工作。单就教育改造解放战士的工作来说，就是一个系列工程。二十七旅八〇团王学智等三个战士，是刚刚在攻克宿县城时解放过来的，在强渡浍河作战中，夜间和部队失去联系，他们在浍河南岸遍布敌人的村寨间，打了三天游击，归队时还带回一个伤员六个俘虏兵。本来是一件潜移默化的工作，经营连同志的艰苦工作，竟能立竿见影，在短短的十天之内，使这些人脱胎换骨，由国民党士兵变为解放军的杰出战斗员，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发动总攻后，战斗进入白热化，在进攻张围子的战斗中，二十六旅七十三团三连，经过激烈拼搏，只剩下政治指导员周福祺和副连长，还有15个战士。周福祺把人分成两个组，由他和副连长各带一个组，分头进行冲刺，终于把敌人的最后一个防御集团工事攻破。没有人，就用被俘的和投诚的敌军士兵补充，没有替换的军服，就用红纸剪个五角星贴在帽子上，就成了解放军战士。有些战士牺牲了，甭说连长指导员，就是班排长也叫不出他们的姓名。就这样，他们边打边补，由张围子打

到杨四麻子直捣黄维的指挥所和临时机场的所在地——小马庄。这个连队在郑州出发时，是一个 150 多人的连队，直到他们在双堆集欢呼胜利，依然是一个 150 多人的连队，一个像生龙活虎一样的连队。只是几乎全都是新的面孔。他们的指导员周福祺，作为英雄指导员的代表，和战斗英雄刘子林，1950 年曾参加过军委召开的全军英模代表会议，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51 年秋，周福祺还随团访问过东欧，去过苏联、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在漫长的旅途中，他每天记日记，一有时间就埋头学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政治工作是一项不显山不露水的工作，但是它却无所不在。无论行军宿营冲锋陷阵，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都会显示它的作用。一个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的单位，是不会有作为的。

九纵的政治思想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当然这绝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能够办到的。上有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和英明决策。中有纵队党委一班人的和衷共济，指导有方。下有纵队全体指战员、政工人员、后勤人员和所有各部门各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的群策群力，共同奋斗。事实证明，只有上下一心，同心协力，才能众志成城，才能铸造出这样的辉煌。谷景生同志作为纵队政治部的主任，这其中，当然也有他的一份功绩，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黄维兵团被围后，杜聿明亲率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兼程赴援，被华东野战军围困于陈官庄李石林地区。黄维兵团被歼后，九纵作为预备部队，奉命集结于宿县地区，一方面进行总结，召开庆功会，一方面进行休整，做战斗准备。纵队直属机关，于 12 月 24 日进入宿县城。25 日，中原野战军决定，组织六个补训旅赴石家庄附近接收新兵。指定四纵组成补训五旅，九纵组成补训六旅，务于新年前到达朱集待命。纵队接到指示后，立即开始行动，任命二十六旅副旅长陈皓为补训六旅旅长，敌工部长刘增钰为旅政治委员。由于动作快速，四

天之内就组建完毕。于是，陈皓和我带着这个包括旅直机关和下属团营连排各级机构的接兵架子，于31日赶到朱集镇（现在的商丘市）。补训旅的工作是归参谋长李达直接领导的，从此，我们便离开了纵队建制。

我们接收的是华北军区第五补训师的全体新兵，共5600人。接兵后，集中在临清进行训练。1949年4月18日奉命南下，由桑梓店乘车直达蚌埠。我们是在安庆渡河的，当我们到达江南临川时，十五军已经攻克福建南平。根据陈赓司令员的指示，补训五旅、六旅的新兵和部分基层干部，全部移交三、五兵团。交接完毕后，我们在原地进行工作总结，召开庆功会。之后，兵团下令撤销五、六旅建制，干部由兵团统一调配。陈皓被任命为十五军四十四师副师长，刘增钰被任命为二野军政大学第四分校政治部主任。陈皓仍回到原来的部队，我带着政治部供应处卫生处的一小部分干部，到达南昌附近的莲塘，并入第四兵团随营学校，建成军政大学第四分校。

四分校作为兵团的直属部队，一直是随兵团直属机关行动的。我们经南县吉安到达赣州。新中国的建立，我们就是在这里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随后，过梅关到广州，在溯西江而上，经南宁百色册亨安龙兴义罗平，于1950年春进入昆明，驻进翠湖边上的云南讲武堂。在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又见到了谷主任，他正和兼省军区陈司令员、兵团的几个领导干部和朱家璧等人，坐在主席台上。参加会议的有省委省政府和昆明市的局处级以上干部，还有兵团驻昆明部队的师以上干部。会议开始，首先由省委书记宋任穷向到会人员介绍了谷景生同志。他说：谷景生同志，是四兵团十五军的政治委员，西南局决定由他出任我们昆明市的第一任市委书记。景生同志在地方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虽曾在担任地委书记期间，兼管过军分区的工作，但正式转调到部队则是在1947年7月，陈谢大军渡河作战之前。过河后，豫西工作进展迅速，无论是地方工作和地

方的武装建设,都有长足发展。应该说,陈谢大军在创建伏牛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中原战场的事业中,谷景生同志功不可没。他一方面要抓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还要抓地方工作。在豫西起码有三个地区及20多个县的党政群团机构和地方武装都是经他组建起来的。他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小平同志在西南局会议,特别强调说:“谷景生同志在(中原战场创建)豫西根据地的工作,事实证明,当时他的工作方向和所推行的路线是正确的。”九纵,就是现在的十五军,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据陈司令员说,十五军在洛阳、郑州、淮海战役中,打得非常好,已锻炼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胜利之师。说明,景生同志在部队的工作也是出色的。去年洛阳解放后,他曾任洛阳市的市委书记。郑州解放后,他又任郑州市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可见,他对城市工作也并不陌生,有相当经验。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之下,经过全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努力,我们的昆明市,必将会迅速改变面貌,成为一个百业兴旺、市容整洁、社会秩序安定、朝气蓬勃的城市。

不久,我和四〇师师长刘丰,带着一个师的架子,调到空军工作,便离开了昆明。再见到谷主任时,已是1965年的寒冬,正是吃涮羊肉的季节。北京城南街头,行人稀疏,风沙凄迷。

2000年7月18日

回忆九纵时期的谷景生同志

十五军老团长 李中顺

落笔伊始，先吟一绝：

太行子弟结长缨，逐鹿中原话景生。

文武全才书郑洛，建功九纵享威名。

抗战初期，我在山西陵川县牺盟分会工作时，就曾听到过关于谷景生的事情，知道他是一二九运动的一位领导者。我与他那时虽未能谋面，但他和薄一波、杨献珍等一样，是我心目中敬仰的人物。所以后来在九纵、十五军工作的过程中，加之他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的风度，特别是他和军政机关对我婚姻、恋爱问题的关怀，派员千里访寻我病失联系的女友归队，使我感激之至，等等。很愿意同他讨亲近。记得1954年，他直接听取我关于炮训总队工作情况的汇报前“拉家常”时，我就很随便地提起：

“谷政委：您可是我的老领导了。您在山西牺盟会时，同薄一波一样，都是我心目中所仰慕的人物啊！”

“你搞过牺盟工作？在哪里？”

我在陵川牺盟分会工作，那时我们县“反师斗争”得到了牺盟长治中心区杨献珍、五专署戎伍胜的大力支持，斗争终于取得了大胜利。之后我在牺盟中心区训练班，还听过杨献珍关于《社会发展史》的讲课哩！

“你怎么到部队的？”

十二月政变后，随着太南撤军，我便到抗大学习了一期。谁知，

我们同往并在同队学习的同志不少，毕业后却孤零零留下我一个人工作。当干事、当指导员，最后调来调去，陵川独立营、太行八分区、太行四十三团，这么转来转去，就转到十五军来了……

从抗战初期的牺盟会，到九年之后，不想未曾谋面的谷景生，竟是第九纵正式成立与誓师南征动员大会的主持者，心头的高兴分外增色。

1948年8月15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全体指战员于博爱县王卜昌冒大雨集合，宣告和庆祝第九纵队正式成立并誓师出征，



1948年，谷景生在九纵党代会上做报告。

南渡黄河。会上宣布了上级关于成立第九纵队的决定,介绍宣布了纵队首长与纵队机关的领导同志。他们是: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大会进行中,虽然大雨倾泻,但会场秩序井然,1.8万人在露天里无一人打伞或着雨衣,情绪昂扬。太行行署向大会赠送的巨幅红旗矗立在主席台上,旗上缀着金光闪闪的14个大字“太行子弟结长缨,渡河南征缚苍龙”。这14个大字既标志着太行600万人民对子弟兵——第九纵队的重托和期望,同时也深刻地表达了我第九纵队全体指战员的心情和誓愿。从今天起,我所在的太行独二旅第四十三团第二营,就成为九纵第二十六旅第七十六团第二营了。

其实,14个大字所表达的心情与誓愿,是经过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把战争引向“蒋管区”这一战略上的巨大转折,必然给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带来艰巨的转折。因黄镇政委很快就调离,作为纵队政治部主任,他不仅肩负着机关本身组建与开辟豫西根据地一系列的组、思想建设的任务,同时更要抓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完成艰巨的思想转折任务。回顾起来,九纵从成立到出色完成一系列的战斗队和工作队任务,都同首先搞好此战略转折过程中政治思想工作是分不开的。应该说,这些同谷景生主任出色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分不开的。在纵队党委、政治机关的领导下,把部队准备参加战略反攻、渡河南征的思想教育工作,同总结评比、订立新的杀敌立功计划结合进行。以我营为例,在评功比模中就突出宣扬功臣模范的先进思想、勇敢精神和他们积极准备参加战略反攻、渡河南征、再立新功的立功计划和思想行动。这种思想发动工作,形式多种多样,比较成功。那时,各个连队都是练武之声震耳叫,快乐歌声入云霄。而在这些思想教育和动员工作中,根据上级政治机关指示,我们主要是解决了三大问题:

1. 认识升编为野战军纵队的重大意义和光荣。太行南北各区

子弟兵,从此结为一个集中的、统一而正规的野战军整体,渡河南征(即大旗所书:太行子弟结长纓,渡河南征缚苍龙),这是为太行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太行区 600 万人民杀敌立功和争光的大好时机,大好行动!必将获得太行山区人民热烈的称赞和支持。同时,也必将获得河南新区人民的殷切盼望和热烈欢迎!

2. 认识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重大意义。只有把战争打到国民党统治区,才能解救那里人民的苦难,把“蒋管区”变成解放区,同时也减轻老解放区人民对战争的沉重负担。新老解放区人民一致支援解放军作战,多打胜仗。

3. 自古以来,中原乃兵家必争之地。要认识渡河南征、实施战略反攻,大踏步挺进中原,就可以加速粉碎蒋介石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从根本上改变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使蒋军由战略进攻被迫转为战略防御。而我们则可完全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由豫北这里的局部反攻转向全面的战略反攻,加速歼灭蒋军和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进程。

正是以上三大问题在思想认识上的解决,更加调动了部队思想的各种积极因素,使之更加引向正确的方向,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使各种各样的疑虑、矛盾问题和消极因素得到解决,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当然,也还有一些具体的、实际的问题,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具体解决。总之,当时部队的情绪非常高涨。这如前述集中地表现在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的成立与誓师南征的大会上。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转变,我军既是战斗队,同时又是工作队;既要辗转作战歼敌,又要开辟建设新的根据地。所以在太行行署和 600 万人民对子弟兵的关爱下,集中了百多名区以上的领导干部加入参战支前行列;参战民兵、民工 7000 多人。在纵队党委领导下,由谷景生主任直接分管和组织实施的。

那么,慷慨激昂、群情振奋的誓师南征大会之后,渡河南征与开辟豫西根据地的实施与进展情况又如何呢?对此,在纪念郑州解放45周年时,谷景生曾有所概括。概言之:

九纵南渡黄河以后,在配合四纵于陇海路西段歼敌战斗中,9月10日,二十六旅于横新公路重创敌十五师,歼敌一个团大部,首传佳音。至15日,连克宜阳、赵堡、白杨、田湖、鸣皋、嵩县等城镇,歼敌2000余,控制地方约1300多平方公里。其后,以这些地区为中心建立了第三军分区。10月29日,九纵挥师东向,参加伏牛山东麓作战。11月1日至5日,连克宝丰、鲁山、南召、方城、叶县五座县城,歼敌1300多人。至1948年初,解放了宝丰、郟县、襄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面积8500平方公里,建立了豫西第五军分区。为策应刘邓主力在大别山地区作战,12月1日,纵队主力奉令东出平汉线,破袭许昌以南、西平以北铁路60公里。23日至26日,配合华野和四纵主力于西平、遂平之间地区歼灭敌军整编第三师。此役,九纵以政治攻势争取了一个团投降,共歼敌2000名。12月27日,九纵配合四纵及华野主力乘胜沿平汉线南下,进至确山、信阳之间。至此,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会师中原,江、淮、河、汉任我驰骋,敌人的重要屯兵基地被我掌握,战略上已陷入被动地位,这就为尔后大量歼灭蒋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48年3月8日至15日,九纵配合华野第三、八纵队及中野四纵解放古都洛阳。18日敌再占洛阳,九纵奉命与四纵协同攻取之。4月5日我军再克洛阳。谷景生担任洛阳市委首任书记,率排以上干部200余人,开展洛阳城市工作。5月2日,中野主力发起宛西(南阳)战役,九纵奉命配合。进至登封、密县、荥阳一带山地待机,运用歼灭战手段圆满完成了牵制任务。历时10天,歼敌4600余人,缴获大炮28门,轻重机枪130余挺,有力保障了宛西战役的胜利。其后,我以登封、密县、荥阳为中心,建立了豫西第四军分区。这样,豫西敌军主力大部被歼,广大地区获得解放,成立

了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了地方武装。9月中旬，华野山东兵团展开济南战役，中原之敌孙元良兵团奉命东调，郑州敌人守备空虚，孤立无援。中野首长决心以一、三、四、九纵队乘机夺取郑州。按照中野首长部署，九纵于10月22日发起全面突击，经过10小时激战，将敌聚歼于薛岗、老鸦陈地区。此役，我仅以伤亡220人的代价，全歼敌1.1万余人，俘敌将级军官80余名，与兄弟部队协同解放了中原战略城市郑州。九纵从成立到郑州战役，兵不卸甲，马不下鞍，转战一年有余。行程7000多里，历经大小战斗293次，歼敌4.5万余人，缴获各种大炮193门，枪支1.8万余支，炮弹1.1万余发，子弹236万余发。为进行淮海战役准备了条件，也是淮海战役的序幕。在兄弟部队协同下，除光复郑州外，解放县城36座，建立了拥有500万人口，3.3万平方公里的豫西三、四、五军分区。协助地方建立县、区级政府50多个，基层政权1630个，从而建立了以伏牛山为中心的巩固的根据地，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准备了前进基地和可靠后方。

郑州地处中原，是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交叉点，经济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郑州的解放，对于全国战局，特别是中原战局极为有利，具有重大意义。同时，郑州又是中野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由农村转入城市是一个新的课题，摸索城市工作经验，为尔后解放全中国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正是在这样新的条件、新的情况、新的意义下和新的需要时，谷景生担任了中共郑州市委第一任书记。

红马纪念章

时任九纵队作战处长 崔星



1948年8月22日,九纵在河南禹县召开建军一周年纪念大会,谷景生主任给排以上干部颁发“艰苦顽强”红马纪念章。

1948年8月22日,太行九纵(十五军)在河南禹县钧台中学召开建军一周年纪念大会。全纵排以上干部参加。会议原定23日上午开始。由于22日上午突然有一架敌机,在禹县转了几圈,投弹七枚。为防敌破坏,紧急改于22日下午18点开始。

会议规模大而隆重。首先是工兵营长柴学文施放他发明的“传单炮”表演。他用迫击炮底火把炮弹一声巨响送上蓝天。五彩传单四处飞扬,引起全体同志热烈鼓掌欢呼,争抢传单,会场情绪为之一震。

大会由何正文参谋长主持。第一项是鸣炮开会,三声炸药炮巨响震天动地;第二项唱国际歌,雄壮有力;第三项颁发建军纪念章,谷景生主任致辞;第四项秦基伟司令做建军南征一年基本总结和会后任务的报告。

纪念章是圆形白底红马狂奔,图案设计朴素大方,制作工艺十分精美,使人看了就感到无比亲切,豪气冲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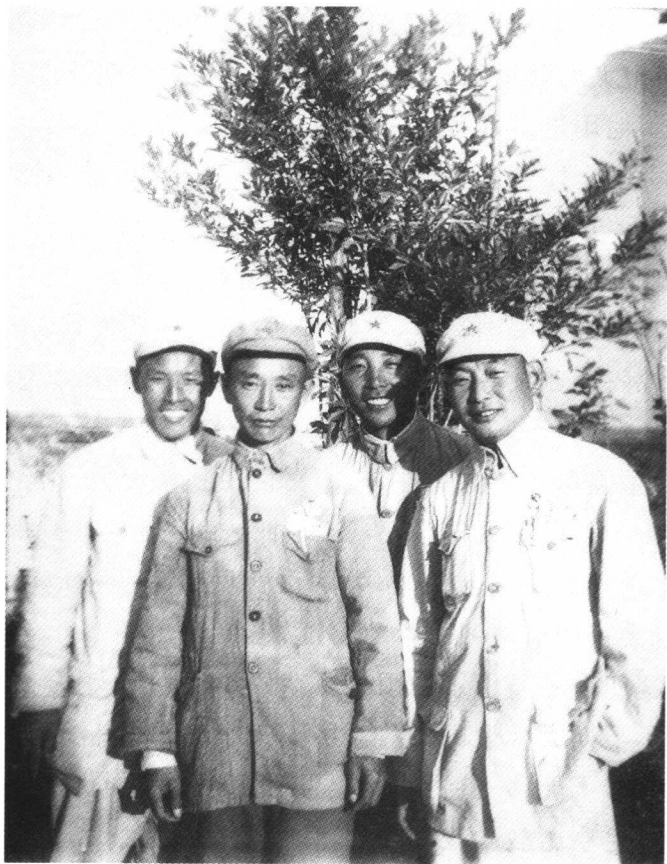
谷景生用言简意深、铿锵有力的语言做了说明。他说这枚纪念章上雕镌着光芒四射的四个字“艰苦顽强”。

他说,这四个字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光辉历程;显示了斯大林说的,我们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显示了中国人民“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优秀传统。

他又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坚持伟大革命理想。我们必须坚定这个革命理想,经常清醒地看到什么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什么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因为我们是为人民的解放而战,人民是拥护我们的,这才是最基本的,是不可战胜的。一切反动派,一切艰难困苦都是貌似强大,其实都是暂时的,没有什么力量的。

这艰苦顽强精神,在我们今天特别需要。我们要消灭蒋介石,还必须经过艰苦顽强的斗争,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英明战略方针才能实现。总之,在作战上、政治工作上、个人思想意识锻炼上,都需要

艰苦顽强精神。这就是纵队和纵委选“艰苦顽强”四个字赠给每个干部，作为每个同志修养标准的依据。希望大家时刻警惕，勉力实现。



1948年在郑州。崔星(后左一)、秦基伟(后右)、潘彦(前左)、谷景生(前右)合影。

的确，这四个字是全军同志永志不忘的座右铭。每个人都十分珍爱这生平第一枚纪念章，更把“艰苦顽强”四个字深深地印在了心里。

我每当遇到困难，想起这四个字就心明眼亮，增添了战胜困难的

勇气；每当获得成功和立功受奖，就想到前头是更艰巨、繁重的任务。在战争时期想的是舍生忘死，争取民族解放。和平时期更想的是舍己救人，谋求祖国富强。

这枚光彩夺目的纪念章，伴随我走了大半生。历经了鏖战郑州、血战淮海、突破长江、千里追击、进军两广、围歼白匪。继而马不停蹄出国作战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无一不蕴涵着“艰苦顽强”的奋斗精神。

当将要谢世的时候，我身边别无他物，唯一能留给子孙的就是这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遗产了。

郑州“第一人”

《城市早报》记者 韩景玮

1948年10月24日，郑州解放的第二天，35岁的谷景生就英姿飒爽地从硝烟未尽的战火中走进郑州，成为郑州市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兼郑洛警备区司令部政治委员。

“郑州战役打得很顺利，原准备一、三、四、九4个纵队合围，没想到正如毛泽东预料的那样，敌人弃城而逃。结果，九纵在城北一举歼敌1.1万余名，俘敌高级军官80余名。郑州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郑州拿不下，淮海战役就没法展开。”

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主任的谷景生忆起当年笑得十分惬意。

“我当市委书记，就在机关食堂吃大锅饭，穿的就是照片上那个棉布衣。哪里有汽车？近路徒步，远路骑马。”说这番话时，谷老正好80岁，那是1993年10月23日，郑州解放45周年时他应邀来郑的。当时这位豪爽的老市委书记，重返郑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了他工作过的老市委办公室——如今在管城区区委院内仍保存着的一间平房。今天，那间平房在周围诸多的高楼中，已显得有些破旧。谷老说，在那里，留有許多他难忘的记忆。

随后，谷老又在街上转了一圈，看过二七广场、绿城广场后，他开玩笑地说：“我们那时是小天小地，不到20万人的城市，现在大了……”他又提高了嗓门：“大大进步了，大大进步了！说今非昔比形容也不够味，完全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时至今日,郑州的一些老干部回忆起谷景生仍是思绪万千:“没猜错的话,谷老今年应该是 86 岁了,退休后,他很少和外界联系,我们很是想念他。”



准备解放郑州时谷景生与战友合影。

后左:秦基伟(九纵司令员)、右:张蕴玉;前左:谷景生(政治部主任)、右:桑临春。

谷景生,生于 1913 年,1948 年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郑洛警备区政委。1949 年任昆明市委书记,1950 年至 1954 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五军政委。1954 年至 1957 年,任军委防空军副政委兼政治

部主任。1978年12月,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并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1980年12月至1982年12月,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等职。

原载1999年9月17日《城市早报》

怀念谷景生^{*}

原国防部五院院长 钱学森

在中国导弹事业创建初期,和谷景生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他是一个好同志,直率、坦诚。谷景生为新中国的导弹事业做了很多工作,他是一位令人景仰的好同志。

^{*} 本文为电话记录,题目为编者所加。

忆谷景生同志

原国防部五院副院长 李明实

谷老是航天事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国防部五院政委时，曾兼任一院书记。今老人仙逝，不胜悲痛，清明之际，谨献心香一瓣。

披荆斩棘创业艰，
事业开拓君领先。
一生身心献国家，
含笑骑鹤看飞天。

回忆谷景生政委 在国防部五院初创时期的几件事

原航天二院党委书记 程荣之

原昆明出版社新闻局局长 李登瀛

1957年3月,中央决定军委防空军和空军合并。时任防空军副政委的谷景生,调任新组建的国防部五院任政委。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到原空军政治部各部门,告诉大家他要到五院工作,并简单地讲了五院工作性质和任务,同时希望政治部各部门能有些同志随他到五院政治部工作。当时报名的同志很多,最后组织上确定十几个同志随谷政委一同到五院。

(一)

到五院后,我们才知道五院完全处在初创时期,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办公和宿舍都在几个还没有完全建成,隶属空、海军的三个疗养院。全院人员仅有100多名知识分子和十几位老专家教授。生活办公条件都极其简陋,这和五院所要从事的崇高任务是极不相称的,百业待兴。

当时作为五院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谷景生政委,筹建任务是极其繁重而艰巨的。导弹研究任务方向的确定,研究机构的设置和各类研制人员的调入,研制基地的选定筹建和开工建设,各项规章制度的

拟订和贯彻执行等等，都倾注着谷景生政委的辛勤劳动，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从谷景生政委到五院工作后调到总政工作也仅有一二年的时间，新建的国防部五院，在国防科委聂荣臻元帅的亲自领导和关怀下，在五院党委和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五院导弹研制工作的框架和科研生产秩序已基本形成，为尔后导弹研制任务的完成打下了良好基础。“创业难”这是一句老话，我想凡是亲身参与五院初期创建的同志，都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谷景生政委对中国近几十年来导弹事业的发展及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也会引以为荣的。

(二)

谷政委到五院工作后，直接领导和亲自掌握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五院的反右派斗争。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开展反右派斗争，这是一场十分严肃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特别是五院正处在初创时期。这场斗争掌握的好坏，对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老专家开展导弹的研制任务，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

五院当时反右派斗争的形势是两头冷中间热闹。所谓两头冷就是开始的时候，比较冷冷清清，好象是和我们无关的事，后来地方上高等院校科研单位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五院也深受其影响，大鸣大放大字报铺天盖地，连谷政委的办公室宿舍的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谷政委多次召开专家座谈会，欢迎提出意见帮助党整风。大字报、座谈会的内容和高等院校都差不多。五院还有另外的特点，即导弹研制要不要归军队领导，军队能否领导等。记得当时有位带中尉军衔的助理员参加某研究室听取鸣放被轰出会场的惊人事例。按当时鸣放出来的言论，若采取和许多单位相同的做法，抓几个右派分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所谓另一头冷，就是在组织处理的阶段非常冷静。在整个五院几十位高级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

的,在100多名青年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名被定性为右派的(当然也是错误的)。就是这位同志是我们奉命派车送到火车站去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的,和他分别时还说了些安慰鼓励希望的话。事过20多年之后,这位同志经多方打听方知我仍在航天部二院工作,并到家看望,旧友相逢感触很深。他告诉我他在北大荒劳动的情况没有辜负五院对他的期望和要求,是第一个摘掉右派帽子的。并很快就回南京某科研单位工作,家庭生活都很美满等等。我们举这个例子说明,当时五院虽然把这个同志定为右派但仍然把他看作是同志。并满腔热情地希望他回到革命的队伍中来。总之,1957年五院的反右派斗争,在五院党委和谷景生直接领导下,反右派的斗争发展是最正常的,健康的,基本上没有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迄今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在回顾这段历史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深深地感到谷景生政委是具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和斗争经验。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在导弹研制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很高觉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全国性的“左”的错误思潮的侵袭下,特别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谷景生政委几十年的生活伴侣,亲密的同志、战友,爱人范承秀也是在那次运动中蒙受了不白之冤。谷景生政委仍能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顶住压力,忍受内心痛苦。不见风使舵、左右摇摆、胆识过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十分敬佩和需要认真学习的。

(三)

谷景生政委在五院初创时期,把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五院研制导弹的实际相结合,或者说五院的各方面的工作建设中如何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这方面起了开创性、奠基性的工作,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这里我们着重讲谷政委在政工会上，对政工干部要求的两句话。即：“我在五院的工作方法是营教导员的工作方法，研究室的政工干部是指导员的工作方法。”这两句话简明扼要寓意深刻，针对性强，易懂易说。

所谓按营教导员的工作方法，这是谷政委到五院后对自身的严格要求。我们都知道，谷景生政委是受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我军高级将领，由一个军种的副政治委员的身份，把自己降为营教导员身份要求自己，生活工作条件极其简单。吃、住、办公都在一个只有20多平方米的房间。中间拉开一个屏风，外面办公会客，里面睡觉。这和一个军种的领导人工作生活条件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从五院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教导员的身份和工作方法确实是相适应的。五院初成立时，院下面就是研究室，是基层单位。这颇和部队的营连相似，只能实行面对面的领导，要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平易近人，和专家教授、技术人员广交朋友，善于谈心等等。当然教导员的身份和工作方法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和部队的教导员差不多，而是说只有用教导员的身份和工作方法，才能更好地完成历史所赋予五院的神圣使命。这是符合五院初创时期的情况的。谷政委以此自律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并在所有人员中起了表率作用。

所谓按指导员的工作方法，主要是对研究室政工干部的要求。五院刚成立时，研究室都配有专职的政治干部，这些同志都是从部队中选调来的。主要是团政委一级，还有个别级别更高的。现在都要求按指导员的工作方法进行工作，对这批同志也都面临着如何适应的问题。

应该说，这批同志都经历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对在连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对指导员在连队中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都有深刻的理解。

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是在国家刚组建的导弹研究机构工作，我

们所要面对的对象是高级专家教授和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工作性质和环境都变了,工作对象变了,这真是老兵遇到新问题。但我们这批同志都深深懂得,新的尖端武器在保卫祖国增强国威方面的作用。我们的国家当时还很穷,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大学生还很少,而尖端武器主要靠这些同志搞出来。因此研究室的指导员的工作是具有高度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就是我们这批人做好研究室政治工作的动力和压力。

在弄懂工作性质和工作对象变化的情况下,指导员的工作方法必须与之相适应。这些同志过去在部队是首长,有警卫员,现在的身份是为科研工作者服务,做勤务员。过去熟悉的东西用不上了,现在成了“科盲”。他们必须恭恭敬敬地向专家、知识分子、工人师傅学习,拜他们为师。必须放下架子、平易近人和他们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实践证明,在五院创建不太久的时间,广大政工干部熟悉了科研人员的特点和要求,在他们中间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使政治工作较好地渗透到科研生产的全过程。现在许多老同志回忆起那时的情景,都历历在目,倍感亲切和怀念之情。

总之,五院初创时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有声有色的,对整个五院的建设都起了促进和保证作用。实际上是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政治思想工作的传统作风和五院科研生产实际相结合。谷景生政委在这方面起了倡导示范作用,对五院的政治思想工作起了深远的影响。

(四)

最后我们还要提及一件事,1958年,国防部五院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召开了四级干部会。在此次会议期间,还专门批判了谷景生政委(谷政委已调离了五院)。当时我们都在基层单位工作,对事

情的起因并不清楚,感到很吃惊。我们多年在谷政委直接领导下工作,对谷景生政委很了解,我们大家是很尊重他的,工作中受益匪浅。我们认为他在五院初创时期的工作很有贡献,威信很高,因此我俩当时对批判谷景生政委怀有不满,要为他讨个公道,后来因为会议开的时间太长(83天),被聂帅制止,因而没有展开讨论,批判会议也就不了了之。为此,我俩联名写了小字报贴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对谷景生政委的批判,肯定地说是不公正、不应当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们敬祝谷景生同志健康长寿。

2001年10月

构筑中国导弹科技事业 基础的谷景生同志

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王道力

对于中国导弹事业的创立，聂荣臻元帅回忆录中说：“1956年2月，钱学森同志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开始由周恩来、我和钱学森同志筹备。1956年4月，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航委，由我兼任主任，黄克诚、赵尔陆同志兼任副主任。委员有王士光、王诤、安东、刘亚楼、李强、钱志道、钱学森等同志。安东同志任秘书长。领导我军的导弹和飞机的研究工作。”1956年5月10日，聂总（人们对聂荣臻元帅的尊称）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建议：（1）在航委下设立导弹管理局，统一领导导弹的研究与生产工作。由钟夫翔任局长，钱学森任总工程师。（2）建立导弹研究院，钱学森兼任院长。为保密和便于对外联络，经彭德怀、黄克诚同意，将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分别改称国防部第五局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7月，军委决定建立五院，隶属五局领导。1956年10月8日，五院正式成立。聂总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讲话中提出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

1956年底，中国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建设项目停下

来,有的在进行调整。对于导弹武器的研制,仍然坚持自力更生,但要适当放缓一些。在这种形势下,钟夫翔于1956年12月8日向聂总报告,建议将五局、五院的组织形式改变一下。当时的组织形式是:航委领导五局,五局领导五院。五局是管理机关,而五院却没有办事机构。所以,钟夫翔建议将五局同五院合并。这样,既减少了中间一层机构,又使五院有了比较完整的办事机构,达到精干机构,提高效率的目的。1957年2月14日,聂总批准了这个报告。同月,军委决定撤销防空军,防空军同空军合并。3月初,军委决定原防空军副政委谷景生任国防部五院政治委员,原防空军副参谋长刘秉彦任副院长,钟夫翔调任二机部副部长。1957年3月,五局合并到五院,



谷景生在防空军一次大会上讲话。

当时称之为局院合并。3月12日,刘秉彦到五局告诉我,他同钟局长、谷政委已商量好,要我立即到五院任组织计划处处长,把组织计划处建立起来。并说组织计划处的基本任务是:负责五院各项任务的规划与计划;组织对科研、生产、技术协作等各项任务的落实。五院的机构将设置二处、二部、二室。即:组织计划处、干部处;政治部、院务部;办公室、技术资料室。这样,从1957年3月起,我认识了谷景生政委,并在他的领导下,负责导弹事业的规划与计划工作。

谷景生政委1957年3月到五院工作,1958年6月初离开五院,到总政群众工作部任部长,在五院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细致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和老专家们谈话交朋友,而且常常和青年知识分子促膝谈心。他同政治工作人员说,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工作,要深入,要细致,要同他们交心交朋友。我是政委,但我又是教导员,我按教导员的方法工作。你们就是要像指导员一样,按指导员的方法工作。但知识分子不是战士,要用关心爱护战士一样的心情去工作,但却不能用对待连队战士一样的方法去工作。知识分子的科技知识比我们强得多,要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要虚心、热心、关心地同他们一起工作。我同谷政委第一次接触,他坦率地对我说,业务工作我不懂,我也不想管那么多。大事党委定,党委决定了的事,你们就大胆地工作,而且是创造性地工作。谷政委的话,一下子使我的心踏实了。我想,在这样的领导人手下工作,心情会舒畅,工作会做好的。所以,我们虽然刚刚认识,但却和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没有隔阂,没有距离。

谷景生政委和刘秉彦副院长到职后,由原防空军调来一些政工、行政人员和几名科技人员,加强了五院机关力量,并且有步骤地开展工作。

一、将五院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谷景生政委、刘秉彦副院长请示航委,要求将五院纳入中国人民

解放军序列,解决科技人员的参军问题。航委同意科技人员参军。总参授予部队代号,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〇〇三八部队。8月1日举行了入伍仪式,并授予了科技人员军衔。历史证明,科技人员的参军,对于这支新生的国防科技队伍,树立对事业的神圣感,对于军人的荣誉感,提高保守国家机密的警惕性,加强组织性与纪律性,培养敢于碰硬,勇于攀登,严谨务实,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二、正确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957年五六月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场政治斗争,即反右斗争。当时五院人数不多,青年知识分子134人,老专家36人。在反右斗争开始时,五院内动静不大。后来,当年的应届毕业生来了200多人,他们同学校的联系较多,再加上上边对反右斗争有所布置和要求,因此,五院内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激烈的言词,在大字报上出现了,但多数是对工作中的问题提出的不同看法。怎样对待这些问题,从领导到群众认识很不一致。当时社会上反右之风甚盛,五院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对于一些善意的批评也上纲上线,说成是反党。例如,当时院务部有的同志对伙食有些意见,而且是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对于这样的意见被说成是反党,这就太过分、太离谱了。但在那种风气下,人们却噤若寒蝉,不敢说话,在这种形势下,谷政委正确地掌握政策,坚持不划右派。对于老专家们更爱护备至,不准随便点名;对于青年知识分子则引导他们正确区分善意批评和恶意攻击。所以在那场斗争中,五院只有一名当年毕业的大学生被定为右派。事后,许多当年经历过这场斗争的人,都称赞谷政委掌握政策稳妥,不为风气所动。尤其是和后来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相比,更感到谷政委是一位有见识、有水平的可敬长者。

三、确定研制基地

谷政委到五院之时,五院是在北京军区空军医院(四六六医院)

和解放军一二四疗养院内办公。这两处地方都没有发展余地，不可能形成研制基地，必须寻找新的地址。谷政委、刘秉彦副院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办。当时曾设想在八里庄附近一带建设。谷政委看了之后认为，移民太多，靠城区太近，不适宜建设五院这样的项目，所以确定另外寻找新址。1957年4月中旬，我同刘涣臣一起到某地察看试车台建设地址时，发现山下一处院落很大，却几乎无人出入。那时，那一带比较荒凉，闲荒地很多，有利于将来的发展。经多方了解，始知这个院落是属于中央联络部的，名为马列学院二分院。我将这一情况向谷政委、刘秉彦副院长报告之后，谷政委、刘副院长即到实地察看。当时，我们只能在围墙外边及其周围观看。即使这样，大家在看了之后，一致认为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并要我马上向航委秘书长安东和聂办主任范济生汇报。5月6日，范济生通知我到他那里拿一封信，到中联部去办理将马列学院二分院地址划给五院的问题。我到中联部之后，李初黎副部长接见了，我说：“聂总于5月4日已同稼祥同志说好，将马列学院二分院财产全部无偿交给五院。但需待马列学院的学员全部处理完毕之后，五院再进驻。现在可先接过去，办理好财产转移手续。那里还有120名工作人员，请你们留下来安排。”谷政委、刘副院长完全同意李初黎副部长的意见。第二天，我和刘涣臣同中联部、财政部的同志一起办理手续，由财政部将全部财产，由党中央直属机关名下划到国防部五院。6月16日正式接收过来。实地一看，比我们想象的还好。有三栋办公楼、四栋宿舍，有礼堂，有门诊部，还有牛奶场。院内院外都有发展余地，距离选定的试车台地址又很近。谷政委高兴地说，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可以大展身手了。

四、组建第五研究院一分院

1957年5月，外援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经济联络总局驻京副代表加里宁少将于5月11日晋见聂总，转达了苏联方面为了在

火箭技术方面帮助中国,希望对以下五个问题得到了解:(1)中国在火箭技术方面的具体方针;(2)中国有多少训练出来的干部和以后训练干部的可能性;(3)建立新研究所的大致规模、期限和设备;要求苏联援助的性质和范围;(4)中国可用来生产火箭技术的工业潜力,以及生产火箭武器必须的原料、零件、半成品等工业保证来源;(5)在设计、生产和使用火箭武器时的保密条件和应有制度。根据航委通知,谷政委要刘秉彦、林爽副院长召集专家们,在技术方面进行座谈,准备资料。组织计划处则对有关生产、协作、物资、基建等方面准备资料,并起草了五院第一个保密条例。整个资料于7月10日报送航委,为同苏联谈判做了很好的准备。1957年9月3日,中国政府组成了以聂荣臻为首的代表团,成员有:陈赓、宋任穷、李强、万毅、钱学森、刘杰、王诤、张连奎、刘寅,李强兼任秘书长。另有顾问13人,工作人员八人。于9月10日开始同苏方以别尔乌辛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谈判。9月14日,别尔乌辛提交了两国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生产与研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试验火箭武器、原子武器的靶场等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技术援助的协定文本。这个协定于10月15日签定(简称十月十五日协定)。10月30日,粟裕总参谋长,黄克诚、陈赓副总长召集王诤、朱明(通讯兵部政委)、李强、安东、钱学森、谷景生、刘秉彦、林爽等开会,就“十月十五日协定”签定后产生的新情况和新任务,导弹研究工作的领导和机构的组织形式如何适应等问题做了研究。一致同意由五院为总院,统一领导五院和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11月15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向周总理报告,建议:以国防部五院为总院,统一领导五院和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作为五院的一个分院(定名为二分院),其党政工作、物资保证、行政管理,均由总院统管。调王诤同志任五院副院长,全力领导五院的工作。11月16日,周恩来总理任命钱学

森为五院院长兼一分院院长，刘有光为政治委员；王诤为五院副院长兼二分院院长；谷景生为五院副政治委员兼一分院政治委员；刘秉彦为五院副院长兼一分院副院长。12月13日，航委秘书长安东转达国防部通知，通知说：“遵照国防部指示，国防部五院及所属第一、第二分院，均按学院一级行使职权（当时军队学院一级为兵团级，安东秘书长这一通知用书面形式送达五院，现存航天科技集团档案馆）。”



谷景生与苏联专家在一起。

按照组建一、二分院的方案，经过半个月的准备（打扫分配房间，准备营具、炊具，组织运输车辆等），谷景生政委率一分院人员于1957年12月3日全部迁往长辛店。并组成了八个研究室。因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机关，所以五院机关的大部分人员随谷政委到一分院工作。我留在总院办公室工作，从此，我同谷政

委即分开工作了。从谷政委在五院初创及建立五院一分院过程中，谷政委对于导弹事业的创立费尽了心血，而且他所创建的框架，一直到现在还在起作用。只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任务与人员的增多，而有一些变化，但基本框架没有变化。谷景生政委的远见卓识，对航天事业的贡献，航天人将永远记在心中。衷心地祝愿谷政委健康长寿！

2001年5月15日

谷政委远行了

原航天部一院人教部副部长 宓世湘

惊悉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我院首位政治委员谷景生不幸辞世，作为建院时来院的人，心情都十分沉痛。谷景生原为空军副政委，空军与防空军合并后，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任首任政委，与院长钱学森共同组织了我国火箭事业的开创工作。后因五院扩编，谷景生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政委兼第一分院政委（我院的前身），主要工作在一分院。钱学森也同时改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兼第一分院院长。这两位领导对组建一分院并开展工作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作为经常接触谷政委的机关人员，感觉他为人坦荡，刚直不阿，敢于坚持真理。有一次，黄克诚总参谋长来院参观，谷政委坦率地表达了对一些“左”的思潮的不满，并开玩笑地说：“我干不下去了，你给我调到连队当指导员去吧！”总参谋长含笑不语。

后来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直至被打成叛徒坐牢多年。有一次，我和潘昭汉去看望他时，他很风趣地讲：小平同志复出后问，谷景生到哪儿去了？他当时才被解放出来重新分配工作，马上就对越反击战前线指挥部报了到。

谷政委做报告从来不用讲稿，但内容生动，极其富有鼓动性，博得了大家的好评。他曾讲，志愿军十五军编军史，查到军长不少资料，但作为政委的他，留下的文字资料却很少。他解释说，他都是即席发挥，根本没讲稿。谷景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我军仅有

几位没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将军。

在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当时五院虽也定了一个右派和右倾分子,但并不像社会上打击面那么大,人数那样多,也没有定右派指标;对技术六级以上的专家则没有触动。

在工作中他尊重行政领导行使职责发挥作用,作为党委一把手对当时还未入党的钱学森院长很尊重。谷景生等一批军内挑选的优秀政工干部,给我院带来了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支持技术领导工作,关心爱护新入院的大学生,为航天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敬爱的谷政委虽然远行了,但他参与开创的航天园地已结出丰硕的成果。今天的航天人会铭记那些航天事业开创者的历史功勋。

回忆谷景生政委二三事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李钟玄

十五军(原二野九纵)是太行子弟兵第三批组建的野战军,在二野来说是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一组建,即渡河南征,开辟豫西,大战中原,继而抢渡长江,进军西南,抗美援朝,和老大哥部队一起担负起艰巨的战役战斗任务,成为能打大仗、打恶仗的坚强部队。至今在中原战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两广战役、上甘岭战役都留有它辉煌的战绩。十五军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和谷景生政委坚强的思想政治领导是分不开的。谷政委和秦基伟军长军政协调配合默契。据我所知,十五军的河南周口会议、江西临川会议、安福会议、赣州会议、广西芦圩会议、贵州独山会议等都是谷政委作的会议总结,画龙点睛,从政治思想上点出当时工作上的重点和方向。

对我来说感觉最深教育最大的有以下几点:

一、渡江作战

我在一三〇团当团长,担负了光荣的突击任务。从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中,深深感受到谷景生政委坚强的政治领导。在周口会议上,他在会议总结中,纠正了当时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延迟准备和搬家思想。贯彻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争取一年左右打败蒋介石的要求,指出要争取早日渡江。今后仍是取给于敌,不能大搬家,准备工作越快越好。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部队轻装前进,渡淮河,跨越大别山,进抵大湖、宿松、望江一带。收集船只,动员船工,水上练兵,作好了渡江的准备。在渡江前夕,4月20日,又是谷景生政委亲自参

加四十四师活动分子大会,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两面大旗,授予突击部队。讲话动员,把部队的士气提到空前高度。战斗发起后,一三〇团在40分钟横渡近5000米江面时,迎着敌人稠密的炮火,冒着敌人居高临下沿岸机枪、手榴弹、火焰喷射器的射击,勇猛前进义无反顾,以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完成历史性的光荣任务。又是秦军长和谷政委,渡江之后立即在香口集合部队讲话,并对伤员逐个进行慰问,感谢部队为十五军争了光,为打败蒋介石立了大功。谷政委讲话中强调:两面大旗,“打过长江去”已经实现了,“解放全中国”还需继续努力。动员部队立即转入了千里追击,越过浙赣线,昼夜兼程,直扑福建,进逼福州。正是坚强的政治领导,深入的思想动员,密切配合正确的军事指挥,保障各项思想组织准备顺利进行,保障作战部署的顺利实现,圆满完成了渡江突击任务。



渡江战役前谷景生在豫西某县学习毛泽东报告动员大会上。

二、在部队最困难的时候

为了配合四野围歼湖南境内的白崇禧军队，部队冒着酷暑自江西临川西进。一三〇团由于淮海战役、渡江作战伤亡较大，部队成分起了很大的变化。随俘随补，解放战士竟占整个人数的百分之六七十。不少基层干部都是老解放战士，染上了许多军阀主义的管理方式。由于不习惯南方的水土气候，部队发生了很多病号。据当时统计，全团有300多个病号，发疟疾的占60%以上。加上酷暑行军，异常艰苦。特别是渡江之后，居功骄傲，管理松懈，部队发生了逃跑和自杀事故。后来因为情况变化，白崇禧军队南撤，任务变化由西进改为南进。部队在安福地区进行休整，否则不但不能打仗，自己连路都走不动了。这真是渡江之后部队最困难的时候。

7月28日，军队在安福举行会议，谷政委总结酷暑行军。当时我是准备挨点名批评的。但却出人意料的是谷政委在会上只是以“某些单位”、“某些领导”的方式进行了不点名批评。没有点名并不是问题不严重。我暗下决心，酷暑行军没有搞好，下一步进军大西南一定要搞好。

会后不久，谷政委带了四个工作组到了一三〇团来帮助工作。帮助贯彻四兵团会议深入进军大西南的政治动员，并且决定直接到连队中去。这又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这是反对官僚主义的示范。他们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找我们谈话，在我日记上记着两件事。

“8月16日，谷政委下午来谈了一下。他说由于营里的领导太琐碎，使连里很忙，根本没有用脑子考虑执行全面的工作的时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团和营恐怕也是如此。”

“8月17日，关于自杀问题，谷政委指示，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所以纠正也不是那么容易。基层连排干部的军阀主义虽然已有改变，而群众对干部的看法却没有改变。因此必须在部队中开展民主团结运动，由干部公开检讨过去军阀主义的错误，并表示决心纠

正,以稳定战士的情绪。对于再次发生的自杀问题,应说明干部对他们的关怀爱护。自杀就是自绝于革命,予以严厉批判。特别要注意的是要沉着,不要因此而打乱自己的工作步骤,放松中心工作。”

谷政委整整在连队呆了十天,临走时找我和几位领导同志谈话。他说战士中对进军西南尚普遍存在怕远、怕病、怕困难,特别是怕回不了家,对当国防军永远是战斗队有抵触。经过学习,最后胜利的信心是确定了,认清进军大西南已是必然的趋势,这是此次教育的一大收获。但自己的个人思想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即使解决了,遇到困难还会复发,不能一劳永逸,还要不断针对发生的思想问题进行教育。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次教育死角太大,还要继续补课。营连对团的意见,主要是觉得团里领导不深入,对下边帮助比较少。

对团的领导,他强调我们应加强党委制,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他说,我们工作都还是努力的,问题发生后,大家思想上都很沉重,很着急,但缺乏对主要环节问题作深入的研究。在工作作风上,要我们多直接到连队中去,把营当成督促检查机关,从连里直接了解决议执行情况。有什么困难,正确与否,要深入一点推动全盘。

这些指示我们都觉得很中肯,按他的指示去作,结合开展民主团结和人马健康运动,团里的情况逐渐好转。

三、在我摔伤之后

1949年10月13日,进军广州。部队行至英德,我被一只驼炮的骡子从一座火车铁桥上撞下去,摔伤了。大约三四十米高,严重脑震荡,骨盆也摔裂了。之后到佛山市立医院、广州中央医院躺了三个月,根本不能动。稍好一点后,随兵团、军直经广西、贵州到云南沾益、曲靖,不是坐船就是坐车。直到1950年3月,照顾我行动不便,分配我到军随校任第一副校长(校长由军长兼)。在此期间,谷政委曾到佛山医院、广州医院多次看望,并由崔星等同志多次给我买了许多书看。我为了填补空白的休息时间,想借此机会学习提高自己,拼

命的阅读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谷政委看到我抱着一些书本埋头苦读,大概对此也有感触。他对我说:读书要独立思考,尽信书不如无书。因为有的书挂羊头卖狗肉,本来就是错误的,不加区别就会被它引到邪路上去。即便是正确的书,正确的理论,还要看符合不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也不能生搬硬套。所以一定要独立思考,联系实际,不能盲从。他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按他的指示,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总结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使我在理论修养上有很大的提高。当我以后回到四十四师工作时,大家都说我工作作风,对人对事完全和过去不同了。我认为主要是克服了盲目的自满骄傲,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能做自我批评了。

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后军的战术研究会上,秦军长因事回国,周发田副军长主持。谷政委最后讲了两点:(1)军事学习要反对经验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2)学理论要活用原则,要学以致用。可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谷政委是一贯的。当时所讲军事学习上要反对经验主义,是对五次战役未取得应有战果的深刻教训而说的,既犯了国内战争的经验主义,也犯了朝鲜前三次战役的经验主义。

四、反骄横,反个人主义

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上海、武汉、成都、重庆之后,全国胜利在望。经过了十年的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的人民军队,将进入一个和平时期。而战争转向和平,却面临着许多问题。胜利之师骄傲自满,功臣自居,闹享受争待遇,不团结,转不好这个弯子,革命就会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胜利变成失败,不要敌人来打,自己就垮了。为此中央军委狠抓了“反骄横”。凡是这一工作做得好的部队都顺利过关,凡是这个工作做得不好的就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在十五军显示了谷景生政委坚强的政治领导。

早在江西临川会议总结时,谷政委就严肃地批评了过江之后产

生的骄傲蛮横无组织现象。到赣州会议上,9月28日谷政委进行总结时就分析了反骄横的意义,骄横的表现,骄横的根源。并根据华南局和兵团的会议决定,把反骄横作为进军大西南征途上的中心工作。我摔伤后随军部行动,有幸参加军的多次会议。广西芦圩会议,各师汇报反骄横、执行政策纪律、作战等方面情况。谷政委传达贯彻四兵团会议精神,指出这是由战争转入和平,部队和个人会不会落伍的重要环节。贵州独山会议上谷政委讲,要为警备昆明作好思想准备,开展反对个人主义斗争,大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若不能在进入昆明以前彻底清算个人主义,那么进入昆明后的情况是难以想象的。他抓住了刘少凡(军作战科长)自杀的事例,对干部进行教育,我的日记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12月9日,广西横县。晚饭后和谷政委谈话,他告诉我刘少凡自杀的情况。原来刘在过去就存在堕落享受思想,具有浓厚的物质观念。在广州已经准备到云南的日用家具了,在粤桂战役中违犯战场纪律,发洋财,破坏群众纪律,偷老百姓东西,收集淫书淫画,这些错误被在小组会上揭发后就自杀了。这里给我们一个预警,在和平转变关头,特别是到达云南“安家思想”和“回家思想”,更会发展起来,谁站得不稳,谁就会被个人主义拉到泥坑里去……

从江西到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虽然在不停地行军作战中,但从没有间断过反骄横的学习。我参加军的机关干部小组。记得当时崔星是小组长,组内有靳钟、闫季全等同志,每人都要进行学习、准备、检讨、批评自我批评。这个反骄横运动,随着任务变化,直到由云南到四川的路上还在继续进行。至今我还保存一份反骄横的自我检讨的材料。

在谷政委临到昆明赴任的欢送会上,他的讲话中还勉励大家在胜利和平的情况下,不要再犯“五皮三金”,在革命转弯时,不要被甩掉了,大家应相互警惕勉励。

这种反骄横、反对个人主义的教育，给我很深的印象。它保证我胜利的经受了由战争到和平转变的考验，也使我体会到十五军所以能从战争到和平，又由和平顺利地转入抗美援朝战争，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是以谷景生政委为首的军党委在转变关头，深入进行反骄横、反个人主义的结果。

五、离开十五军的时候

1957年10月，我从十五军四十四师被调到六十军一八〇师代理师长。这对我来说是个很突然而又很不情愿的调动。一是不愿离开十五军，不愿离开从1938年以来就生死与共的老部队；二是我才当了七个月的副师长，骤然去代理师长怕干不了；三是一八〇师五次战役回撤时遭受严重损失，重新组建困难一定很多。但上级既然已经决定了，自己只好服从。而思想上却没有一点儿底，真是战战兢兢。

临走时谷政委与我谈了话，他从一些具体问题出发谈了我的优缺点，主要谈了今后到新岗位应注意的问题，综合起来有以下四点：

一要坚持原则。要有原则的斗争，要开展有原则的批评，要继续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这是针对我有了自我批评的精神而缺乏同志间互相批评的缺点而说的。

二是要重视军队建设。战斗作风要在平时建设中打好基础，战斗作风不单是打仗问题——这也是针对我重打仗轻建设的缺点说的。

三是工作要抓住中心环节，要抓头头，要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要从政治方面了解军事，要加强政治思想领导。

四是到新岗位不要被一八〇师的名声压倒了，不要操之过急，要注意团结干部，要明确自己的主要责任，一开始就要从稳固的基础上建设部队，要从政治思想和组织干部上建设部队。



1949年12月,前委电令谷景生参加昆明军管,并担任昆明市委书记。十五军同志们在欢送会上把谷政委高高举起。

谷政委这些谈话,说明他对我很了解,针对性很强。我就是带着这些指示到一八〇师去工作的。团结一八〇师的广大干部,经过组织整顿、思想教育、军事训练,重上阵,终于打了翻身仗。

谷政委和秦军长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当时军到云南,我已确定到随校工作但还在军部未赴任时,正逢谷政委调任昆明市委书记,我也参加了对谷政委的欢送,大家把他高高地抬起来,走了很远。说明谷政委在十五军有很高的威望,是大家对党委的尊重,对党的热爱,这个场面至今已50年了,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2001年3月15日

一个父兄般的将军

——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谷景生政委

原十五军老战士 柳岳继

1993年10月20日,是郑州市解放45周年纪念日。曾带领我军解放郑州,并曾留任郑州第一任市委书记的谷景生,应邀出席了这个纪念大会。谷景生在抗美援朝期间是我所在部队——志愿军第十五军的政治委员。当段绪德战友把从电视上看到谷政委来郑的佳音告诉同志们后,大家相约去中洲宾馆看望老政委和他的夫人范承秀大姐。

自朝鲜凯旋归来,转瞬40年飞逝,当年还是不惑之年的政委如今已两鬓斑白,但他思维敏捷,能准确地叫出战友们的名字。见我就问,你怎么没有把“十五军的女婿”(指我老伴)带来?几年以后,十五军战友在三峡、张家界团聚中,“十五军的女婿”、“十五军的媳妇”这个词成了称呼战友配偶的亲切实头语。政委仍是当年那样幽默风趣,使大家打消了久别的拘束。我是第一次见政委的夫人范承秀大姐,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她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离休前也在领导岗位上。我们的到来,令两位老人特别高兴。我从家中带去了一本老相册,当他们夫妇发现我还保存着政委和其女儿在朝鲜元山港的合影时,万分感慨。范大姐把照片捧在胸前一遍又一遍动情地念叨,这张照片我们家已经没有了,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丢失的,这回可好啦,如女儿看到她幼时这个样儿,该有多么的

高兴……此次聚会又把我的思绪带回了当年那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

军政双立功

谷景生政委是个知识分子，曾领导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他虽学识渊博，又是高级将领，但却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像一位严父那样治军，却又像一个慈母那样爱护战士。他独特的工作方法是能理解不同层次的人群，与他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为此，他深受广大战士、干部的尊敬和爱戴。

“军政双立功”是这位被称为我军的理论家、心理学家谷景生政委常讲的一句话。多年来他为之付出了毕生精力，同时也要求各级党委付诸行动。政委与军长之间相互尊重，密切合作，这种凝聚力是我军屡战屡胜的保证。军事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有高超的战术加上高昂的士气才能取胜。在战场上的政治思想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思想政治工作深入连队，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政治热忱，使同志们个个明白我们是为保卫祖国而战，勇于献身。另一方面是瓦解敌人士气，不战而胜之。为做好此项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了一批英文翻译，利用电台、传单及战俘献身说法去瓦解敌人。1997年十五军老战友在张家界团聚时，来自福建的战友何藻英，就曾担任过对敌宣传工作，她通过电台对敌方广播美国的思乡小夜曲。后来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造反派说她向敌人献媚。不过她仍为自己的工作成果，一些听到歌曲，收到传单的联合国军向志愿军投诚而高兴。在震惊中外的上甘岭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时，也实现了政委提出的“军政双立功”的号召。

越困难越讲究

谷政委的另一独特的思维方法是——“越困难越讲究”。他常说，在困难的时候应加倍关心战士，才能使战士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思想活跃、战无不胜。如五次战役后，部队伤亡很大，有的单位领导变得严肃有余和蔼不足，甚至个别单位命令女同志把头发全部剪成短发，戴上军帽和男同志一样，分不清谁是男谁是女。致使一位女英雄因不能代表女性形象，未能作为归国女代表回国参加国庆观礼，造成终身遗憾。政委得知这一情况后，批评了那个单位的领导，立即制止了这一事态在全军的发展，并相应地提出“越是困难越要讲究”的指示。政委说：战争是残酷的，但我们不能因此思想僵化，生活死板。我们要千方百计地使生活丰富多彩，在现有条件下，要设法改善连队伙食，搞好卫生，女孩子们可以扎上花辫梢，文工团要把歌声送到前沿去。在政委这一指示下，文工团领导为大家特制了“演出服”。演出时穿上呢子军装，身系武装带，脚穿高腰皮靴，可威武了。正是在政委这一指示下，我们文工团队的同志们，在朝鲜的三年时间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前线连队度过的。不仅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活跃了阵地生活，同时也锻炼了自己。许多同志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并荣立了战功。

关怀能使人奋进

1952年春，十五军在谷山地区休整期间，敌人为了挽救在战场上的失败，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祖国人民送来了预防霍乱、伤寒等病毒的疫苗，军文工团属第一批注射的单位。由于没有经验，全体人员同时注射，哪知此针反应极大，第二天全体人员，包括炊事员

都病倒了。刘清凯团长和卫生员赵升琴支撑起来向上面报告了这一情况，政委知道后亲自来看望大家，并派人来给病号做饭。我反应较厉害，头疼发烧伴随不断呕吐。看到政委来了真是又高兴又难过。这时政委走到我身边，诙谐地说：小辫子（团里同志给我取的外号），听说这一仗你打的很不错。政委见我不解地看着他，又接着说，通过反应人体会产生免疫力，敌人的细菌战不是就失败了吗？所以说，谁最难受谁就打了大胜仗，你应该高兴才是呀！政委的一席话把大家都逗乐了，顿时觉着身体轻松了许多。

不久，留守凤城的同志们来到朝鲜。这时小同志多了起来，最小的黄少叔、周诗容年仅13岁。政委对小兵们更是格外关怀。他曾对我们说，按年龄你们应该是还在父母的呵护中，在学校的课堂上。可是现在任务不同了，你们是军人，是在打仗，时间、条件都不允许你们正规地读书，只有靠你们自学了。除看书、读报外，写日记是很重要的。它不仅能提高文化水平，还能丰富阅历，牢记你们的少年时代是在艰苦的战争中度过的。有人说：“行经千里地，胜读十年书”，你们跟随部队从南到北，已经不止行千里，而是万里了。只要你们有信心，有志者事竟成。在解放军这个大熔炉会学到许多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成为有用之材的。此后，文工团领导开设了一个图书室，由创作组的同志帮助大家学习。从那时起，我就坚持写日记，一直到今天。在军党委的关怀下，文工团领导陆续将一些中层干部李新学、赵万堂、段绪德、滕逢祥等同志送回祖国的西南艺术学院深造。多年后，文工团这些青年人，真是应了政委的话，大部分通过自学有了成就。有的在部队任职，有的是电影编导，也有舞蹈家、作曲家、教授、作家、企业家等。我虽然没有大家那么出色，但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河南省劳动模范，是和当年政委教诲和文工团各级领导的帮助分不开的。

更有一件让人终身难忘的事。上甘岭战役结束后，一些老同志

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一次全军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政委把与会干部和文工团的同志召集起来，政委对大家说：祖国人民把文工团这些女孩子交给我们十五军，我们要像父兄那样很好地关心爱护他们，使她们能健康顺利地成长。这方面我们干部必须做好表率。今后我若听到有人对她们有不良行为，我一定要严惩。这件事虽然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当年的小姑娘如今成了老奶奶。可大家仍很珍惜老政委这份出自肺腑的关爱之情。1995年武汉一些战友来郑州，大家谈及此事时，周念纯、唐初阳夫妇仍激动得老泪纵横。

送别见真情

1954年，朝鲜停战后的第一个春天，政委将要离开我们，回祖国任职了。当时我已调到军警卫连任文化教员。那天一大早，战士们列队去公路边欢送敬爱的政委。此时整个盘山公路早已聚满了人群，两头看不到尾。九时许，一辆军用小轿车从山角拐弯处隐约出现，徐徐开来。激动的人群开始向前拥挤。我索性朝小车奔去。谁知车上并不见政委，除司机外车上坐着一个顺便搭车回国休养的病号。再往前看，政委正步行着同欢送的同志握手告别。待我回到队伍中，听到有人在低声哭泣。是呀，警卫连一排是负责警卫军首长的，几年来他们每天在政委身边度过。现在要分别了，作为一个普通战士，此生恐怕无缘同政委再相见了。触景生情，想起政委平素对我的关怀，眼泪夺眶而出。政委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见我很难过，他拍着我的肩说，小辫子，咱们祖国再见吧。这时我心里有许多感谢政委的话要讲，可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举手向政委敬了最后一个军礼，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目送政委到另一个山弯处，那边仍是长长的沸腾的欢送人群。我心中默默地祝福：政委一生平安。

此文载于2001年8月1日《中国文化报》

十五军血战上甘岭

原十五军老战士 刘贻刚

关于兵力部署和干部使用,秦基伟和政委谷景生以及军的其他领导同志进行了反复研究。他很重视谷景生的意见,这不仅是出于一般工作关系的考虑,而且因为谷景生政委往往在关键时刻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谷景生很爱学习,国内战争时期,他骑在马背上也在看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是十五军著名的“理论家”。谷景生政委搞过地下工作,也搞过地方工作,曾兼任过郑州市委书记,有多方面的工作经验,加上肯于用脑和善于听取同级和下级意见,所以在机关、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说:“我军担负的防线,地处中部,极为重要,敌人势在必得,我也势在必守,必须使全军上下一心,左右一体,树立整体观念和长期坚守思想。我军入朝后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那是运动战,我们经受了考验。现在是阵地战,这对我们又是一次考验。我们从运动战转为阵地战,过去我们是两条腿和汽车轮子赛跑,现在是两条腿对两条腿……应该把积极防御,筑固阵地,消灭与消耗敌人,保存与提高自己,作为我们的战术指导思想。”

8月初的一天,十五军党委书记、政治委员谷景生驱车来到五圣山下。谷政委个子不高,微胖,白净的圆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具有学者风度。他满面笑容,平易近人,处处给人以亲切感。他熟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对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也很有兴趣。他经常说,做政治工作的同志当然要学政治,但是也要学军事。不懂军事,打起仗来,你就没有发言权。现在,他对部队筑城非常关注,这次,他就是来



谷景生在朝鲜战场上。

检查坑道建设的。

他来到五圣山下，陪同的干部建议叫几个干部战士来开个座谈会，谷景生摆摆手说，不要叫，你领我去看看战士们吧！他弯着腰，打着手电从这个洞子钻到那个洞子，每到一处，都向战士表示慰问。战士们听说军政委来到坑道里，慌忙穿戴上衣帽敬礼，谷政委总是连忙拉着战士的手、递烟，问好！他问战士们怎么打眼？怎么样放炮？怎样排烟？怎样掌握水平和方向？七八十米长的大坑道，里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战士们为了给祖国省灯油，把山上的松木或青冈木，劈成一米多长、指头粗细的条条，晒干后拿到坑道里点着，举起来照明。但这东西烟子很大，挖坑道是三班倒，24小时不停工，每一班下来的人都被熏得面如锅底，鼻孔黢黑。谷景生看到这些情景，对战士们的敬意油然而生。他说：我们党和人民为有这样好的战士，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谷景生来到四十五师的筑城办公室，这是一个伪装很严密的掩蔽部，门上挂着遮光防空的雨布。谷政委低头进去，盘腿坐在草铺上。借助烛光，他看见对面墙上挂着一张“筑城进度统计表”，上边的数字标明：截至7月底，全师已挖成坑道306条，长8800米；挖堑壕、交通沟160条，长5300米；挖反坦克壕4条，长2100米；筑掩蔽部2400个；设鹿砦2600米；铁丝网2300米；粮食库洞61个；弹药库洞65个；坑道结合掩蔽部式的阵地伙房140个；各级指挥所、观察所204个。总计用工25万个，已完成筑城任务的85%以上……一排数字下边的备注中说明：前沿阵地已初步解决了防空、防炮、防潮、防毒、防塌等问题；一线坑道内，正在修建贮水池、伙房、厕所。战斗、生活条件已初步得到改善。四十五师政委聂济峰见谷政委看得很认真，没重述那些已经标明的数字，只着重就坑道挖成之后，阵地上已经发生的变化汇报说：四十五师上阵地的第一个月，遭敌炮及空袭伤亡532人，本月已降至伤亡140人。现在，一线部队已经能够生豆芽、做豆腐，能吃上热菜热饭，还能喝上胡辣汤，理发员到坑道里巡回给战士们理发；连队还用汽油桶烧热水烫衣服，灭虱子，让战士们轮流洗热水澡。聂济峰抬头看见谷政委满意地点头，又继续说：坑道挖起来之后，阵地管理也更加有秩序了。现在，各种会议、汇报制度都已建立起来。为了减少非战斗减员，一线部队尽量减少集体活动。上政治课或传达上级指示，采取干部分头下去进行的办法，或是班排派“代表”、“小教员”到连里开会、听课，回到班里传达。《战场报》从前发到班，现在发到小组，军棋、扑克也发下去了。各团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带着留声机到班里巡回放唱片，文工团员到班里教唱歌。现在的生活，可是比刚上阵地那时候丰富多了，活跃多了……

谷政委听了汇报，盛赞指战员们的创造精神是“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实践”。他说：“坑道是厚盾坚甲。这是人力改造自然的伟大群众运动，是毛主席‘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战略

方针的产物”。他指出：“这一巨大工程对我军阵地的稳固，已经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可以肯定，坑道工事的进一步完善，对于粉碎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必将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他的讲话，使众人满面生辉，更加感受到坑道筑城的伟大意义。

谷景生左手揭开茶缸的盖儿，轻轻地甩掉上边的水珠，右手端起茶缸喝水，把金丝眼镜摘下来用手帕擦了擦又戴上，挺挺身子说：“请你们告诉战士们：军党委的意图是，首先要站稳脚，集中精力挖坑道工事。现在，要发动战士们讨论：怎样把斗争焦点推向敌前沿？我们要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消灭与消耗敌人，保存与壮大自己……”说到这里，谷景生挽起衣袖，双臂平伸，双手向上一扬，做了个用力向前推的动作。

本文摘自《十五军血战上甘岭》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有感

原十五军老战士 段绪德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这个盛大节日的时候，回顾中国共产党 80 年不平凡的历程，深感经历坎坷，岁月峥嵘；面对我党已取得的丰功伟绩，倍感骄傲和自豪。

此时此刻，使我们更加缅怀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抛头颅、散热血的革命先烈们；对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党员、老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祝福！

在千千万万名光照大地的老前辈当中，谷老是一颗光芒闪闪的将星。他作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二九运动唯一健在的领导人，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指挥者，他战必胜、攻必取、叱咤风云的名将风采和中国共产党优秀思想政治工作领导者的光辉形象，依然光照后人。

由于工作原因，我有幸与谷老相识。给我的印象：饱经风霜，态度和蔼，慈祥亲切，平易近人，具有长者风度。我很敬重他的品质和为人。不论在军队还是在地方，谷老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主要从事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领导者。

毛泽东曾把思想政治工作形象地比喻为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就是做人的工作，就是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而对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的思想教育和思想转化工

作,在党的整个工作中处于中心环节,对党的其他工作具有服务、保证、协调作用。

谷老在军、地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岗位上和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绩,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为我党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增添了鲜活内容,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成为建党建军的宝贵精神财富。

由于谷老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使得他所领导的党组织和军队成为特别能战斗的集体,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谷景生同志,1913年生于山西省临猗县。1932年在北大附中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憧憬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1933年,党派他到张家口中共前委机关报《群众日报》做编辑和记者工作,后调抗日同盟军宣侠父师任宣传科长,以后又调张韬团任团政委;1935年四五月间,担任北平“左联”党团书记等职。到1935年11月,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他被任命为临时市委书记兼团市委书记。

在此期间,他和彭涛(组织部长)、周小舟(宣传部长)一起发动和领导了震撼全国的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彻底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成立“华北五省自治政府”的阴谋,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激情,有力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序曲。

谷老到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工作以后,曾担任太行山地委城工部长、林县县委书记、太行七地委书记等职,有力地领导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霸斗争,斗争是艰苦的、残酷的,但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二野九纵队政治部主任,和陈赓、秦基伟等同志一起,离开根据地太行山,南渡黄河,打到敌后,转战中原,领导、开辟、创立了豫西革命根据地。1948年,任十五军政委,并参与领导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千里追击,解放两广,挺进大西南,转战云贵川等大小战役无数次,解放了大半个中国。

1950年,由他和秦基伟领导的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和兄弟部队一起,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到汉城。五次战役,我军受挫,十五军接受彭老总命令,在芝浦里阻击敌人,掩护志后和主力部队后撤,以便调整部署。这是决定志愿军安危的一仗,如果堵不住敌人前进,后果将不堪设想,情况十分严重。

十五军接受任务后,秦基伟军长、谷景生政委下定决心,即使十五军打光,也要设法堵住美军前进,在芝浦里阻击敌人整整十个昼夜,敌人未能前进一步,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十五军受到彭老总和志司的通令嘉奖。

在上甘岭战役中,他们浴血奋战,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第一个没有攻破的防线,被毛主席赞誉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就在他的军队里,涌现了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一大批全国著名的一级战斗英雄,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我想,没有平时谷老过硬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些英雄是产生不出来的。

在武装强大的敌人面前,上有飞机轮番轰炸,下有坦克、大炮不停的攻击,在芝浦里阻击敌人十个昼夜,在上甘岭坚守43天,阵地削平二尺半,敌人也没能前进一步。

谷老和秦基伟同志军政配合默契,政治思想工作深入扎实,大军横渡长江时,他把工作做到渡江突击队;大战上甘岭时,他把工作做到前沿坑道。他深入实际,作风平易近人,对干部言传身教,在十五军培养了一大批过硬的军政干部,所以,在关键时刻,这个部队能经得起考验,作风过得硬,造就了这个部队攻能攻得上,守能守得住,在

任何强大敌人面前,艰难险阻无所惧,气势磅礴世无双,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作风。这一点,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回国后,先任防空军副政委,后又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谷老任政委。第五研究院奠定了我国导弹事业的基础。他在五院较短的时间内,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国原子弹成功爆炸,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另外,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参与领导指挥了自卫反击战。在新疆工作期间,为新时期我军现代化、革命化建设,为维护民族团结,巩固国防都做出了卓越贡献。

谷老的辉煌经历和革命事迹没有鸿篇巨著见诸文字,这和他习惯于自己是一名党员、人民一兵的思维有关。每当有人询问、采访时,他都婉言谢绝。只是个别时候,为了澄清历史事实,还后人一个清楚,才不得不说一说自己的过去。正是这些缘故,在历史资料中,很少找到关于谷老的记载;普通群众很少听到有关谷老的传说。人不知,己不愠,是一种修养,是一种境界。

作为和谷老戎马生涯、风雨同舟的战友、部下、亲属、乃至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宣传、教育的同志,有必要、有责任主动地、积极地去寻访、搜集、挖掘、整理、研究关于谷老的革命、战斗、工作的经历和资料,这不是谷老个人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用谷老和其他老一代革命者的革命事迹宣传教育下一代,让子孙后代都能记住他们的英雄事迹、革命精神,对于我们的国家、人民,尤其是对于青少年,在世界风云变幻中,时代变革的浪潮里,错综复杂的形式下,坚持真理,明辨是非,站稳立场,明确方向,坚定信心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紧密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披荆斩棘,奋勇前进,是十分重要的。

只要坚持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精神、革命的事迹陶冶人、造就人,就能够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纯洁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如今,离休在家的谷老已年近九旬。耄耋之年,他依然关心着党和国家发生的各种大事,依然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振兴,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人格力量和行动影响着、感染着他身边的人,言传身教子孙后代。

我们衷心认为应该出版一本书,收集谷老自己撰写的访谈及曾和谷老战斗在一起的部分老部下、老战友对谷老部分战斗、工作、生活的回忆文章,希望读者看后,能继承发扬老一代革命家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最后,我们衷心地祝愿谷老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2001年7月1日

学习谷景生 保持先进性

中共运城市委常委 王殿民

当这样一段文字映入我的眼帘时，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

“假如今天我们流淌鲜血，献出生命，让我们为此而骄傲，因为我们是抗日的战士，是为数不多的能够为祖国而战的幸运者。我们将实现对这片土地的承诺。——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体会被敌人的子弹穿透，但请相信，即使我们的身躯淋淋血洗，我们的精神不会倒下……我们的幸福将属于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是一位 20 世纪 30 年代，在白区的地下党员出生入死时写给这个世界的铮铮誓言。他告诉后人，他早已将全部的生命交给了伟大的祖国，将一颗伟大的灵魂交给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将幸福交给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他的名字叫谷景生。谷景生是山西临猗人，是我党第一代优秀党员。他早年投身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党和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是新中国政权的奠基人，是革命的先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一生就是高扬着的一面旗帜，在猎猎的劲风中显示着一种风骨。

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今天，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共产党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一名曾经在谷老家乡担任过县委书记的我，缅怀谷老的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缅怀谷老对党、对祖国、对人民

的一腔热血和赤诚，不禁肃然起敬，高山仰止之情油然而生。谷老像我人生的一面镜子，他的高贵品质，他的报国情怀，他的人格魅力，使我正衣冠、沐清风，坚定信仰，砥砺意志，勤奋工作，勇往直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今天，当我们这些晚辈，翻开中国革命的史册就会感到谷老光辉的一生，以及那不朽的爱国热情，如奔腾之江河，撞击着我们的心海，让我们感到了他的力量、他生命的璀璨和光芒。谷老的生命是轰轰烈烈的。他曾经是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5年的北平白色恐怖，民族矛盾尖锐，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入侵华北，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将华北大片国土沦于敌手，面对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以谷景生为首的北平地下党组成中共北平临委，顺应爱国抗日的历史潮流，于12月9日组织发动了北平大中学校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进行请愿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学生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卖国贼”，一场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在中国大地爆发了，掀起了全国各地抗日救亡的高潮。

毛泽东把一二九运动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曾经高度评价说：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从毛泽东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谷景生忧国忧民的超前胆识和胸怀韬略，高瞻远瞩，高屋建瓴，舍生取义的历史功绩。这样功高之人，天下能有几何？

而我们知道的却是一二九的领导人是谁的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末在纪念这次运动时才浮出水面的。谷景生的名字也没有写进史册，而此时他依然健在。在生死面前他选择的是为祖国而战，为人

民捐躯，为大众幸福而奋斗。在荣誉、鲜花和功劳面前，他选择的是沉默和放弃。

他说：“我是谁？这不重要，我做过什么？也不重要。我的经历，我的职务，我的待遇等等，都不重要，非常不重要。……我们时时面临选择，首先选择一种生存方式：砂乎，尘乎，蟑螂乎，营苟之徒乎？非也！荣乎，伟乎？亦非也！人，就是人，伟大的人，光荣的人，神圣的人——即共产党人。这是一个永恒的视点、出发点和立足点。”

谷老这掷地有声的铿锵之言，除了让我们看到一颗高尚的灵魂外，由此，我也想到西方哲人的一段话：“祖国和信仰是一座大祭坛，人只是一段香，命中注定为祭坛增光而点燃。”

由此我也看到了谷老在共和国的这个大祭坛上，以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傲骨，一遍遍在高举着他的信仰、燃烧着他的光和热，燃烧着他的生命。

我们知道，谷老是为党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了70多个春秋之人。他的生命历程中有功勋、有荣誉、有鲜花、有掌声，但也充满了崎岖、坎坷和不平，荣辱、蒙冤也时刻陪伴着他。

他曾经在抗日的战场上，敌人的子弹穿透了胸膛，死里逃生；他曾经为救亡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敌人的酷刑，但始终坚守党的机密，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操守和气节；他曾经在解放战争中，率部参加著名的淮海战役，配合兄弟部队歼灭了国民党王牌军黄维兵团，受到刘邓首长的嘉奖；他曾经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旗帜亲自授予渡江突击队，让历史的天空永远飘扬着这面不朽的光辉的旗帜；他曾经赴朝作战，作为一名政委，发挥党的领导和核心作用，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建功立业结合起来，锻造了一支英雄的队伍，涌现出了黄继光、邱少云等37位英雄模范，13455名功臣，实是强将手下无弱兵。

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他提出的积极防御、巩固阵地、消灭和消

耗敌人,保存与提高自己的战术指导思想,创造了以坑道工事为主体的防御作战的光辉范例,赢得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大捷,以至于今天上甘岭战役的影片仍然历历在目,激烈的枪声和战役大捷的欢呼声仍在我们的耳边萦绕。我们的祖国和人民都不得不竖起大拇指来赞佩这位将军。

有人称赞谷景生,说他是军队和地方工作的双赢家,这也不假。他那颗睿智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速运转。被称作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在赞扬谷景生的高贵品质时说:“在中国导弹事业的创建初期,和谷景生同志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他是一个好同志,直率、坦诚。谷景生同志为新中国的导弹事业做了很多工作,他是一位令人景仰的好同志。”谷老就是这样,在反右斗争的急风暴雨中保护了一大批专家和学者,使中国的火箭导弹顺利地飞上了蓝天。

“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诬陷,被开除党籍,监禁关押12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地摧残,家属子女受到株连。但是,谷老对党的信念、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始终不曾改变。忍辱负重、含冤受屈中,他仍然教育子女说:“我和你妈妈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境遇,虽让我们这个家天翻地覆,也许面临家破人亡,但它只是中华民族和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落下的一片小小碎镜。暴风雨过去后,是晴天朗日,我们要共同祝福我们的国家能够不断拨开乌云见青天,繁荣昌盛起来。”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傲然的气节和多么高尚的情操啊!

在自己的生命和家人遭受危难之时,他胸中想的仍然是祖国的繁荣和昌盛,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就在他冤案平反后的几天里,他又奔赴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随后又受命于危难之时,于1981年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高举共产党的大旗,对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的势力予以重重的回击,平定了骚乱,稳定了大局,维护了民族的大团结。

阅览谷老的“人生档案”，我的心灵一次次被撞击、被感动，被他的爱党爱国热情所感染。我们始终看到的是一颗高尚而洁净的灵魂。

无论是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党，还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建设者；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出生入死；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无论是鲜花，还是掌声；无论是功臣，还是被冤屈，他从来都是处变不惊，荣辱不惊，虚怀若谷，从容面对。

我们在腥风血雨中，我们在沧桑的岁月中，我们在轮回的季节里，始终看到了谷老头顶上高悬着的共产党人的信仰。

岁月在变，信仰不能改变！

因为我们知道，“信仰是人生的动力！”

“信仰是一种伟大的情感，一种创造的力量！”

“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岩石上的，而其他的一切都颠簸在时间的波浪上。”谷老啊！请接受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对先辈深深的致意，向您学习！向您致敬！永远追随您！！

2005年6月30日



三、谷景生遗文偶拾

谷景生是一位开国将军，也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北平左联书记和“文化总同盟”书记。他担任主编的《反帝新闻》报，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创办的《泡沫》月刊，在一二九运动期间被国民党当局列入查封之首。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引导许多文学青年走向光明道路，而谷景生却是一名活跃在文坛中的隐士。

虽然谷景生将军生前从未著书立传，但他却未曾停笔，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文稿。由于动乱，他的文稿失落了许多，不少文章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散存在不同时期的物品中，因此很多文章的具体写作日期不详。据说谷景生在离休之后，曾整理过一些文章，但并未打算发表。

我们从谷景生留下来的百余篇文字中收集到十余篇，刊列于后。有些根据他的日记或笔记内容，加了注释，谨供参考。



我是谁 这不重要

——谷景生笔记摘录

我是谁？这不重要，我做过什么？也不重要。我的经历，我的职务，我的待遇等等，都不重要，非常不重要。因为人类有了不起的情感和思维，因而我们时时面临选择。首先选择一种生存的方式：砂乎，尘乎，蟑螂乎，营苟之徒乎？非也！荣乎，伟乎？亦非也！人，就是人，伟大的人，光荣的人，神圣的人——即共产党人。这是一个永恒的视点、出发点和立足点。

我深信共产党的精神不灭，因为它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取向。一切带着个人企图加入党的人，都是伪党员。古人说，人为财死，还应加一句：官为位亡。共产党是一种信仰、精神、意志、品格，而不是任何官僚伪员能修改的。

共产党人的情感，是之于亲情的感情，之于同胞的感情，之于民族的感情，之于人类的感情，这是一个感情进化的流线。而小家碧玉的亲情是不能持续发挥其魅力的，它只是感情的起点，但从起点到终点的漫长过程中，就需要把亲情放大到对于国家民族的关切上来。这是共产党员能够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来源之一。

共产党的事业需要有识之士身体力行，要团结所有能为党工作的人，严己宽人。团结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缺点归自己的，功劳归他人。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个人名誉也可以牺牲。

人的物质存在或许是宇宙不屑一顾的，它顾不了我们，我们互相

照顾,互相关切,互相矛盾,互相斗争。在前一个观点上,人生很无谓,就像我们看一个蟑螂,很顽强,也很脆弱。在后一个观点上,人生很丰富,很悲壮。生命这样渺小,人生这样伟大,所以活的全部意义,就是要像个人,要有意义。

老者不等于贤士,贤者亦非必老。老有所教的说法我很赞成,孩子身上就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年轻人敬老,让他们敬什么呢?先尊而后有敬么,你有何尊呢?年长,位高,可是写不出一个大写的人?

回忆一个伟大事件和个人的关系是危险的,这在让小人物变成大人物时,共产党的光荣历史也变成个人功劳簿。

我希望出版家们特别注意,不要协助个人功名的繁衍。不要像一些可爱的小青年,拿小刀在长城砖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可爱变成了可憎。这是一种强奸,用强奸来繁衍,是一种什么行为呢?

激战前的誓言

假如今天我们流淌鲜血，献出生命，让我们为此而骄傲，因为我们是抗日的战士，是为数不多的能够为祖国而战的幸运者。我们将实现对这片土地的承诺。

……我们的脚下，是深褐色的土地，它蕴藏着清泉，那泉水经过几十万年养生，温暖可人，它属于中国人；我们的身后，是万里长城，我们在长城脚下卫国作战，追随吉鸿昌政委，与敌人决一死战，誓死如归！

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今天，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体会被敌人的子弹穿透，但请相信，即使我们的身躯淋淋血洗，我们的精神不会倒下，我们会警醒同胞。当我们去见马克思的时候，他仍然会说：“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编者注：

这是 20 岁的谷景生任抗日同盟军五师一团团政委时，在长城一带激战前，致吉鸿昌将军的信的片断。信底稿交同学马载坤保存，因年久动乱，只剩一段。在 80 年代初送给谷景生做纪念。（马载坤从医，后为海军医院骨科教授。）

1933年8月,吉鸿昌和方振武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在小汤山战役中,遭日蒋夹击,弹尽粮绝,抗日同盟军全军覆没。红十字会救援队在死人堆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谷景生,被送到北京协和医院救治。

谷景生挚爱的小孙子14岁时写的《爷爷与子弹》一文(附后),便是在听到谷景生讲述“不贪生怕死的人永生”的这段故事后写下的。爷爷读了这篇文章后,只说了一句话:“后生可畏,焉知后来者之不如今乎!”想必,这就是谷景生的襟怀。

附:

爷 爷 和 子 弹

薄瓜瓜

子弹疾风暴雨般地向他们扫射着,他的同志像面对残酷的死刑一般,带着光荣与尊严,倒在血泊中,倒在他的四周。只有他还依然挺立着,在和敌人殊死搏斗。他与生俱来的信念使他视死如归:死有何惧?他的命运,就是自己的国家和明天的和平。在他统帅下的战士尽管位卑,精神却无比高贵,他们永不言败。

无论他是怎样一个巨人,终究寡不敌众,当无无数计的敌兵和铺天盖地的火力向他袭来的时候,他的肉体被敌人的子弹无情穿过,但他那不可摧毁的精神,仍然支撑着他继续作战,坚守着他对祖国的承诺。

在长年的卫国激战中,他们已经脱离了个人的私情私欲,无论感

情上还是身体上，他们都已经超凡脱俗。他战斗不息，他要不断给战士们输入战斗的力量，他是站立到最后的那个人。

他的身体一点点被麻木所噬，他的眼前一片殷红，他的意识开始模糊，紧接着，他觉得自己跪在被勇士们的鲜血染红的战地上，猝然倒在他们的中间。

没有人相信，天下会有一颗致命的子弹能够穿过他的身躯，能够让他像一个凡人那样倒下，因为从古至今，他是最伟大的将军之一。

但是，在他的背后，鲜血无情地从身体里涌流出来，渗出了衣服，在上面构成一个红色的圆形图案，越变越大，就像黎明时一轮正在冉冉升腾的红日。他失去一切身体上的知觉，但他似乎可以感觉到“心之神”还在涌动，而这正是他生命的凭藉。

时间漂流，他躺在自己的血泊中，他终于完全丧失了意识。

然而，在他大脑的深处，有一个一息尚存的微弱信号频频发出电波，顽强地向他的全身传播。他慢慢睁开眼睛，可是除了鲜血，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耳朵能够听到一种不规则的声音，像是苍蝇的飞舞声，这苍蝇的声音逐渐变大，他感觉自己被一群又一群的飞蝇包围起来。他试图移动手臂抹去脸上的污迹，但是身不由己。就在此时，他突然恢复全部听觉：那飞蝇的声音此刻悄然无迹，代之以一阵阵在巨痛中求生的哀鸣，也许来自于同志，也许来自于敌人。在经历过无数战役后，他对这种声音并不陌生，只是此时，这声音如此之近，因为他正躺在他们当中。他继续听着，在嘈乱中，他能辨认出另一种声音，那是得胜的敌人们的狂叫。

一场血腥屠杀之后，有些人来打扫战场，有些人来抢救伤员。一阵阵声浪袭向他的耳鼓：

“还有没有活着的?! 我们救你们来了! 能动的人赶紧出来! 我们给你们包扎伤口!”

他的耳中顿时充满了救助者的呼叫和求救者的呻吟。

或为荣誉而死，或当战争俘虏而生，他早心有所属。高贵的战士，永远选择尊严与光荣。而此时，他浑身被无以复加的伤痛折磨，他左胸被子弹炸开，随着他的苏醒，他的疼痛更加剧烈。

“还有伤员吗？我们来救你！”

救援者的声音鼓动和诱惑着每一个垂死的生命。对于他来说，一个简单的求生动作，就会使他死里逃生。但是当这个不由自主的求生念头萌动的一瞬间，他就感到人格被扭曲的剧痛，那才是他真正无法承受的。此时延展生命，就意味着蒙受终生耻辱。

事实上，他的伤势异常严重，他既不能动，也不能出声。救援者只能在距离他很近的地方发现他。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命运归程，他的生命就是服务于这个命运的“工具”：他生为创造国家和平，死为保卫国家和平。当他的生命不能再服务于这个目的时，他会视死如归。在战斗中牺牲，只意味着肉体的消亡，而国家沦陷，人民成为亡国奴，那才是他真正的死亡。

人人都会在某一天死去，而他的死，将会写下春秋。

在他的周围，有一些受伤的同志，已经被生的欲念所挟，顾不上考虑原则，去寻求救助。那些可以移动身体希望得到救助的伤员，得到了救助，他们被移开死人堆，集中到另一侧。

救援者在战地的尸首中搜寻着幸存者，有人正朝着他移动过来，和他迅速接近，生还的惟一机会就在眼前！只要他继续睁着双眼，他就会得救，他就会立即从死亡和伤痛中解脱出来。这是怎样的一个关头，或者就此永远离开人世间，或者从此享受他的青春年华，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都预示着他的未来将会变得似是而非。就在这一刻，他突然紧急闭上了双眼——关闭上了生还的大门，他毅然决然地继续向生命的尽头走去。

但是，一个救援者竟径直走到将军的身边，停下了脚步，这个救援者，不，也许是敌人，像突然被一种强大的神力所骇住，他看到这具

“尸体”上，分明向外散发着一种慑人心弦的生命活力，在非人所具有的承受精神支撑下，他的面孔，散发着圣人的光环。将军却仍然纹丝不动，但一种奇异的力量，使他突然睁开了双眼，直逼向救援者的面孔，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一种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个性，充满了风流人物的优雅，充满了对国家的忠诚。这个眼神也有些像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眼审视，传导着痛苦和失望。

那个“救援者”，被这目光骇住，惶然间踉跄逃走。

“这就是结束吗？”

就在那边，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机关枪扫射声，震动着大地，震动着天空，在这种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般的机枪声中，夹杂着人们的惊吼声和最后的呻吟。这是梦想死里逃生的那些人，发现被欺骗的最后哀叫。敌人们以救援者身份出现，要彻底消灭在战场上哪怕一息尚存，可能生还后继续和他们作战的人。

那一刹那，曾寄望于苟且偷生的一定会意识到，贪生的后果就是死亡。

世界属于英雄，属于活得真实，有坚强信念的人。

祭 彭 涛

西历 1961 年 11 月 14 日，一个英魂去了。

斯人名彭涛，姓共产党，享年 48 岁，党龄 34 年。

受总理周恩来之邀，友情参加治丧，为你盖棺守灵。亡灵有位，故人远行，幸存者欲哭无泪！

倒读治丧会所拟你的生平，稿纸中记载，你彭涛是八大中央候补委员，化工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建国初任川南市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抗战与解放战争年代的职务，——记入生平纸。再前，对于你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记载，寥寥一两职务而已。

你我相识，恰在这被人忽视或忘却的寥寥之中。

先前你我挚友有约，谑作《共守同盟之君子协定》。盟约之精神，是不让历史的气色受回忆者贫血症的影响。对那些讳所自来、讲个人与历史干系的回忆文章，永远嗤之以鼻。历史愈是鲜红，回忆愈是苍白。曾以年轻和新鲜的热血染过红旗的人，无须到中年后用绵软之手为个人书写回忆。

那次，我们闲谈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的工作，重温旧日风云。你说：“现在摘桃们的来了，我们都不见了。”是也！先人在履行共产党职责时，怎会想到要将自己青史留名？后人又怎知，一个成功事件的组织者，在幕后所付出的代价。

今天，在周总理主持下，列出你的生平，众人说看出了你一生的光荣。而依我之见，你彭涛的荣光之处，不是 42 岁那年任中国化工部长云云，而是 22 岁时，参加领导了一二九运动。更为光荣之处，就

是在众人摘挑，你也伸手可及的今天，报嗤之以鼻，讳莫如深，与同志守盟终生。

短短几年，人事全非，协约者们，接二连三先“犯了错误”，唯你一人政治健在，却殒身于英年。

同志们他们昨天那样去了，同志你今天这样走了。今天和你握别，如同在 20 多年前，握着你那因委屈而发凉的手……你不该走！

面对你的灵柩，不惮以正大光明之心，向周恩来总理要求，在你生平的空当处，添上一句“彭涛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安息吧，同志彭涛！

本篇从谷景生 1961 年的日记中摘出

编者注：

彭涛，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时任北平临委组织部长，学联党团书记；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他是谷景生的高中同学，一同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又受党委派，一同进入抗日同盟军，与谷景生结为终身亲密战友。

1957 年反右运动之后，一二九运动的四位领导人，除彭涛外，先后受到政治迫害。据谷景生日记，1960 年前后，彭涛曾拿着两本书店买来的《一二九运动回忆录》找到谷景生，非常生气地批评作者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有心向中央报告。但经两人反复商量，决定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由人书写，他们不去争论。是为文中《共守同盟之君子协定》。

1961 年 11 月 14 日，任化工部部长的彭涛患癌症不治逝世，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审定、草拟的彭涛同志生平，谷景生看到没有提到一二九运动，沉浸在失友之痛中的谷景生非常激动，对总理说：彭涛是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

一,这一重要历史没有写上;总理听后非常惊讶,立即向谷景生细问了缘由,当场决定在生平中写上“彭涛同志是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并令谷景生参加彭涛的治丧委员会。

谎言：爱党和反党

代表一定阶层利益并为实现其利益而战的组织，就叫做政党。在中国，党即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者组成的先锋队组织。

有组织，就有党员；有党员，就有党员的领导。这样便有了一个公式：党等于组织、组织等于党员领导、一个党员和另一个党员领导意见不同，就是违背组织，就是反党。如此这般的逻辑在共产党内大摇大摆。由此而在党内繁殖出的，是党棍、党羽甚至党阀。

结果令人迷惑，爱党是否必须爱那位上司，万一实在爱不起来，就成了反党。真是爱党不易，反党不难。

结果，在这种概念下，便极易出现一些爱党的反党分子。

共产党的组织，源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掌握政权后，这个组织的日常工作变了，党员的工作变了，生死考验的机会不多了，全世界所有政权机构的通病都会出现：权力化、官僚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很多人心里实际上变成了人民为我政治私利服务的实践。

共产党是一种高尚的信仰、崇高的精神，无私的内心，造福于人的决心。凡带有这种特质者，无需讨得一张共产党员的外衣，更无需研究这外衣的穿法。

1966年5月22日星期日

编者注：

这篇短文从谷景生笔记中录下。根据谷景生夫人范承秀回忆,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谷景生心情非常沉重,不停书写文章,想向中央进言。但谷景生早已成为“异己”分子,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很快又被列入重点专案对象。从本文中可以读到一位倍受诬陷的老共产党员,对党矢志不渝的坚强信念。“说”言为正直不阿的话。

史说的，说史的

给历史穿衣戴帽是有些人的一大偏好。

孩子们可怜，自己不知道的事，只有听爷爷们去说。

过来人也可怜，果真到了老骥之年，伏枥无奈，唯志在“名垂千古”可为。事隔久远，人面全非，言论自由，亲历者是权威，旁观者也是权威，年长者是权威，权威者更是权威。

历史学家更可怜，他们身上挑起的“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担子太重。一星史事，“知情人”这样多，回忆者这样多，洋洋洒洒的一个书架盛不下，史说什么不得而知，说史的给历史戴什么帽的都有。

隔代修史虽是古训，共产党更有教训可记。林彪是接班人的时候，历史书上把朱、毛井冈山会师说成毛、林会师；林彪暴死了，历史书又说林彪没有指挥过大战。

说胡易，说实难。

名利二事对人诱惑如此之大，并确有多方面的好处，投资一个胡说、两个八道，可望得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值得冒上绞刑架的危险了。况且，在林立的机构建筑当中，还没有这样一个绞刑架，说胡的投资正可越发凶猛。

人生的精彩与否不能拿功名来衡量，因为功名可以建立，更可以剽窃编造。若想生命延续不灭，也不可用功名在社会上进行繁衍。特别是做过一些事情，有了回忆历史资格的人。

历史属于国家、炎黄子孙千秋万代和人类文化，绝不属于哪个

个人。

1992年12月8日

编者注：

本文是谷景生写的一篇杂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党史工作者工作最繁重的时间，面临着大量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工作。个人写回忆录也成为一股大潮。随着党史工作者深入工作，谷景生的名字终于被从一二九运动史中挖掘出来，并证实他是领导发动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党临时市委书记。一时间，访问者络绎不绝，但谷景生总是站在国家历史的高度谈所有的历史问题，凡接触过谷景生的人，都对他鲜明的性格，清醒的头脑，“金子般的品格”留下深刻印象。从这篇内容相关的杂文中，可见一斑。

浅深人和深浅人

人的一生都在向深刻方面进步。深刻表明学识高深，或者高明过人，因深刻而得到旁人的赞扬，便更可以自喜了。

在众人争相说深刻话，想深刻事，做深刻举动时，就出来这样一些观念：深刻是美德，韬略是渊博，幼稚是缺陷，直白是浅薄。

鲁迅曾用一间仓库来比喻文人写作的方略，说陈独秀在库门前大书：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大门四敞，只见零星刀枪；胡适之是紧闭仓门，门上贴一小条曰：内无武器，请勿疑虑。另一位叫刘半农的，连武器库也没有。人们很是贬低刘半农，送他一个字：浅。

我倒喜欢这样的浅，不喜欢那样的深。如鲁迅说，浅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远比烂泥深潭好。

天生“浅”之人，若在深潭中工作，非但不可自我下陷以求全，相反要浮得更浅以求真。凡因碰钉子而学做深人之浅人，只是故做深刻了一场。共产党人的基本功，是远离那些浅薄的深人，做深透的浅人。

编者注：

本文是从“文化大革命”后抄家退还的资料中收集到的。写作时间大约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谷景生是一个非常注重修养的人，他手不离卷，但他一向心直口快，从不隐藏自己的观点，常常自诩“浅薄”。本文向后人提供了共产党员修养的思考。

韬略三六

之一

很多同志爱讲韬略，《三略》、《六韬》达到了很高水平。

事出有因。现实中，为人、做官、处事、写文章，以至上街买东西，不懂“韬略”就要吃亏，弄得韬光之计比比皆是。

上街走走，摊店前的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这是初级阶段街市韬略而已。可是韬略一旦和政治相连，就立刻变得高级起来：不得志时，韬光俟奋；得意遭嫉时，要韬光晦迹；功高盖主时，索性韬声匿迹。讲韬略的人政治生命力强，反之命短。

很多人熟读孙子兵法和六韬三略，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有勇有谋，百战百胜。一身烟灭回到家里，就忘记韬略二字，一句苛言，一脸神气，自以为刚正不阿。这一夜间可能就从同志变成敌人，从革命者变成了反革命，这当然仅发生于党的历次错误路线史上。但这位犯了错误的人在遗言中竟然写道，请用刀把我的头给砍下，节省一颗子弹消灭敌人——死到临头，还低头乏术，算计子弹——呜呼哀哉！

之二

讲韬略之故，恕谨言慎行。

之三

这使人想起，某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经歪嘴和尚以误传

讹，能由六韬三略繁衍成千韬万略，由三十六计推演为三百六十策，即而演化成权术、尔虞我诈之术，以至厚黑术。当然，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宝贵的特点，即是举一反三，推而广之，放之四海而皆用。

毛主席是讲战略战术的领袖，共产党也是讲策略的党。否则，中国独立战争和解放战争都不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胜。

不过共产党须谨记：《三略》、《六韬》，是对付侵略者的兵书，不是对付自己人的为官之道。

之四

讲韬略之故，恕吾忌笔。

之五

各路法术，存在于商界，倒很自然而然；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斗争中，也是好戏。而不知什么原因，战场、商场、官场、学场、社会场，都合用了同样一种法术。

共产党所讲的革命，重要的精神意义是革旧官场的命。由能够牺牲个人利益，为人民服务的进步组织来照料中国人民。官场的对立面是共产党，共产党中无官场。然而，革命魂灵今犹在，弃德归俗路漫漫。

之六

讲韬略之故，止笔。

1996年6月9日

编者注：

本文是谷景生1996年的一篇日记。他在其他一些篇

章里也都提到类似的话题。谷景生一直关心时政,也不断批判时弊,他对“官场”、“厚黑学”、“潜规则”等说教非常厌恶,倡导共产党员的纯洁性与真诚。

把资产阶级的“政治” 扔到阴沟里

昨天，在一张动荡的书桌旁。

长者说，你可谓小谋深算者！少者说，这位同学政治成熟。

我们七言八语，就这样决定了很多事情。

共产党就是这样成功的。

今天，在一张平静的饭桌旁。

长我五岁者曰：你不讲韬略。

少我十岁者曰：你真幼稚。

不大不小者七嘴八舌：你好像不懂政治。

我想说，我听不懂你们说的。而我沉默着，我什么都明白，我忘记不了，我是共产党人——早把资产阶级的垃圾政治扔到阴沟里的共产党。

1999年9月

编者注：

本文是作者对“政客”政治和共产党人政治的思考。作于86岁。第一段讲的是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靠革命的智慧。年轻时代被称“小谷”的谷景生，以政治成熟，懂得战略战术在组织内著称。建国后的谷景生，常常被世

俗批评为“幼稚”，不懂“政治韬略”，所以是一个政坛上的“失败者”，第二段生动地描写了这种处境。作者在最后点题，要坚持共产党的纯洁信仰。

握 笔 要 紧

有志从文的人，若期望成功，靠烧香拜佛不行，靠抄抄写写不行，靠读读背背不行，靠谋谋划划更不行。总之想“靠”什么都不行。行文严谨，格式规矩虽然必要，但甚为次要。符合文学的形式规范，有师或师从，则人人可通，但那只是文学的躯壳，而不是文学的灵魂。

文学的魅力在于使人精神升华，它必须有灵魂、有精神、有情感，它应当让真善美洋溢，让假恶丑倒人肠胃，握笔之手需要具备感应的神经。一个麻木不仁，心胸狭窄，自私偏狭，怯懦投机的人，即使手段万般高明，也是当不了文学家的。

我的意见很明确，先要有准备做个人，再去作文。做到我在无我中，无我在我中，真实、诚实、勇敢、沉着，加上一些文学技术，文章就做好了。

本文日期不详

编者注：

这篇短文是谷景生在任北平左联书记和“文总”书记时所作，曾在山西老家的文学青年中传抄。他的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谷景生问题的牵连，遭受“中央专案组”折磨，抑郁而死。本文是从“文化大革命”“专案材料”中抄出。

世界语的精神起源

学世界语的人多数以为世界语是未来人类的共同语言，界内的汉语文书世界语三个字，已然被 Esperanto 一词取代。

多年前鲁生就有意见说，学 Esperanto 是一件事，学 Esperanto 的精神，又是一件事。我的看法还激进一些，以为既然学 Esperanto，就要做 Esperantisto。共同语言的最高境界是无声的，是一种精神的默契。所以，与其说学习世界语，莫如说研究一种精神。

世界语首期刊物《Esperantisto》(世界语者)，年仅两岁便遇天灾，几乎夭折。死里逃生后，再遇人祸，祸首是学界里的派性斗争，最终躲过一劫，是靠会员举手表决。但是不久，托尔斯泰的大作给它惹了杀身之祸，《Esperantisto》终究被埋葬在文化暴政的铁蹄下。这时它只有五六岁而已。

在北平的学会中，也出现和平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派，争论“Per Esperanto Por Paco(世界语为和平而战)”，还是“Per Esperanto Por Socialismo(世界语为社会主义而战)”。对此争议，我颇不以为然。

世界语是一种理想，Esperanto 原意是希望者，从世界语的伟大推动者 Zamenhof 的笔名流传下来。Zamenhof 说过，当讲世界语的人们聚集一齐时，有一种奇妙悦声在空中飘荡，但是人耳听不见，只有心听得到。

世界语既然是未来的共同语言，便必然是同志的语言，没有志同道合，就没有共同语言。世界语是志同道合者在人类崇高的精神中握手，不是交谈，更不是派别之间的激辩。

学习世界语的精神起源，不是比争论用世界语为和平还是社会主义服务更有意义吗？

编者注：

本文从“文化大革命”后“中央一办专案组”退回的“文化大革命”监狱文稿中找出，日期不祥。据老同志回忆，谷景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学习世界语，并用世界语团结了许多同学。当时在北平知识青年中，曾对世界语的作用有过争议。作为文化总同盟书记和左联书记的谷景生，曾在内部对这一争议，发表过类似本文的意见。根据推断，本文是20世纪70年代谷景生在监狱中写的，后经本人作个别修改。

泥 土 一 撮

头戴乌纱帽时，人们会抬头望你，像仰视高楼的尖顶；腰金拖紫时，人们会观羨你如名园的美花。你便自认为是天才、是豪杰，宁愿躲在衣冠的囚笼中。

其实你什么都不是。

当人们误解你，以为斯人如是时，你为被人“理解”而高兴；当人们理解你，知道你莫过凡丁时，你为被“误解”而懊恼。

世上本无天才豪杰之群，更无衣冠之分，人人都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又在默默中泯没。

但世上确有高楼，有名园美花。至人、至至之人，那也无非是高楼中的一块石材、美花下的一撮泥土。

由鲁迅对素园的议论想到，凡共产党人，永不做观赏者眼中的尖顶、美花、天才、豪杰；安于成为建筑者和栽培者手中的一块石材和一撮泥土。

编者注：

本文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抄家退还材料中找出，具体日期不祥。据谷景生的夫人范承秀回忆，这应当是谷景生在反右之前，正在受到党的重用时期写的。谷景生在顺境时，总是异常严格对待自己，强调“日三省吾身”。他读了大量书籍，特别喜爱鲁迅的文章，本文应是一篇鲁迅作品读后感。

宁为心碎，不为肢全

那日，本不想“拜会”鲁迅，然而我没有办法。

见面后，他一副嘲讽口气，似问非问道：委以重任了还是高官厚禄了？

我似答非答：“仍然故我，还是那姓谷的。”

“你还很认真？”

“我是共产党人，怕就怕认真二字。”

鲁迅并不看我，说，你不知认真是致命伤，很多人因为它送了命吗？

我懂得他的逻辑：认真，便会激烈，激烈，便会送命。但沉静着，又会啮碎自己的心。

鲁兄尖刻，为友尚诚。他是在问我，愿意送命还是愿意啮己心？我说，选择共产主义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可是我明明白白地活着，还不期然而然，得到党的不次之宠。反骨之兄予何评置。

他仍不看我，若有所思，“看样子现在光景是好了，否则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

是的，一面有人在奋战，另一面就有人在荒诞。奋战者聚集时，认真者则担当重任；荒诞者乱术起效，则认真者无立锥之地。此时思彼时，愿为认真二字既丢官也送命；彼时思此时，当庆幸能为认真二字丢官也送命。人无瓦全之求，何惧玉碎之境？

鲁兄有所不知，共产党人，既不会依阿两可，也不会啮碎自己的心而亡；宁为心碎，不为肢全，便是活得其所，死得其所矣。况且，

无个己存在，何有个体之痛？

编者注：

本文夹在谷景生生前常读的《鲁迅全集》中。日期不详。从内容上分析，可能是在正当他受到党的高度信任、委以重任之时，妻子被打成右派，他拒不接受人们的劝告：让他划清界限、离婚。随后使自己的政治生涯受到严重影响，却无怨无悔。

“拜会鲁迅”意为文中会友。

记梦：同鲁迅在街头摆摊^①

半夜，鲁迅敲门叫醒我，说：“别睡了，姓谷的，跟我上街卖货去。”

我并未睡眼惺忪，大声回应：“姓鲁的，还是带那几个小钉，几个瓦碟吗？今天再带一个泡沫吧。”^②

“你那泡沫？无非也是一个小钉，而已。带上。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我和他，在深夜的街头摆上了地摊，几个小钉，几个瓦碟。

有个人走过小摊，拿起瓦碟在手里抖了一下，不，是拿着小钉的手抖了一下，撂下来走了。

① 《同鲁迅在街头摆摊》一文从1966年12月谷景生日记夹页中抄录。时值“文化大革命”初期，谷景生正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遭受批斗，在被斗争的罪名中，有一项是一二九运动期间北平地下党的问题：一二九运动之后，国民党当局对领导学生运动的地下党大搜捕，要抓《泡沫》负责人。谷景生被捕入狱，在严刑拷打下也没有暴露自己真实身份。

② 20世纪30年代中，鲁迅发表的大量战斗性杂文受到“主流文人”的攻击，而鲁迅称自己的杂文是“小钉和瓦碟”。1930年，鲁迅创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任左联执行委员。1935年，谷景生任北平左联书记，创办泡沫社和《泡沫》月刊，与鲁迅成为神交。1935年11月，萧三自莫斯科致鲁迅一封信，传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关于解散左联的建议。鲁迅将此信转交左联的党内负责人（见《鲁迅全集》）。《泡沫》停刊，左联于1936年撤销。

鲁迅说：很多人对这小钉瓦碟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

鲁迅突然双手把住了我的头，放在月光下端详：姓谷的，你的罪状可也不轻，头发都被人揪掉啦！^①

^① 谷景生原有一头厚密的头发，早年在对敌斗争中，敌人对他施刑中，头顶部位的头发被揪掉，“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辱打。

“文革”家书

我最亲爱可爱的望江、政协、小妹、小宁和小丽：

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领导的，你们要坚决拥护。没有资格参加，也罢。

不要因为我和你妈妈整日挨批斗，他们三天两日来家里搜查，就对党有想法。我很高兴，望江还不到 20 岁，就有能力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出发，领会这场运动的意义；政协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不要愤怒，只要真革命，路靠自己走。小妹还要想办法上小学，在家时要继续练习柳书。要保护小宁小丽，不要被夜里敲门抄家所惊吓，不要被街道孩子们欺辱。

至于我和你们的妈妈，你们亲眼所见，我们可能会离开家一段时间，隔离审查，交待问题。我们一直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为党工作，此次也不会例外。

历次运动的目的都是想要纯洁共产党，因为党内和社会上一样，确有一些思想不正派的人，需要被整肃。但是，历次运动，都会上演坏人整好人的悲剧。望江政协不要想不通。

1958 年运动后，我曾对你妈妈讲过，不几年内还会有更大的运动。中国的封建意识，名利思想，人事倾轧，在社会上有，在党内也有。党内一些人的宗派主义，权位思想和小农意识，是诬告行为，整人作风的市场。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有个别人受害，50 年代则一批人受害，60 年代必然登峰造极，也许一代人要受害，这不稀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就容易理解了，用辩证法看，新一代中国人会更

加成熟伟大。

我和你妈妈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境遇，虽让我们这个家天翻地覆，也许面临家破人亡，但它只是中华民族和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落下的一片小小的碎镜。暴风雨过去后，是晴天朗日，我们要共同祝福我们的国家能够不断拨开乌云见青天，繁荣昌盛起来。

还是那句话：父母是无罪的，孩子们是无辜的，你们要昂首挺胸，走在大街上，走在人群中！

院里两棵小松小柏太小，怕是养不大，随它去，但你们仍要照顾，也可以索性从花盆挖出埋在地下，日后还会生根发芽。

1967年2月13日

编者注：

这是谷景生在入狱前给五个女儿的一封信。此后，谷景生与女儿们一别八年，互相不知下落。夫人范承秀也被关入牛棚，遭受非人折磨。五个女儿因受父母问题株连，经历各种磨难。她们能够坚强地生活下去，和这封家书的精神紧密相连。

拉开点距离，以今天的眼光看，谷景生是与许多共产党老干部有共性却有更多特性的一位：十几岁就主动追求马列主义；不到20岁便加入了共产党；刚过20多岁竟干了惊天动地的大事；30岁出头却开始受挫；以后的40余年时间，沉沉浮浮，磕磕绊绊，可还是做成了一些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以他的经历和智慧，是可以看穿一阵又一阵“运动”而绰绰有余了。

谷景生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乌鲁木齐军区政治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第二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谷景生同志，于2004年11月28日18时35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1岁。

谷景生同志，1913年7月生于山西省临猗县。中学时期受反帝反封建和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他1929年参加革命活动，任太原一中校刊“文艺版”编辑。1930年在太原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北平先后参加左联、社联和反帝大同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北平白区的革命斗争，任共青团河北省机关报《反帝青年》编辑。1933年，任河北反帝大同盟机关报《反帝新闻》主编，后调察哈尔任张家口党的机关报《群众日报》编辑兼记者。同年调至军队工作，历任抗日同盟军宣侠父师政治部宣传科长、五师一团（张韬团）政委，率部转战察北、昌平等地，在围攻小汤山战斗中，作战勇敢，身负重伤。1934年至1935年，他和彭涛等同志进行恢复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先后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北平市委书记、北平“学联”党团成员、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兼左联书记、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书记，并创办了《泡沫》杂志担任社长，团结和发展了一批进步知识青年，积极组织开展左翼文化活动，引导许多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谷景生同志是伟大的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入侵华北之时,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下令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华北大片国土沦于敌手。面对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由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组成的中共北平临委,顺应爱国抗日历史潮流,于12月9日组织发动了北平大、中学校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军重重阻拦和袭击,汇集在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提出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自治”、“争取爱国自由”等六项要求,当这些要求被国民党政府华北行辕主任何应钦完全拒绝后,临委当即决定,将请愿转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学生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一场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在中国大地爆发了,掀起了全国各地抗日救亡的巨流。毛泽东评价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1936年3月,谷景生同志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严守党的秘密,保护了地下党组织的安全。被营救出狱后,继续担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左联书记、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1936年底,中共中央北方局调谷景生任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总干事,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谷景生同志历任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第一纵队民运部部长、太行区党委第三地委委员兼城工部部长、榆武祁工委书记兼决死队第九团政治委员、太行区委林县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太行区党委第七地委书记兼第七军分区政治委员。在决死队工作期间,带领所属部队转战晋东南,积极开展对日作战,在沁县、安泽等地组织武装,发动群众,开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太行地区工作期间,领导党、政、军、民开展反封锁、反“蚕食”、反“清剿”、反“扫荡”斗

争,为巩固和扩大太行地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谷景生同志历任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主任、洛阳市委书记、郑州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治委员、第十五军政治委员。1947年8月,他和秦基伟、黄镇率部突破黄河天险,挺进豫西,解放了伏牛山广大地区,开辟豫西根据地,组建了三个军分区及地委、20多个县的党政群团机构和地方武装。小平同志讲,谷景生在豫西的工作方向和路线是正确的。1948年,所部参加著名的淮海战役,配合兄弟部队歼灭了国民党王牌军黄维兵团,受到刘、邓首长表扬。1949年,他与军长秦基伟率部从周口出发,千里跃进,跨过淮河,越过大别山,横扫罗田、太湖、望江之敌,直抵长江华阴渡口。同年4月,他在渡江战役发起前,亲自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旗帜授予突击部队。突破长江天险后,他与军长秦基伟率部日夜兼程,千里追歼逃敌万余名,受到刘、邓首长嘉奖。随后又率部参加广州、广西战役,奔赴川、滇、黔三省剿匪,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立下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谷景生同志仍任第十五军政治委员并兼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奉中央军委命令,1951年3月,谷景生同志和军长秦基伟率志愿军第十五军开赴朝鲜战场,参加第五次战役,平康、金化、淮阳地区防御作战和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在敌强我弱,战斗异常残酷激烈的情况下,他抓住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这一中心环节,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开展群众性的立功运动,卓有成效地保证各项作战任务的完成。部队先后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等37位英雄模范,13455名功臣。

抗美援朝归国后,谷景生同志先后任防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党委第二书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57年3月,他到第五研究院工作时正是我国导弹事业初创时期,

任务十分艰巨繁重。他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科研人员献身导弹事业的积极性创造性,使研制工作取得重要进展。钱学森评价,在中国导弹事业创建初期,和谷景生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他是一个好同志,直率、坦诚。谷景生同志为新中国的导弹事业做了很多工作,他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好同志。反右斗争开始后,他排除“左”倾思想的干扰,在该院保护了一大批专家和青年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被错划的右派分子。

1958年因受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的影响,他在政治上遭受了不公正对待。同年5月,调任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受诬陷迫害,被开除党籍,监禁关押12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家属子女受到株连。在逆境中,他仍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决抵制“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恢复工作后,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随即参加指挥了对越自卫反击作战。

1981年2月,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露头,南疆、喀什、叶城等地先后出现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利用宗教煽动群众闹事的情况,中央决定调谷景生同志到新疆任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乌鲁木齐军区政治委员,同时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治委员、第一书记,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他坚持新疆稳定是大局的指导思想,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紧紧团结依靠新疆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群众,排除种种干扰,稳定新疆,迅速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方针,稳妥地处理了喀什和叶城的暴乱事件,稳定了政局,使经济工作走上正轨。他为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8年3月,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这期间,他严格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

见和要求,积极参加《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行政诉讼法》等重要法律草案和方案的拟定、研究和审议。他还担任全国人大中英友好小组主席,积极宣传我国保护人权所作的努力。

1983年底至1985年底,他参加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工作,率中央整党联络组,先后赴辽宁、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河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检查指导整党工作。在工作中,他协调解决各地在整党中反映出的问题和矛盾,促进了当地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把发现的比较优秀的干部,推荐给各级有关党委。1955年,谷景生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是党的十二大代表,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谷景生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各种艰难困苦和纷纭复杂的情况下,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坚决拥护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他敢于坚持真理,无所畏惧,历经磨难而矢志不移。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从不居功自傲。他具有高超的领导素质和领导才能,积累了丰富的军队和地方工作经验,擅长政治工作,熟悉军事斗争,敢于面对矛盾,富有创造精神。几十年来,他勤奋工作,任劳任怨,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作风民主,联系群众,平易近人,爱护部属,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的热爱和尊敬。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子女要求严格,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谷景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为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谷景生同志永垂不朽!

谷景生简历

谷景生 1913 年生，山西临猗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身份学生。大学文化程度。

1929 年，参加革命活动，任太原一中校刊“文艺版”编辑。

1930 年至 1931 年，在太原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

1932 年，在北平参加左联、“社联”和反帝大同盟，任“旭社”（党的外围组织）社长。

同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共青团河北省委机关报《反帝青年》编辑兼校对。

1933 年，任河北反帝大同盟机关报《反帝新闻》主编，调察哈尔后，任中共前委机关报《民众日报》编辑兼记者。

同年调至军队工作，历任抗日同盟军第五师（宣侠父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五师第一团（张韬团）政治委员。在进攻北平附近小汤山作战中负重伤。

1934 年末，和彭涛等同志进行恢复北平地下党组织工作。

1935 年，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兼左联书记。8 月，创办泡沫社，任社长。团结和发展了一批进步知识青年。

同年，任北平“学联”党团成员，中共北平工委改组后，任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书记，和彭涛、周小舟等同志组织领导了一二九运动。

1936 年，在北平被捕，出狱后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任中共北平市委文委兼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左联书记。

1936年底至1940年,调离北平,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总会干事,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山西军政训练班政治指导员,山西决死一纵队连队政治指导员、纵队民运部长。

1940年,任中共太行区党委干教部干教科科长。

1941年,任中共太行三地委委员、城工部长,中共榆(社)、武(乡)、祁(县)工委书记,决死九团政委。

1943年至1947年,任中共太行第七地委委员兼林县县委书记、林县独立团政委;中共太行第七地委书记、太行第七军分区政委。

1947年至1948年,任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主任。解放洛阳后,率干部200余名,接管洛阳,任中共洛阳市委书记。解放郑州后,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郑洛警备区政委。

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十五军政委、党委书记。解放昆明后,任中共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至1954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五军政委、党委书记。参与指挥了上甘岭战役,所部涌现出著名的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战斗英雄。

1954年至1957年,任军委防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党委第二书记。

1957年至1958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党委书记。

1958年至1966年,政治处境异常险恶。1957年爱人范承秀遭受政治迫害,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右派帽子。谷景生因而受到株连,被免去五院政委、党委书记职务。调总政任群工部部长。作为内控对象,限制军内活动。1964年又被免职,不予分配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谷景生横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被捕坐牢。株连妻子也被抓坐牢,身陷囹圄,受尽凌辱。监禁八年之后,被“四人帮”定为敌我矛盾,清除出党,含冤屈辱长达12年之久。1966年至1968

年,谷景生被定为总政重点斗争对象,受批斗,群众专政,隔离审查,失去人身自由。

1968年2月8日,谷景生被总政在家里抓走,上交中央“二办”投入监狱,受尽摧残折磨整整八年。直至1975年1月25日戴罪出狱。

1975年1月25日,被中央“一办”、“二办”定为叛徒,清除出党,剥夺一切政治权利,发给基本生活费,释放出狱,交总政处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昭雪平反。遂即于12月调广州军区任副政委、军区党委常委,即赴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1980年12月至1982年12月,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书记、第一政委。是中共十二届党代会代表、主席团成员。

1982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调谷景生回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后任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同时被派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任辽宁省、华北五省、市整党组组长。

1988年7月,离休。

1955年,谷景生被授予少将军衔。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三级国旗勋章二枚。

1988年,谷景生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后 记

在中共郑州市委和郑州市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一书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同时也是伟大的一二九运动爆发70周年。2005年5月,市委党史研究室有关编写一本回忆老书记谷景生,1935年发动和领导一二九运动以及记述他一生革命经历的图书的报告获得上级领导批准后,即着手图书的编写工作。

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在编写此书过程中,专门成立了编委会:主任:徐连山,副主任:王保庆、王宗民、范承秀、任恩新。编委会设立办公室,由任恩新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协调工作,徐爽协助任恩新工作。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宇、王凡、王宗民、王保庆、任恩新、张如贤、段绪德、徐爽、徐连山、麻星甫。

编委会成立之后,迅速展开工作。编委会成员身处北京、郑州两地,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凭着强烈的责任感,认真搜集与此有关的资料。据统计,20多位同志搜集的与谷景生同志有关的资料达百万字之多。资料收集之后,进行精心撰稿,进行二度创作,经过反复筛选、比较,到9月底,最后定稿。原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连山认真审阅了每篇文章,谷景生的爱人、战友范承秀,十分详细审阅了全书每篇文章,并主持了本书的具体策划,封面设计等工作。

此书的公开出版发行,得到了许多同志的热心帮助和支持。许

昌卷烟总厂,原九纵老战士段绪德同志对此书的形成,提供了不少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难免存在一些纰漏和差错,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2005年9月



我是谁？这不重要，我做过什么？也不重要。我的经历，我的职务，我的待遇等等，都不重要，非常不重要。我们时时面临选择。首先选择一种生存方式：砂乎，尘乎，蟑螂乎，营苟之徒乎？非也！荣乎，伟乎？亦非也！人，就是人，伟大的人，光荣的人，神圣的人——即共产党人。这是一个永恒的视点、出发点和立足点。

——谷景生

ISBN 7-80199-343-8



9 787801 993434 >

ISBN 7-80199-343-8

定价：28.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

SS号=11810564